



第十一辑



韶关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

韶 关 文 史 资 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韶关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八年一月

目 录

- 忆优秀的统一战线工作者黄桐华……………朱小仲(1)
- 六十二军与军长黄涛……………廖蕊光(16)
- 李煦寰其人其事……………钟承宗(27)
- 抗战时期的何春帆先生……………黄振乾(34)
- 我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回忆……………陈维廉(40)
- 热心艺术教育的赵如琳……………曾 玮(46)
- 爱国民主人士张光第……………卢小周(54)
- 罗佛金与九龙起义……………江 军(64)
- 林宝衡支援革命回忆片断……………林 英(72)
- 从“捞家”到革命者……………杨 博(76)
-
- 李汉魂与南华寺……………古 衡(80)
-
- 蒲风在翁源……………黄安榕(86)
- 记全赓靖校长……………张 艺(94)
- 悠悠寸草心 耿耿赤子情
——记艰苦奋斗的教育工作者包华……………陆 素(103)
-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黄 力(112)
-
- 粤北空战录……………陆光球、黄 严等(118)
- 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在马坝……………伍坤顺(122)
- 青年会在韶关……………王以敦、谢琼孙(130)
- 战时广东临时省会通信建设概述……………许宗熙(141)

抗战时期的英德·····	苏鸿炯、陈 评等(145)
第七战区乐、仁、乳守备区抗战纪实·····	林荟材(152)
回忆拦截日军运输船队的战斗·····	李世恩(157)
抗战时期韶关市征兵情况忆述·····	张镇燧(160)
抗战时期粤秀中学学校生活·····	单昌辉(164)

回忆团结瑶胞共同战斗的往事·····	肖怀义(168)
金造保卫战·····	陈 泗(177)
王国华起义前后情况的回忆·····	丘寿科等(184)
解放前夕韶关“护行”工作片断·····	成剑萍(189)
志锐中学护校及其他·····	黄兴亚(192)
解放前夕韶关电信员工保卫物资情况·····	廖崇信(197)

我所知道的南韶连会馆·····	李三余(200)
解放前后韶关市性病概况·····	谢思华(203)

作者·读者·编者

有关曲江矿业问题的商榷·····	汪伟斌、李国伟(205)
对北江纸产销地问题的一些意见·····	砚 农(209)
韶关市第五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名单·····	(210)

参考资料

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八种表现·····	(176)
台湾何时光复的·····	(111)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 告各界人民书·····	(63)
民国时期官俸制度·····	(117)

忆优秀的统一战线工作者黄桐华

朱小仲



1950年时的黄桐华

1984年5月9日，优秀的统一战线工作者黄桐华与世长辞了，享年74岁。桐华于194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党前夕，他是国民党第四战区挺进纵队（后改为第七战区挺进第八纵队、挺进第二纵队，以下简称“北挺”、“挺二”）政训室中校组员（以后历任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农工民主党的党员。桐华的一生，正如《悼词》对

他所作的评价：“他对党忠诚，胸怀坦白”，“一贯忠于职守，数十年如一日，工作积极热情、负责；廉洁奉公，作风正派，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关心和爱护同志，深受党内外同志的好评”。我虽是桐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之一（另一位是林名勋），但我对他一直以兄长相待，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本文只就我和他在“挺二”共事五年的时间所接触到的情况，对他的工作业绩以及他如何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作一简略的介绍。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东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都

先后迁到韶关。为维护北江一带的治安，1939年冬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乃委任其旧部莫雄出任“北挺”司令。“北挺”是一支军事政治素质都较差的地方杂牌部队。莫雄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他早在三十年代初，就与中共地下党有密切的朋友关系，并为党做过不少工作。如1934年他任江西省的专员时，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苏区的绝密计划，送给中共中央；1935年底，莫雄任贵州省的专员时，让长征红军过境，被蒋介石以“通共”问罪，关押了半年。在“挺二”六年时间，他与中共地下党一直有着良好的统战关系。莫雄结交广泛，自诩为善于包容“红、黄、蓝、白、黑”各种政治色彩的人物。在北江一带的地方势力中，享有威望，皆尊称他为“莫大哥”。

广州沦陷后，韶关的战略地位显得重要，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都迁来韶关。省委并于1939年5月决定成立中共北江特委（以下简称“北特”）。特委书记黄松坚通过古大存的介绍，知悉莫雄的为人以及“北挺”在北江的作用，认为可以帮助莫雄把“北挺”改造为一支能够坚持抗战的武装队伍。于是，黄松坚一方面派人与莫雄联系；一方面派出十多位中共党员到“北挺”工作（其中有“北特”的干事饶华被派去任政训室少校干事，英德县特派员邝达任政治大队长。以后，随着形势和工作的发展，陆续派去的及在该部队内发展的党员达一百多人），并建立特别支部，由“北特”直接领导，这就为中共在“北挺”的工作打下了组织基础。

桐华参党前后，主要从事以“北挺”为基点的统战工作。他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北特”对“北挺”这一武装队伍的工作，不同时期虽有不同侧重点，但总的是帮助莫

雄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增强官兵的抗日意志，加强军民合作。“北挺”于1940年冬改为“北江挺进队干训所”。该所的培训对象是“北挺”的下级军官和北江各县抗日自卫队的骨干以及知识青年。“北特”为开展北江的武装斗争作准备，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前来受训，以取得合法身份及学习军政本领，使地方武装的工作得到加强。桐华在这期间虽未参加共产党，但已能接受地下党员的建议，安插中共党员及进步分子担任该所的军政职务，安排进步的政治课程（如形势、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并在国民党规定的《三民主义》、《总裁言行》、《新生活运动》课程内渗进进步的内容。这些课程，都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桐华担任形势课，在国内形势方面，根据中共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精神来讲。由于他肯学习，口才好，他的讲课很受学员的欢迎。通过这些工作和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提高了学员对抗日救亡的认识，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从而使中共地下党在该所发展了一批党员。我们还曾和桐华商量，由他出面组织政训人员，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进行了关于中国的农民状况及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的几场讨论，以提高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北挺干训所”于1941年秋结束后，改为“挺进第二纵队”。“北特”为加强“挺二”的工作，先后安排二十多位中共党员到司令部、政训室以及各大队、中队担任军政职务。这时桐华已经参加了共产党。这些人事上的安排，都由桐华出面向莫雄和政训室主任推荐，均顺利被接纳，从而使“挺二”的地下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广泛结交朋友，进行

政治宣传教育，使部队的政治素质逐步得到提高。为了有利于抗日，我们还从各个方面去提高莫雄在部队的威望。如1943年由桐华主持创办的“挺二”《精进报》，常常刊登莫雄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的抗日、进步的言论，以扩大莫雄在部队内外的政治影响。他还给“挺二”建立过一支名为“昂队”的篮球队（莫雄别字志昂），桐华委任莫雄之子莫二球为队长，并亲自带队，转战北江各地，所向无敌。就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的球队也刮目相看，既提高了莫雄的声誉，也便于我们开展交朋友的工作。

1944年秋，日寇有再次进犯粤北打通粤汉线的意图，“北特”根据中共省委关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黄松坚部署“挺二”中共地下党组织帮助莫雄扩充部队，加强队伍建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由桐华向莫雄详细分析了形势，指出“挺二”要在北江站稳脚，必需趁此时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扩充部队，才能保护群众，打击日寇。并表示当尽力协助这一工作。当时莫雄正苦于实力不足（他原拥有四个大队，被压缩为两个大队），因此他非常高兴地接纳了这一建议。经报战区批准成立第三、第四大队和特务第二中队；但战区只同意给番号，至于人员、武器、粮饷要自筹。于是，第四大队由英东地区中共地下党负责组建，党员陈仁畿任大队长；第三大队的第九中队由中共清远县委书记何俊才和赖德林负责组建；特务第二中队由中共英西党组织派出李学林（“挺二”第一大队长的侄子）和唐凌鹰负责组建（该中队的任务是负责地下党“北特”机关的安全保卫和为“北特”的经济组织“昌兴公司”护航）。这三支队伍的政治素质都很高。

此外，还组建了一个经过彻底改造成为中共地下党所掌

握的第五中队。组建这个中队是颇费周折的。该中队长原是军统特务陈锡。1944年莫雄拟提陈为大队长，“北特”获悉后，要桐华从莫雄的本身利益着想，劝说另行选人，莫雄则认为他对陈锡有救命之恩，陈不会对他有损害。劝说无效后，“北特”退而考虑不能让陈锡的人去任中队长。桐华再次向莫雄指出，第五中队的武器是司令的，应派可靠的人去。莫雄答应不让陈锡的人去，人选正在考虑中。桐华于是极力推荐在司令部任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杜国栋，莫雄欣然同意。“北特”并陆续派了十多位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中队和小队的军政职务。

上述这几支队伍组建后，都主动、积极打击日寇、汉奸，在英德、清远一带享有盛名。可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掀起的反共逆流，这几支队伍都遭受到反动派的歧视，不断制造摩擦事件，企图消灭这些坚持抗战的队伍。国民党军队中最反动的别动军就曾几次向第九中队挑衅。1945年夏，第九中队迫于自卫，在清远严惩了这一支以反共为职业的别动军。这件事，在国民党中反响很大，盛传第九中队和第五中队都是共产党的部队。在此情况下，“北特”为了不致影响莫雄，决定第五、第九中队不再使用“挺二”的番号，改称“广东西北区人民抗日同盟军大队”。第四大队在英东一带，也招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1945年夏，“北特”决定将该大队编进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同盟军大队则编进东江纵队西北支队。

特务第二中队于“挺二”结束后，绝大部分人员转去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另外，桐华还以“挺二”名义，组建过两个战时工作队，1944年6月由林名勋组织韶州师范学校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三十多人来英德。1945年初，由中共

英西地下党组织由连县来的文理学院附中及越秀中学等学校地下党员及进步学生三十多人，由莫雄的儿子当队长，中共地下党党员任副队长。由于该队有莫雄两个儿子在那里，极得莫雄的喜欢和信任，因地位特殊，在对外活动上很为便利。这两支战工队，运用各种方式，在部队、群众中，宣传坚持抗战、进步、团结方面，都起到不小的作用。

在上述这些队伍的组建工作中，桐华在上层工作方面，作了极大的努力，到处奔走，疏通各种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真是做到呕心沥血了。

这里，再记述一些为了共同抗日，既照顾到莫雄的处境，又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的例子。1945年6月，莫雄接到战区命令，要“挺二”扫荡在英德黎洞一带的东江纵队西北支队。莫雄对此很感为难。执行吗，既违背他的政治主张，也使双方都要受到损失；不执行吗，不好向战区报帐。于是，他找桐华商量，要桐华负责带队并组织这一军事行动。黄松坚既布置桐华起草一个既能保护西北支队，又不使莫雄损失力量，还能应付战区命令的行动计划；并派英西工委书记李福海兼程赶去西北支队，传达“北特”的意见，约好部队行动的时间、路线。届时，桐华率领四百多人的队伍，虚张声势地进入黎洞一带，朝山头放枪打炮。西北支队则早已转移到别处，演了一出假“围剿”的“军事旅行”。事后，“挺二”还得到战区“剿匪”有功的表扬，莫雄很感满意。两个月后，西北支队由英（德）清（远）边北上，国民党驻军要莫雄在西北支队北上途中予以堵截，这一任务又落在桐华身上。根据黄松坚的指示，桐华带领了“挺二”两个中队赴英德马口一带，名为堵截实是掩护部队安全通过。

由于桐华一贯执行中共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诚心帮助莫

雄搞好部队，从而取得莫雄的信任。用莫雄的话来说就是“那时，我索性把一切司令部大小事都交给黄桐华负责，大旗由我担，家由他们当。”因此，由桐华出面提出的一些要求，莫雄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予以种种方便，真是做到互相帮助，真诚合作。

当时，“北特”和所属地区一些职业革命工作者，没有公开合法的身份，为了掩护的需要，根据黄松坚的要求，桐华以政治部和一些朋友在北江一带做行商生意为理由，先后向莫雄领了二三十个“挺二”的符号（即部队的布质陶章，不穿军装时不需挂戴），填写的职务，是政治部干事、谍报员（谍报员属谍报组。该组是“挺二”以搜集敌伪和共产党的情报为名的机构，实是“挺二”进行走私漏税的松散组织，间中也搞一些情报）。此外，还有由政治部出具的证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掩护“北特”书记黄松坚的工作，主要是依靠桐华做的。他的住地，是桐华租赁的，就在“挺二”司令部旁边；他的身份证件是桐华提供的；他的家属，有段时间就住在桐华家里。1942年冬，因发生“粤北省委事件”，暂时停止党组织活动，根据黄松坚的意见，英德县特派员谢永宽在“挺二”政治部，挂了个上尉干事的名，隐蔽了半年。1945年黄松坚又通过桐华的关系，派肖少麟、雷毓彬等以“挺二”的名义，在英德横石塘建立秘密交通站，沟通为日寇所隔断的路东、路西之间的联系。此外，有一些为国民党反动派扣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也由桐华通过莫雄出面去营救（如赖奕辉、何亦洪和民主人士肖怀德等八九人）。几年来，黄松坚及“挺二”的地下党员，即使在“粤北事件”中共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时，也没有停止过工作，虽处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但一直平安无事，这与桐华的

工作不无关系。

早在1940年，黄松坚即提出“北挺”的党组织要起到北江“瞭望哨”的作用。要运用一切合法身份去搜集敌、伪以及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情报。这有如下几条途径：“挺二”的地下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通过广交朋友去了解有关的动态；担任情报参谋的地下党员，掌握了电报密码，能从战区、驻军、各县来的密电中，毫无遗漏地取得情报。即使有的绝密电报，报头说明要莫雄亲译的，但莫雄也交给担任参谋的地下党员去办。如战区命令“挺二”进击西北支队和战区查究桐华等是否共产党的密电，都是地下党员最早知悉的。桐华在这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1943年英德县成立“党工汇报”，这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活动形式，桐华以驻军政治部主任身份参加（任英德县教科长的地下党员云昌遇也参加），从哪里获得不少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动态；平时，桐华常从国民党军政头目那里了解一些情况。桐华掌握的“挺二”政治部、国民党特别党部，经常可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政治情报，如战区政治部每旬就有一份关于敌伪和共产党的《综合情况》发来。还有由桐华出面派过一个地下党员到连江口沦陷区日寇检查站去工作，了解敌伪动态。从以上途径获得的情报，凡有价值的，都及时上报“北特”，以供参考。

1942年中共粤北省委受到破坏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指示，要广东地下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党员疏散隐蔽，执行“三勤”（勤学习、勤工作、勤交友）的方针。因此，有不少党员需要谋取职业，以便掩蔽下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梅县和北江各地一批地下党员，先后来到英德，根据“北特”的指示，其中不少人是通过桐华的社会关系，安排

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更多的是安排到中小学校。学校既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又是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开展武装斗争后，在学校工作读书的不少同志又转去了部队）。为了支持地方党的工作，桐华对学校的工作也尽力予以协助。如1941年“北特”部署英东地下党创办英东中学，国民党当局加以阻挠，不予立案，桐华与学校筹建负责人陈仁畿奔走各方，疏通关系，直至1943年才得立案，使这间学校取得合法地位，为中共培养了一批人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英东中学的绝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部队。

“北特”由于革命工作的日益发展，亟需筹集经费。当时的粤北，粤汉铁路及不少公路均不通车，交通运输主要依靠大小北江船只，如能在大小北江经营行商，是可筹集到经费的；但需要在北江有势力的后台做牌子，工作才可免受阻力。1943年秋，黄松坚布置桐华和黄漫江（“挺二”政治部的地下党员）积极集资，以政治部名义派“北特”地下党党员马秀居，打着“挺二”的牌号，在连阳一带经营行商。1945年初，由桐华以新建的第四大队等队伍经费困难为由，向莫雄提出建立“昌兴公司”，由“北特”财经小组负责人邓重行、马秀居、李学林负责。由于经营得力，赚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全部上交“北特”。1945年又与莫雄合股在清远设立“志通行”（这个牌子是桐华取莫雄的别字志昂的“志”字而命名的），与“昌兴公司”相配合。赚到的钱，莫雄分得了相当部份，很是高兴。

桐华的统战工作之所以完成得这么出色，除了他本人的努力之外，主要是依靠了“北特”坚强有力的领导和“挺二”内部地下党同志的密切配合；同时，也是由于有个与共

产党长期真诚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莫雄。

“北特”对“挺二”地下党的领导，主要是由黄松坚面对面的领导。由于黄松坚有非常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经验，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家长”。1942年秋以后，他与桐华有了直接联系，经常交谈情况，商讨工作，这对桐华的成长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家长”对桐华从政治到一般生活，都关怀备至，经常询问他在工作、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还常对“挺二”中共地下党有关人员嘱咐，要维护桐华在国民党的社会地位，提高他在国民党的威望，绝不能让他暴露。黄松坚要求桐华做的事，总是从他的公开身份这一实际出发的。1943年元月，第四战区政治部要桐华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中训团是蒋介石为维护其统治，带有特务性质的训练机构，桐华对于去还是不去，感到为难。黄松坚认为，为了长期隐蔽，取得这个牌子，有利于今后的工作，毫不犹豫地同意桐华去受训，并交待了一些应付的措施。当时是中共广东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的时期，消息不很灵通，“家长”要桐华设法从多方面去了解形势和国民党的动态。桐华在受训期间，就以第三党人的身份向该党领导人章伯钧，了解到不少各方面的政治动态。桐华受训归来后，在英德河的小艇上，向“家长”和“挺二”地下党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受训情况和当前政治形势，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所谓防止异党的种种“反动措施”。在这次会上，“家长”的情绪很好，感到满意，对桐华在受训期间为了不暴露身份而采取的应付办法，表示赞赏；并对桐华取得这一“正统”身份以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解放后莫雄在一次谈话中，有这么一段评价“家长”的话：“黄松坚真本事，他长期住在我公馆附近，但我不认识他。我在幕前指挥‘挺二’，他完全清楚；他在幕后

指挥‘挺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从另一侧面描绘了“家长”领导工作的艺术）。

“北特”关于在“挺二”统战工作的正确指示，是要通过“挺二”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桐华去组织实施的。桐华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对共产党事业一片忠心，并富有才华。他对党的统战工作原则，总是力求结合实际去贯彻，对党组织交付的具体任务，也尽力去圆满完成，即使偶有思想上不够愉快，但接受任务后，仍能在行动上服从组织去执行。比如，黄松坚第二次提出再要一些“挺二”的符号，我向桐华转达了这件事，桐华认为统战工作要礼尚往来才能持久，只是要莫雄帮助，而我们对他的帮助不多，那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因而他对完成这一任务有畏难情绪。我同意桐华的看法，想把此事推迟一下再办，但桐华还是趁着一次莫雄心情好的机会，再次要来了一些符号（桐华向莫雄建议或交谈重大问题时，总是善于捕捉莫雄较顺心的时机）。桐华即使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既能坚定地站稳立场，又善于巧妙地不暴露身份地对待各色各样的人和事，敏捷、机智、沉着地周旋。做到同流而不合污，真是地地道道的“白皮红心”，这里只略举一二。

1945年夏，由于第五、第九中队不再使用“挺二”的番号，莫雄认为我们事前没有跟他商量，特别是拉走了他本人在第五中队的武器，颇有意见。桐华对莫雄说，五中、九中的事，如果战区追究起来，可把责任推在我身上，不让司令官为难。同时，桐华还向“北特”建议，拿出一笔款给莫雄，作为带走武器的补偿，缓和了与莫雄的关系。同年10月，战区来电追查黄桐华以及何俊才、陈仁畿、杜国栋（他们三人那时已经去了我们的部队）是否“奸党”，莫雄

对桐华说：“我这里哪有共产党？你说，你是不是共产党？”桐华说：“不是。”莫雄说：“那就不用理他。”桐华说：“这样的大事，你怎么样下台？”莫雄说：“我自有办法。”以后，莫雄在电话里对余汉谋说：“我通过多方面的了解，黄桐华等人都不是共产党，黄桐华是黄琪翔的兄弟，又是你们政治部派来的，他是共产党，把他派来，难道想害我吗！”以后就再也没有追查了。

桐华是怎样从一个旧军人成为民主主义者进而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呢？这条道路是曲折的，但又非偶然的。

桐华出身于破落的家庭，父亲在海外经营小商，境况日益衰落。桐华19岁时到广州读书，因经济困难，只读了一个学期，就不得不离开学校，一面跟舅父学中国古典文学，一面以做家庭工役为生，工作辛劳，主妇还对他刻薄。第二年，父亲去世，家境更困难。桐华在年青时，就从家境日益贫困和辛酸的工役生活中，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

1930年，桐华再次到广州谋生，进入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处任少尉科员，从此踏进国民党的军政界。他虽先后取得燕塘军校、庐山训练团的学历，但缺乏有力的后台，直到他参党的1941年，还只是杂牌部队的一个中校政训组组长。他在国民党军政界有十多年的经历，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贪污腐化、欺诈人民以及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排斥异己等腐败现象，是看透了并且深恶痛绝的，他认识到国民党是搞不好国家的，抗战后，更认识到单靠国民党也是打不败日寇的。

1930年，桐华在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工作时，认识了第三党广东负责人李伯球，当时郭翘然、李伯球

等组织了一个“予庐”图书社，有不少进步书籍，一些第三党人常聚会在那里。桐华开始受到他们的政治影响，并在那里读了一些进步书籍。1932年，由李伯球介绍桐华参加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现在的农工民主党）。从此，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第三党人，特别是其中的左派。1936年，桐华在燕塘军校读书时，与陈柏麟、钟顺源、张剑魂、李义容等秘密地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并联系了中大、广雅的学生组织读书会，响应“一二·九”运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第三党领导广州沙河的农民和知识青年共一百多人，撤到新丰县，编为国民党第六十五军前敌指挥部别动总队，桐华任副总队长，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桐华参加第三党后，由于受第三党中的进步分子李伯球、曾伟、陈柏麟、梁劲夫、陈晓凡、梅日新、钟国辉等人（其中有一些先后参加了共产党）的影响，对桐华政治思想的进步起了良好的作用。他主张抗日反蒋，同情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有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段时间中，桐华经常与一些第三党的左派，谈论要找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

抗战爆发后，出现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桐华找寻共产党的愿望日益增长。1939年初，他在韶关第四战区司令部当少校副官时，与在消费合作社工作的地下党员朱河康相熟，桐华意识到朱可能是共产党员，曾向他提出参党的要求。朱没有答允，只是鼓励他继续努力。朱事后对人说，那时他们那里是不能发展党员的。同年冬，桐华任战区游干班的第二中（政训）队中队长。该班的三个中队的政治助教都是共产党员。杨应彬就是桐华所在中队的政治助教，他们之间配合得很好。另两中队的政治助教是朱河康和郑黎亚。桐华中队的学员中也有一些中共党员。桐华在游干班中，在政治上表

现进步。该班地下党曾组织一次公开的辩论会，以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主题，辩论会把主和派批得体无完肤，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个会是在桐华主持的中队召开的，并且由桐华出面组织辩论。

1940年11月，桐华调来“北挺”后，凭着他的政治敏感，察觉到这里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桐华的好友梁劲夫把他的学生林名勋介绍给桐华，并说林可能是共产党员。从此，桐华积极主动接近林和其他一些党员。名勋虽是一个十多岁的中学生，但才华出众，有“神童”之称，黄、林相处虽然只有几个月，但深谈了很多问题，这对桐华进一步认识共产党有不少的作用。1941年初，林名勋因一信件为“挺二”政训组组长（也是第三党人）邮检获得，怀疑林是共产党人，在一次政训组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指责林和另一位党员，说他们活动得太厉害了，已引起特务的注意，要他们离开政训组。当时会议气氛紧张，桐华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认为那是捕风捉影，更不应该这样对待抗日的进步青年。会后，桐华继续对该组长进行工作。林等两人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意见，还是安排他们撤离了。从此事，说明桐华鲜明的政治态度。名勋离开前夕，桐华向他提出了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北特”对桐华在游干班时的政治表现已有所了解，他来“北挺”后，黄松坚即嘱咐“北挺”地下党组织对他作进一步的了解（包括历史）和加强教育，并经常过问他的各种表现。桐华的参党，是经“北挺”地下党组织审查同意后，报“北特”并省委批准的。他参加共产党后，“北特”仍要他保持第三党的关系。为了工作的便利，1946年，黄松坚还批准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同年，他被选为第三党后补中央执行委员。八十年代桐华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顾问、农

工民主党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挺二”于日寇投降后宣告结束，改为北江交通警备指挥部，莫雄任指挥，桐华任副指挥。1946年4月，党组织调桐华到广州、香港担负统战工作。至广东地区武装斗争恢复后，中共党组织先后调他任粤赣先遣支队长、粤赣湘边纵北江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他历尽艰险，指挥作战，和游击区的人民同甘共苦，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悼词》语）。

解放后，桐华历任曲江县委书记、北江人民临时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参事室副主任，继续为统战工作尽力终身。

解放后，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桐华曾多次受到审查和冲击，受到不公正的处理，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使他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然而，桐华一贯能正确对待，忍辱负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胸怀广阔，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悼词》语）。

（作者系广东省科协副主席，现已离休）

六十二军与军长黄涛

廖蕊光

牛背脊破敌

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之后，不断侵犯广州周围各县，妄图扩大和巩固其它占领的地盘。他们意图打通粤汉铁路线，北面由武汉进攻长沙，南面由广州进犯韶关。

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军，主要部署在西起清远源潭，经佛冈、从化牛背脊、吕田到龙门的地派一线，与广州外围之敌对峙。

粤北驻军的主力是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是余汉谋。集团军总部设在翁源县之三华。下辖三个军：62军，军长黄涛；63军，军长张瑞贵；65军，军长缪培南。65军为总预备队，驻翁源之新江和曲江的马坝。62军驻佛冈、从化。63军驻清远濠江口一线。并以65军军长缪培南兼任前线总指挥，统一指挥三个军。这是当时粤北的敌我形势。



62军军长黄涛

1939年12月，广州之敌，佯攻三水，造成进攻肇庆模样。65军158师即调往四会防守。同时，另一股日军，则由广州经军田进占银盏坳。12月中旬，62军152师和157师奉命由佛冈西移，进击银盏坳之敌。黄涛即令157师先派一个团

向银盏坳进击。首先向敌人的一个山头制高点进攻，必须拿下这个制高点，才能进入银盏坳，敌人的火力猛烈，仰攻不易。于是再派一个炮兵营，由157师师长练惕生亲自指挥，先用山炮、迫击炮向敌堡猛轰，步兵随即猛冲上去。但由于敌人的工事构造灵活而坚固，冲上去三次，都不能摧毁它的堡垒，无法夺回山头。经过一周时间的战斗，我军伤亡颇大。黄涛便亲到银盏坳前线察看，他了解了敌军兵力情况、工事建造分布情况、银盏坳的地形和位置，作出判断：铁路线不是敌人的主攻方向，敌占银盏坳的目的，是坚守银盏坳，把大量的我军吸引到这里来。其主力必然在东线沿从化公路北进。我们不要中计，对银盏坳之敌不要强攻，只须留部分兵力，在这里监视敌人的动向，我们要转向东线。他把这情况上报请示，得到上级的同意，62军调到佛冈上四九一带略事休整，由65军接替银盏坳防线。

62军刚到佛冈，广州之敌，已开始大规模行动，由从化沿公路北犯。至12月24日，驻良口、牛背脊的186师因受优势敌军的猛攻，被迫撤出良口和牛背脊，师长赵一肩率一个旅与其另一个旅（旅长张泽深），且退且战，撤至沙田。敌军继续疯狂进犯。12月25日，吕田、小杉、铁扇关门、地派等地，又相继陷敌。敌军随即越过华眉堂、梅坑，即分兵西犯。27日黄昏侵入英德青塘，直迫翁源三华十二集团军总部，韶关震动。省主席李汉魂已准备把省机关东迁梅县，其他机关西迁连县，疏散全城居民，然后纵火烧毁韶关，不留一粒米、一片瓦给敌人，叫做“焦土抗战”。韶关人心浮动，秩序混乱。正在此时，62军接到十二集总部电令，要62军北撤至英德北江东侧鸡颈坑、罗家营以北上太、下太东西一带山地防守。黄涛不同意，他对着参谋长说，现在局势严

重，敌人已占青塘，如突破翁源，直趋曲江，韶关就保不住。如韶关失陷，情况太严重了，敌人北向与犯湖南之敌相呼应，南接广州，把广东分割为东西两块，那就不堪设想。因此，必须保住韶关。但要保韶关，必须进攻，不是退守，必须进攻敌人的要害处。他即叫参谋长用有线电话接十二集总部。黄涛向余汉谋报告目前敌我情况，讲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提出改变战略，以攻为守，建议：1. 敌人倾巢出动，留广州的兵力单薄，62军即由佛冈直攻广州；2. 敌人孤军深入，一切给养靠广州输送，斩断他的输送线，截断他的后路，敌人必然崩溃，由62军负责进攻牛背脊、良口之敌据点；占领牛背脊之后，则北进吕田，扫荡梅坑之敌。各军可以沿线分段夹击，这样必然可以克敌制胜，保卫韶关。这两条计划，应采用哪一条，请余汉谋决定。余汉谋听了之后，不敢立即决定，叫黄涛保留电话五分钟，不要放下电话机，等他和副总司令王俊、参谋长张达商谈一下。五分钟后，余汉谋对黄涛说，进攻广州不容易，过于冒险，可按第二计划行动，并将186师归黄涛指挥。余汉谋回答了黄涛之后，感到形势紧张，胜负未可料，便偕同王俊后撤到曲江去了。因为他还不敢相信黄涛的计划能成功，所以早走一步。

黄涛得到余汉谋的决定之后（当天是12月26日），立即召集参谋长、师、团长部署作战行动：

（1）157师由正面向牛背脊进攻，立即迅速行动，经由耀洞于27日拂晓进攻牛背脊之敌，并即占领牛背脊。

（2）张泽深旅由沙田圩迂回经潭下，向牛背脊前进，与157师密切配合，并掩护军之左侧。

（3）152师立即行动，向良口及其附近之敌攻击前进，堵住良口之敌，阻止日敌向牛背脊支援。

(4) 军指挥部即晚由石脚下东移至离牛背脊十五华里的财福岭，必须于27日下午到达。

当时62军在政工人员积极宣传鼓动之下，全军官兵都明了这一战役歼击敌人的重大作用，士气旺盛。并组成军民联络站，协助运送弹药，抢救伤员。战斗部署完毕后，军长黄涛立即星夜挥军东进。接受战斗的队伍，在上级指挥之下，都按各自的任务进程，勇猛冲向敌阵。进行快速攻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12月27日，62军作战经过概况：

(1) 152师于是日拂晓前到达良口流溪河西岸一带山地，占领制高点，钳制良口之敌，测定距离，用步兵炮，机关枪猛烈射击，使良口之敌龟缩在掩蔽部内，不敢出动。同时也截断了通往牛背脊之路。

(2) 157师于是日拂晓前疾进到箭竹附近，遇敌之警戒部队，立即把他肃清，少数残敌即向牛背脊方向奔逃，我军乘势尾追敌人，攻入牛背脊敌人的据点，敌仓惶抵抗，展开近距离的激烈战斗，敌尚欲顽抗，我军逐渐开始两侧包围，使敌伤亡惨重，无力继续抵抗，残敌在黄昏之前即纷纷向吕田、良口方向逃窜。我157师即胜利占领了牛背脊，继续搜索残敌，来不及逃跑的，尽被俘虏。是役，缴获大批山炮、弹药、马匹、汽车、粮食等物资。并发现敌人新烧的骨灰堆十多处。同时，张泽深旅也于是日进出牛背脊东北财福岭地方，控制住吕田方面之敌，完成掩护军之左侧任务。

28日，157师仍占据牛背脊及附近山地。152师由良口附近撤至财福岭集中，准备向吕田方面之敌攻击前进。同一天，65军军长兼前线总指挥缪培南率158师、187师，由灕江附近到达牛背脊西北约四十多华里的牛屎粪村一带，黄涛已与缪

培南接通电话，报告了占领牛背脊以及敌人溃退情况。并即商定：65军负责扫荡青塘一线的残敌，62军进占吕田之后，即截击梅坑一带南逃之敌。这样，由1939年12月27日以62军攻占牛背脊开始的粤北抗战，便于1940年1月1日胜利结束。做到速战速决，使广州之敌，无法救援。这一胜利，使敌人遭受严重损失，挫败了敌人打通粤汉线的阴谋，使困于广州的敌人直至投降，不敢再向北蠢动一步。我们则由此一战保全了韶关，避免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仁化设立“后办”

仁化，当时是62军后方基地。在县城设有62军后方办事处。县城之北溯锦江而上数十里河边有个山村叫药普（药湖），是62军军火库所在地。这个地方，因在群山环抱之中，不容易被发现，而又可通船只，易于转运。办事处装配有无线电收发报机，可以同军部及其上级机关直接联系。在仁化驻有一个营的兵力，负责保卫后方的安全。另在连平的陂头设有粮库。

日寇在牛背脊遭受重创之后，龟缩广州，不敢再贸然北犯。而62军仍驻守在英德、佛冈至新丰一线，严密监视着广州敌军的动向。时灆江口以南路轨，已全拆毁，判断敌人不可能沿铁路线窜犯。因而把重点放在东侧广韶公路线，将62军军部从佛冈石脚下，移驻英德之青塘，加强对公路线的控制。一方面积极对部队进行休整。

此时，军长黄涛认为62军有两个问题要得到妥善处理。一是，此时62军的武职人员和文职人员的家属，多有随军居住在前线的。军队没有家属宿舍，只能借住在附近百姓家里，住地分散，一旦有事，有碍于军队的紧急行动。一是当

时国民党征兵制度腐败，流弊极多，有抓来的壮丁，或出钱买人冒名顶替应征，名目繁多。因此，所征的兵员中，有超龄的老兵，也有不及龄的小兵。这时，62军各师补充的新兵中，有一百多名年龄仅在13岁至16岁之间的，被叫作少年兵。这些少年兵，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卖身顶替来的，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技能，在军队中不但没有作用，而且成为一种负担。黄涛以为这两件事不解决好，必将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1943年春，黄涛在英德的桥头，召开师、团长和参谋长会议，决定：1. 全部随军居住的家属，迁移至仁化集中居住。2. 在仁化设立一间学校，把全军的少年兵送往仁化读书。这个学校还可吸收家属子女和当地学龄儿童就读。教师由政工队员中抽调和家属中挑选充任。具体工作，由仁化后方办事处负责进行。由军派工程兵一个连到仁化协助建造工作。这样，黄涛就妥善地解决了62军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方面提高了62军兵员的素质，另一方面则解除了军内文武官员的内顾之忧，全心全力参加整训，加强抗击日寇的战斗力，而在仁化建校办学，也是对当地群众的一种贡献。

仁化后方办事处接受任务后，首先选定仁化老城后面石坳背一带荒地（即现在仁化县新城所在地）为建校和建住宅用地。当时那里有一段公路（即现在的新城东路），公路东面，建筑学校、教工住宅和学生宿舍；公路西面，建家属宿舍，这个宿舍区就名为“六二新村”。军长黄涛的家属也住在“六二新村”的西南边一座砖瓦房里（即现在仁化县招待所附近）。此外，在三板桥、大肚岭两个点，也分建了部分的家属住宅。

宿舍住宅的建筑，都是茅草竹木结构。学校的课室、礼

堂、办公室是土砖和瓦木结构。全部工程是由工兵连完成的。1943年8月，在前线居住的家属，开始迁至仁化。各户自己开荒种地，畜养猪鸡，做到副食自给，这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是必要的。

学校校舍的建筑，也于同年秋完成。为了纪念粤北战役牺牲的62军157师连长连士英，把这个学校定名为“士英学校”。委派军部秘书廖蕊光为校长，学校经费由军部拨给。学生不论是少年兵、家属子女和当地招收的儿童，都不收学费，全部住校。全校学生同学习、同食、同住、同劳动，完全过着集体生活。当地学生每月只交自己吃的米粮二十斤，其余不收任何费用。当时不单附城的孩童大量来校就读，即远在夏富一带的儿童，也多来此入学。1943年9月开学时，学生已达三百多人。

1944年夏，日军由长沙南犯，衡阳告急。62军奉命由粤北入湘，驰救衡阳。在衡阳一战，给敌人以重创，当时新闻界称62军为“节制之师”。但62军亦遭受极大的损失，副师长余文波，团长丁克坚、钟敬孚俱在阵前战斗中牺牲。不久，黄涛即电告仁化办事处，把士英学校改名为文波学校，以纪念余文波为国捐躯。

1944年冬，正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地上垂死挣扎，不能自拔的时候，忽然有一小股日寇流窜到仁化。这时我们在仁化已经没有驻军。当敌人窜犯到乐昌的时候，仁化县城的机关学校以及老弱群众，已向四乡疏散。文波学校和所有家属，迁移至扶溪，62军后方办事处，迁到扶溪附近的双合水。这一股日寇，好象是惊弓之鸟，到仁化没有什么停留，只把六二新村的房子烧了几间，在村口公路上遗下一条死马和一辆破汽车。在扶溪也烧了一些房屋，杀了一口猪。就仓

惶由扶溪经长江向江西方面遁去。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62军由广西进入越南，在河内，黄涛会见了胡志明。黄涛向胡志明赠送了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胡志明也赠送了黄涛陶瓷器皿和法国餐具等礼品。不久，62军就由海防乘船到台湾接收，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整五十年的领土台湾，终于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回归了祖国。

62军到达台湾之后，通过无线电报与仁化办事处直接联系。这年12月，黄涛来电：将文波学校迁往台湾，教师、家属愿意去的，都可以去，学生除少年兵学生外，其他可以不去。并指定由文波学校校长率领前往。

1946年1月，62军文波学校教职员和学生，以及家属约二百人，离开仁化，经韶关、梅县到达汕头，转乘轮船到基隆港登陆，然后乘火车经台到达62军驻地台南。文波学校继续在台南开办。我随即辞去校长的职务。这时正是1946年春节。

在台南，与军长黄涛交谈了各自的情况，我汇报仁化的情况之后，他立即决定：撤消62军驻仁化办事处，残留的库存武器上缴总部，办事处及学校房舍归地方政府处理，保留了私人住宅。62军在仁化的关系便结束了。

被 撤 职 后

我到台南不到十天，黄涛接到蒋介石电召去重庆。到重庆等了一个月，蒋介石侍从室才给他通报。黄涛见到了蒋介石，蒋命令他把62军调往秦皇岛。黄涛提出：台湾是新收复的地方，驻军台湾很重要，请求免调。蒋介石听了，桌子一拍，骂声“混蛋，你敢抗命，马上撤职，滚。”黄涛一个向

后转，背向蒋介石出来，走了。过了几天，有了正式文告，以62军军长黄涛违抗命令，不服从调遣，应予撤职，由151师师长林伟偕晋升为62军军长。黄涛在国民党时代的事业便这样结束了。

回想起来，黄涛自任62军军长以来，是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仗的。以前，也没有参加过“剿共”战争。我任他的私人秘书期间，经常和他在一起，没有听他讲过共产党的什么坏话或怪话。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我还不明白。有一次，我挑起来问他：“听说你和叶剑英是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是吗？”他答：“是。”我说：“好，两个老同学，现在一个在共产党，一个在国民党，国民党要反共，要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怎么办好？”他忽然站起身，把烟头往泥地上一丢，脚一踩，说：“我告诉你，谁也消灭不了谁，国民党消灭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消灭是消灭不了的。”接着，我又问：“如果这样，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要永远打下去，永远天下大乱，中国的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了。”他说：“那也不一定，办法是有的，而且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双方和解合作。你明白吗？国共之争，是两党之争，不是两国之争，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争，同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和，有爱国心就能和。”我喜欢他的坦率，表达出对中国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态度。我心里有了底。所以当他应蒋介石之召，由台湾去重庆时，我送他去台北乘飞机，住在台北郊外北投温泉太和旅馆。晚上，客人走后，他问我：“你认为叫我去重庆是为什么？”我说：“可能要把62军调回大陆。”“为什么？”我说：“因为现在准备打共产党，调回大陆就是参加反共战争。要慎重考虑。”黄涛站起身，在室内走了几转，又

坐下来，说：“我不干，打内战我不干，我宁可不当这个军长。”我听了这个话，心里安定下来。我说：“好，以后的事以后商量。”第二天，他就坐飞机去了。这时，我已意识到他的军长做不下去了，但应该为他找一条新路。

1946年4月，他从重庆到了南京，发电来要我到南京去。4月30日，我从台北飞上海转往南京。在南京他谈了到重庆见蒋介石的情形。然后我问他：“今后准备怎么办？”他说：“这里不好谈话，先回家去。”要我回台湾去，把文波学校结束，将所有不愿意再跟62军去的人员送回汕头，然后再安排他们的生活、工作。他从上海回蕉岭，我从台湾回汕头，然后到蕉岭他家里见面。5月中旬，我再到台湾，把黄涛交办的事办妥以后，8月再由台湾返蕉岭见黄涛。我知道他和李济深、张文（解放后任广东省副省长）交情颇深，我劝他到香港找李和张，因当时民主人士云集香港。我对黄涛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明了国民党垮台的必然性，到香港去是一条新的出路。他要我先去香港见张文，征询一下他们的意见。

1947年春，我到了香港，见到张文，谈了一些情况，他就带我去见李济深，我向他叙述了黄涛的情况。李济深立即提笔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我带给黄涛，并说：“告诉肇坤（黄涛字），要快来，快点，迟了就不赶上。”由李家出来，到了张文家，我问张文：刚才任公说迟了赶不上是什么意思？张说：“我们要北上，不久要开新的政协会议，要肇坤一同去。”我即返汕头，黄涛已到汕头，把会见张文、李济深的情况告诉了他，把李济深的信交给了他。最后我对他说：“希望你不要迟疑，快点去，前途是美好的。我本来是教书的，军、政界不是我的本行，现在抗战胜利了，我们就

各奔前程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离开了黄涛。我想我已尽了自己的责任。

解放初，在广州忽然见到黄涛，才知道他在汕头时，因为一些事拖延了，后来到香港时，李任公和香池（张文）都北上了，没有办法，只好在香港等待广州解放。解放后才和道英（叶帅之弟）一起回来。我问他是否在广州住下去，他说想去仁化住一个时期再说。他好象对仁化特别有感情，时常念念不忘仁化。记得抗战时期李济深到韶关来看他，他也要把李济深请到仁化住两日，李济深还写了一幅字给他留念。其实黄涛在仁化并没有什么财产，只一座两层共八间的楼房，和一些士兵、杂工、保母住的平房，屋前屋后大概有二、三亩地种蔬菜瓜果，在外门上写了两个字，号曰“南园”。从1955年以来，他历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于1973年12月17日因病逝世，终年73岁。

注：关于牛北脊战役的具体材料是省政协委员黄锦翔同志提供的，他参与了该战役的全过程。

〔作者简介〕廖蕊光，现年85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现已离休。

李煦寰其人其事

钟承宗

李煦寰，字彦和，广东惠阳县人。1896年生于世代书香之家，现年91岁。李的中国文学修养甚佳。初从事秘书工作时，即出类拔萃。拟办文稿，处理案件，既快捷，又稳当，同僚莫不佩服，有“秘书王”之称。

在广东陆军小学肄业时，与余汉谋同窗，又是结拜兄弟。曾与周恩来总理等同在一个时期留学法国，时有往还。三、四十年代，余汉谋在历任国民党第四路军、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和第七战区总司令或司令长官时，他相随其属下为政治部主任，辅佐余汉谋治军，主管部队政治教育工作。

他留学法国时，受到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影响，即参加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关心国家兴亡，以救国救民为己任。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激于民族义愤，对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决心抗日。1938年，他就任第四战区政治主任伊始，就对政治工作十分重视，除延揽人才充实政治部机构外，并招收60名知识青年，组成政治工作大队，致力于抗日宣传和动员群众工作。

1938年10月11日，日本侵略者在惠阳大亚湾登陆，直向广州进攻，企图打通粤汉线。当时负责保卫广东的余汉谋部队，没有予以坚决的抵抗，一触即溃，广州遂于21日沦陷。这固然是余汉谋的奇耻大辱，而李煦寰亦深引为咎。他与余

从广州撤退至翁源后，深感军心涣散，士无斗志，而众皆指责，更觉无地自容。为了挽回广州失守的声誉，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认为非认真改造军队素质，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战斗力不可。于是他献谋献策，大力帮助余汉谋训练官兵，整编部队，重振军容。随即在翁源南浦成立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分期分批抽调各级军官予以训练；同时招收大批青年学生，先后在翁源香泉水开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和在始兴东湖坪设立政工人员补训班。由于教育方针正确，讲授学科对头，经过训练的军官和学员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政治水平提高了，工作能力加强了。他们回到或派到部队各个战斗岗位上，都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在改造军队素质和提高战斗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煦寰在抗战初期，就忍辱负重，运筹帷幄，为协助余汉谋坚持抗战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一)

李煦寰在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在他任内，能重用一批爱国民主人士，特别是能招收大批进步青年作为其部队政治工作的骨干。如在第四战区政治部，任用知名学者尚仲衣、钟敬文教授为科长，还有许多进步文化人，如黄新波、郁风等为中层干部，其中也有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如石辟澜、钟远蕃等。

他还在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聘请第三党人（农工民主党前身）郭冠杰教授为顾问，陈卓凡、郭翘然为主任秘书，张育康为政工人员训练班训育室主任，王鼎新为政工人员补训班和政工总队部总干事等。这都说明了他能做到任人唯贤，只要是抗日爱国的，都付以重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政治部属下的政治大队和政工总队八、九百队员（其中大部分是抗先队、艺协、锋社和蓝白剧团以及香港、澳门回国服务团的同志，也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能大胆使用，放手工作。而且做到在关系上亲近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在工作上帮助他们。有疾病的，予以照顾；有困难的，设法解决；有成绩的，及时表扬。这是不可多得的。

在他任期内，政工人员的思想言论也比较开放。如在训练班中，教官固可以用进步的革命理论作为讲授的内容，学员也可以公开阅读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等著作。同时，对学员的各项活动，如出版学习墙报、举行时事讨论、大唱抗战歌曲等，也不加限制。这就使得学员们能以革命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在学习和工作中茁壮成长，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为抗日战争作出重大的贡献。

当年分散在第十二集团军各军、师、旅、团深入连队基层工作的政工队员，对鼓励士气、振奋军心，改造国民党部队的素质以及提高官兵的战斗力的，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底和1940年春粤北第一、二次大战获得辉煌的战果，与政工队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对李煦寰大胆使用这大批进步青年开展部队政治教育工作来说，自有他一定的功绩。

（二）

无可讳言，在李煦寰主管所属部队政治工作的过程中，也发生过一些令人极为悲痛的事件。1941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在全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反动派的魔爪已伸到第七战区政治部。李煦寰的开明作风，大胆任用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大批进步青年之举，早就为特务

分子所注意。李煦寰之所以在1940年8月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后时隔四个月多才迟迟发表他为政治部中将主任，就是因为蒋介石对他有所怀疑，认为他任用左倾分子太多。因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除派军统特务李国俊为第七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中统特务谢玉谔为第七战区国民党特别党部少将秘书长外，并安排中统人物吴崇禧为政治部少将主任秘书、特务分子丁养光为上校秘书、CC系人物陈藻文、陈国贤分别为第三、四组上校组长，就是从中监视和进行反动的勾当。李煦寰和第一组组长郭翹然于1941年3月被电召到重庆进了专以审查和培训中上级军政官佐而特设的中央训练团去受训，就是一个“不信任”的信号。受训一个月，李煦寰无疑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和被迫接受了打击进步青年的任务。所以，他受训回来后，精神压力非常沉重。后来就发生了十二集的“政工案”，对此，他是耿耿于怀，引以为憾的！

对于这件事，他能顾全大局，以团结抗战为重，没有把事情扩大化。那个时候，虽也有个别政工人员被捕，许多政工队员与进步人士被迫离开，但没有再发生被杀害的事件。他对绝大部分的革命同志和民主人士，还是照顾和宽容的。

就以我本人的情况来说，1941年6月，正是“廖案”（即廖锦涛等被捕）发生不久的时候，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有一黑名单下来，要逮捕一批地下共产党人，我也列入其中。当时我在第七战区政治部政治大队工作，早已感到空气阴森。一天，战区司令部副官戴立（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看见这个黑名单有我的名字，马上走来相告；政治部梁绮（中共地下党员）也看到这黑名单，通知我速走。我即向李煦寰请准长假，及时离开，他还为我函送至江西大庾重伤医院疗

治手疾。假如他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话，自不让我离开，又那能给我批准长假。这显然是他在“廖案”之后，网开一面的明智之举。后来，还让许多同志先后离开这个已成为白色恐怖所笼罩的韶关，是有他的想法的。

他也有过这样的流露，认为他的一生曾做过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这就是苦劝余汉谋脱离陈济棠。当时陈济棠主粤，有“南天王”之称。那时，余汉谋是陈济棠部下的第一军军长，李煦寰是第一军政训处处长。

当时，李以国家分崩离析，而广东省政府未能接受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的领导，认为非全国统一，政局安定，不足以御外侮，是以力劝余脱离南国一隅，投靠蒋中央政府，以便促进国共合作，共同反对日寇侵略。余经李晓以民族大义后，有所醒悟，允予投靠中央，余遂与张健等数人联名通电全国，服从中央，陈济棠乃告下台。从此全国一致对外，也为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早些年，当他听到余汉谋在台湾逝世时，曾写

孤舟
浪
知
九
自
自
獨
傷
耗
錫
詩
堪
痛

下了一对挽联表达了他的感怀。挽联是：

蒿目切分崩之痛，葵诚竭匡救之志，
事变感当年，午夜边城纾国策；
皓首绝结邻之欢，青山违同葬之愿，
泪枯迷哭处，斜阳烟柳怆登楼。

1986年，他九十诞辰，又感慨地写下自寿诗句：

酒肠枯竭诗堪补，琴韵悠扬调自高。
都可意会到他的心声（手稿见31页）。

（三）

李煦寰在广州解放前，因劝余汉谋起义不成，乃告退前往香港定居，以教书为生，过淡薄生活。据说，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余平仲、香港大律师余叔韶，在经济上曾予大力支持。他的长子李柱铭、次子李烈基，学有所成，一是大律师，一是名医生，对他也有一定的慰藉。他在港多年，对祖国和家乡，时怀久别思念之情，特别是对自己培育出来的政工队员，更有着强烈的感情。

他感到自慰而又自豪的，是他把当年政治大队和政工总队的队员，视为自己培养起来的爱国抗日的政工队伍。他觉得他们纯洁热情、朝气蓬勃、能文能武、斗志昂扬，非常可爱，每以“细路”称之（“细路”——即年青小伙子，广州话的亲切称呼），以示亲切。

1987年5月10日，来自港澳省外各地的当年第十二集团军政工人员三数百人，齐集在中国大酒店聚会时，亦曾放播他对这班“细路”亲切怀念的衷心祝愿的录音。前些时候，他还对人说，很想回来广州看看这班“细路”呢。

回忆当年活跃在“十二集”各个战斗岗位的青年们，时隔已四十多年了，今天大家不是做了爷爷就是做了婆婆了，但他仍念念不忘，说要回来看看他们，可见其情感之深与思念之殷。

两年前，我和原第四战区政治大队两位同志先后去港，曾登门访候他，一见面就笑脸相迎，不是拥抱亲颌，就是亲切握手。辞别时亦复如此，亲自送出门外，完全没有上司下属的架子，情谊一仍如故。其他同志到港找他，无一不受到他亲切的接见，盛情招待，坦率交谈，或拍照留念。

他患有腰病，要睡一种特制的床，即床的头尾两端，可以用手按掣任意升高降低的。由于病痛和年老的关系，令他的身高缩短了三寸。在港经常看西医，老是治不好他的症状，后来他转请了一位来自内地的中医，为他针灸，却逐渐好转，结果，平坦的睡床也可以安眠了。因此，他对祖国的针灸疗法，非常赞赏，说它有其一定的科学根据。

1987年7月于广州

〔作者简介〕1937年中山大学毕业，先后任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东湖坪政工人员补训班大队指导员，第七战区政治部政治大队大队长。解放后，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科长。现已离休。

抗战时期的何春帆先生

黄振乾

1938年春，何春帆先生受命返连县主持县政。下车伊始，即向邑人宣示他这次返连主政的宗旨是：为救国救民服务，为桑梓服务。当时正值淞沪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在上海抗战的英勇行动，激发了全国人民敌忾同仇的决心。尤其是上海撤退时，谢晋元将军率领八百壮士英勇奋斗的事迹，在广东人民心目中更是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何春帆先生返连初期，多次在公开演讲的场合中，以八百壮士的事迹激励邑人，说：“广东人在抗日救国战争中，唔会做衰仔，一定不会做衰仔！”下面将我所知抗日战争时期何春帆先生的一些言行略述如下。

主县政 做了五件好事

何先生主持县政后，一共办了五件好事：

第一，他一到任，就提出：“化除私见，团结御侮，抗日保乡，建设桑梓”。为此，他首先谒晤星子区的成小田、东陂区的唐焕卿、关以忠、三江区的莫辉勋等连县仕绅，争取他们支持和协助，并着手组训连阳三县的抗日自卫队，由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何春帆为三县抗日自卫队编练主任。到职两个月后，何即将三县的自卫队编制完毕。连县共有10个大队，阳山有6个大队，连山有2个大队，各县均派遣军事教官对自卫队员进行一个月的短期训练。由于连阳

三县有了这些地方武装力量，到了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东省属机关学校撤退到连县时，连阳三县的地方治安秩序无出现混乱现象。

第二，清乡剿匪，安定大后方的治安。何春帆到任后，即陆续起用连县各区国民党军队的退伍军官及一些地方豪绅加入抗日自卫队。如连县的李铁樵、黄坤、骆立意、骆标、黄昆山，阳山的李锦泉、黄公汉，连山的罗达天等人均先后在抗日自卫队挂衔或供职。对于当时尚在连阳属内山区流窜的土匪，何采用剿抚兼施的方法，先后歼灭阳山黄岔钱新喜股匪及击溃大龙山杜日照股匪（杜日照后来在何任二区专员任内接受招安下山投诚）。这里要略述在良江岸全歼钱新喜股匪的经过：1938年5月下旬，阳山黄岔钱新喜股匪共十人准备于晚上潜入连县城盐铺街（即现在的建国路）抢劫九如堂盐店（店主名邝济仁），由于连县自卫队已先期派出“卧底”打入钱新喜股匪内，钱匪这一抢劫计划被及时侦悉。何立即派出黄坤、骆标等人率县政警队及自卫队80余人于钱匪到达良江岸入宿伙铺后，将伙铺包围，政警队班长班海率便衣队员6人持驳壳冲入伙铺内，惊动了钱匪，他即开枪顽抗，当即把班海的跛腿打伤，班海等6人立即隐伏还击，激战十余分钟，当场击毙匪徒2人。钱匪为了突围，即向后门甩出手榴弹，夺门而逃。在逃离伙铺向北逃窜时，被骆标击中倒地，钱匪立即还掷手榴弹，但因负伤乏力，手榴弹掷出不远，钱匪当即被手榴弹炸死，尾随钱匪的一名匪徒，亦同时毙命，其余6名均被当场生擒。经此次全歼钱新喜股匪后，连阳属内逐渐趋安定。受到广东省政府通令表扬。

第三，筹备增设连州中学高中部，并招收女生入学。抗日战争初期，连阳三县均只有县立初级中学。1933年初，何

主持县政后，认为发展教育培育人材是连县当时刻不容缓的急务。当年3月，他就着手筹办连州中学高中部及扩大初中部。招生名额几经周折，于1938年9月完成。同时还招收女生入学。

第四，延揽人才，举办全县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1938年7月上旬，何春帆在连州中学及燕喜小学举办全县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全县小学教师集中到县受训，人数达四百多人。通过这次为期一个月训练，使全县小学教师提高了对抗战的认识，学习了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工作的方法，为发展连县的教育事业和提高群众对抗战的认识做出成绩。

第五，在“团结御侮、抗日保乡”的思想指导下，经过8个月时间认真工作，连阳三县地方秩序得到好转，群众的抗战救亡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为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东省属机关、学校及人民群众疏散撤退到连县大后方做好全面准备。当时，撤到连县安顿下来的人员达12万。他们来连县不到一个星期，敌机常对连县进行空袭，但由于何事前已做好各项安排，社会秩序较为稳定。

任专员 宣传抗日救国

1939年1月，李汉魂接替吴铁城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并来连莅任。李汉魂与何春帆本有同学旧谊，且何主持连县县政一年，政绩显著，因此，李即委何为广东省第五区（潮汕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何春帆到任后，见潮汕地区兵力空虚，不足以言抗日，遂亲自奔走巡视潮汕各县，大力宣传团结抗日，号召民众组织武装，督练自卫队。是年端阳节，日军进犯潮汕地区，何在战事危难之际，转进至丰顺县布心乡，坚持岗位，继续号召群众奋起抗战。

1940年1月，何又调回连县任广东第二区（北江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到任后，仍到行政区辖各县宣传团结抗日。时值1939年冬粤北抗战第一次大捷之后，广东各地机关团体均派出代表到粤北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何春帆接获省府通知后，即派出专署科长梁××带领慰劳小组前往参加慰劳。不料梁某畏惧危险，向何表示不愿前往。何春帆鄙视梁某贪生怕死的行为，当即下令撤掉梁某职务，另行派员开赴前线慰劳。

1940年2月，何遭受国民党中央非议，认为他守土无方，以致潮汕失守，因而调往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归来后，随即受到免职处分。

在中大 致力教育工作

何春帆被免职后，随被委为广东省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至1940年秋，受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之聘，受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总务长。以后又转任广东省救济会曲江救济站主任。

1942年夏，何春帆再受中大新任校长金曾澄之聘，重任中大教授兼总务长。到任之后，正值太平洋战事转折开始，日军计划在中国大陆打通由南向北的交通线。当时我的父亲（黄渊）曾以此事相劝，认为中大地处粤汉线重镇坪石，如果日军一旦动手打通南北交通线，坪石将承受极大危险，因此曾劝他暂不返中大就任，即使推却金曾澄不过，也不要兼任总务长，以免临到撤退时拖泥带水。何一向以兄事我父亲，对我父亲平日的规劝也很尊重，但是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他说：“做官我实在做怕了，现在专心教育工作，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乐也融融。既有此乐，何来艰苦！况且我是

连县人，连县是广东的大后方，一旦坪石有事，我带领员生往连县撤退也方便些。”我父亲听他这样一解释，也不便多说了。

何春帆重任中大教授兼总务长后，对于连阳高中毕业生投考大学亦备尽爱护与指导。当时社会上盛行人情请托，即使教育单位，亦不可避免。因此，连州中学第一、二届毕业生投考中大时，即使成绩入线，也有部分被走后门之辈排挤落选。他重返中大后，对于招生录取工作很关注，使一些成绩入线的学生，都能顺利入学。

1944年冬，日军已闯入京广线南段，未几，又沿连坪公路进窥坪石。由广州北进的日军，亦已窜至广从公路以北。这时的坪石腹背受敌，中大员生均遭到夹击之危险。由于时间仓卒，何春帆即率部分员生由校警队护送，沿连坪公路返连。所幸校警队多为连阳子弟，对连坪公路地形熟悉，在行进中避开与日军遭遇；途中还把有家属的员工暂时安顿在湖南临武县城，其余员生继续向连县进发，终于使员生三百余人安抵连县。中山大学原于连县东陂设立了分教处，何先生带队返连后，以三江为基地，把大部分员生集中在三江继续上课，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为止。

争议员 意欲为民请命

何春帆于1944年秋曾竞选国民党的参政会参政员，因为他与广东军政当局的余汉谋、李汉魂等曾有同学同事的旧谊，得到他们的支持，遂以入选。他原以为参政会为民意机构，当了参政员可以为民请命，使民情得以上达。因此，他当选以后，相当高兴。回忆他于1944年秋当选参政员时，由曲江返回坪石。我当时在中大读三年级，听说他当选归来，

即以子侄辈身份前往坪石火车站接车。他一下火车看见竟有二十多人迎接他，十分高兴地说：“呢次碰出双番北！”原来竞选参议员入选的还有始兴人官祚。始兴也属北江区，所以先生把他和官祚入选比喻为“碰出双番北！”（打麻将的术语：意即出了两个粤“北”人）然而他高兴得太早太天真了。国民党设立国民参政会不过为了装饰门面，以“民主”欺骗全国民众而已。他当时信以为真，可谓“当局者迷”也。

抗战胜利后，何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专心致志于争取民主，为民请命的工作。结果，一样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与愚弄，不能实现初衷。

我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回忆

陈维廉

革命的洗礼

1930年，国家处于萧条困苦之中，列强环伺，国势日蹙。当年我正当年青并怀医术以求济世的年代，也为国家和个人前途所苦恼。幸而家近苏区，能接受一些共产党人的教育，了解一些形势。这一年，我参加东江苏维埃政府，在红军十一军任医生，进一步受到启迪，懂得中国的贫穷落后，根子在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相勾结，不打倒代表这些势力的反动政府，个人和社会都没有前途。所以，我衷心拥护“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

跟共产党人共事合作

抗战初期，广州沦陷，广东省会迁往韶关，国民党政府机构和各行各业人士都纷纷迁来韶关。我也来到韶关开设诊所，悬壶济世。我对进步人士，是衷心敬佩、乐于交往的。1941年，韶关国民党当局党、政、军三方勾结，在孝悌路励群中学（现韶关一中处）四楼设立一个代号叫“基庐”的特务机关，逮捕监禁了不少革命同志、进步青年。当时，我曾在第七战区政治部一位较开明的李佑寰科长的协助下，营救出被监禁的张海鳌、黄仪嘉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张解放初期任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黄任惠州地区文化局局长，现年八十多岁，住惠阳）。1943年，我到翁源任卫生院长，当时，我

将友人曾凌（共产党人，解放后任汕头地区卫生局局长）延揽来卫生院工作。那时，因翁源县接近前线，难民的伤病号很多。曾凌帮助我团结全院的医生、护士，动员全院上下发扬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加班加点不领报酬，尽自己力量，解除难民的痛苦。我和曾凌的共事中，使我对一心一意为抗战胜利而忘我工作的共产党人，更加敬佩。

1942年，自中共广东党组织在“粤北事件”中遭受到严重破坏后，不少党员都分散隐蔽下来。1943年，中共揭西县灰寨乡党支部书记李祥芬和党员李子明来到翁源。经过曾凌的介绍，我和他们互相认识，并介绍李祥芬到翁城一间小学当教师；李子明则留在卫生院帮助搞油印工作，食宿由我负责，掩护他们工作。1944年春，我介绍李子明到仁化县卫生院做事务工作，有个正式的表面职业。这期间，我们仍保持联系。1946年春，他到了韶关《建国日报》当编辑。这时，我也从翁源调来曲江卫生院任院长，彼此相见分外兴奋。不久，中共地下党员李钦明从揭西也来韶关。我掩护安排他在卫生院做办事员。曾凌这时也仍在曲江卫生院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秘密议论国事，他们不断地向我介绍国内外斗争的动向，分析革命发展的形势和前途，这大大提高了我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为我以后和共产党人长期共事合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46年，韶关充满了白色恐怖。曲江第一中学的教师崔承宪，因为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在一个夏夜被特务暗杀在东河铁路旁边，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此事震动了整个韶关。为了镇压进步力量，在西河芙蓉山上，国民党反动派又设了一个政治犯监狱，虚张声势。韶关是广东省南来北往的门户，又曾是战时

省会，国民党的党、政、军系统，力量比较集中，中统和军统特务触觉深入各个阶层。在这地方从事革命活动，稍有疏忽，往往就出问题。我按旧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把曲江卫生院的人员进行调整。将我在翁源工作时期那些有思想觉悟的部属调来曲江卫生院。院址原来在九成路（现西堤路）一间三百平方尺的平房里，一眼看清，不利于工作。我用募捐办医院的钱，在东堤路购置了三千多平方尺的楼房两栋，把卫生院搬到那里（现市人民医院地址）。这样一来，扩大了门诊业务，也多加了住院床位，更重要的是可以掩护更多的革命同志。解放战争期间，李子明（解放后任连南县委书记）先后介绍过袁鉴文、赵学光夫妇，以及李凌冰、莫德焄、沈秋声等人给我安排他们工作，以便掩护他们从事地下斗争活动。我进一步把潮州同乡会的会务也包揽起来，使来往于卫生院的革命同志，能以乡亲聚会，或投靠谋职为掩护。那时候，韶关许多人把“曲江卫生院”称为“潮州同乡会”，却不知道它是革命同志活动的营地。

团结各阶层人士，为解放战争壮大力量

我在曲江卫生院工作，有利于和韶关各阶层人士接触。1947年春季，广东流行脑膜炎、夏季霍乱，我和全院人员一起，在群众中开展防病、治病工作，使这些流行病，在韶关得到遏制，逐步树立起曲江卫生院的声誉。许多韶关的知名人士、富商、绅士与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找上门来看病，我都一一接待，乐于助人，很快交上很多朋友。这对我掩护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工作，带来很多便利。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都将我所了解搜集到的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活动的情报，随时提供给中共地下党同志参考；地下党交给我的任

务，我同样认真负责，尽力完成。

在崔承宪被暗杀后，《建国日报》发表严惩歹徒，以息民愤的报导。其中有义愤填膺，驳斥反动文人，谴责扼杀民主的篇章。一天，曲江县长给我打来电话气势汹汹地说：

“写文章的人是在卫生院的，你们怕不怕杀头！”我知道文章是曾凌以笔名凌沙写的。为避免跟查迫害，我便叫他辞职离开韶关，安全撤退到潮汕家乡继续革命工作。在1947年冬的一天夜里，曲江县长殷卓伦叫卫兵来找我给他妻子看病，我见来人军服佩枪，心里忐忑，担心地下党同志安全，便暗中嘱咐妻子，一小时后不见我回，立即通知某某等转移。回忆以往，我和地下党同志共事合作，彼此关心，可经历了艰苦困难的考验。真是“生死与共，风雨同舟”。

完成任务，迎接解放

解放大军渡江南下，湖南军队起义，韶关解放在即。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游击队的行动也在升级，每次都要卫生院调派医生和护士前往。这期间，我曾把国民党军队每一次“围剿”的日期和路线，告知地下党同志，紧急通知游击队。如1949年国民党曲江国民兵团的头子李汉初要到罗坑乡包围范家祥部，他向我要人员药品时，讲了一些他掌握的“匪情”，我如实转告了地下党。另一次自卫大队要到马坝乡去围捕地下党同志，我也立即告知转移。此外，在曲江卫生院全体工作人员提高觉悟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勇敢地支援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收治秘密送来（韶关）的伤员、重病号；还筹集资金购置毡毯、药品和游击区需要用的物品，交由地下党的交通人员运往。

这时候，中共地下党需要我调查的事情也多起来，如：

调查专员公署、曲江县政府股级以上官员的政历和思想情况，我都通过一系列关系把情况一一收集。又如地下党通知我搜集从韶关到广州的公路桥梁情况，我通过一个国民党公路局的官员，很快就把每座桥的位置、通过车辆吨位、有无岗哨等材料搞清楚。在大军到达南雄后，我又按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将粤北保安司令部、专员公署、曲江县政府的人员的撤退路线、武装力量等情况汇报了。又将乳源瑶山建立反攻阵地的计划，探听清楚，详细汇报，使我人民解放军及时截击，粉碎了他们逃窜瑶山的企图。

1949年7月，国民党当局准备炸毁火车站到韶关市区的曲江大桥，妄图阻挡从始兴南下大军入城，以及造成大军在运输上的困难，中共地下党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尽力以统战力量确保曲江大桥。我即刻和国民党第二军部队工兵营的郑营长密谈，晓以大义，指明出路。我和他是同乡，平日常相坐谈，知道他的工兵营奉命要炸毁大桥。在此兵临城下的时刻，将来何去何从的问题也困扰着他，我说，你既认为国民党的天下已完，为什么还要炸桥呢？在我反复动员劝说下，他终于决定佯作破坏，在大军攻打韶关的炮声雷鸣中，向曲江龙归逃走。

国民党专员龚楚撤往乳源大瑶山时，乘机派车到曲江卫生院搬运医疗器械和药品。我把好的器械和药品藏起来，把报废的药品和器械让其搬走。韶关解放之夜，我们把藏起来的设备、药品又重新摆出来，为解放军和群众开诊治病。

大军进城以后，支前工作很重。那时铁路未修复通车，南下大军每人在韶关要配备5~7斤粮，几万大军过境所需甚多。由于临解放的那几个月，我们对进步的韶关工商界人士做了思想工作，使他们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此时，

我即邀请他们在曲江县商会（现工商联地址）开会，由北二支政委、五岭地委书记张华（现广西政协副主席）向大家讲话，各界人士对党的政策更为清楚。我又带头认购粮食三万斤借与解放军，他们跟着承担了所需粮数，保障了大军过境的粮食供应，加速了广州解放。

韶光奔流，解放又卅八周年了。回忆当年我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迎了解放，心情真是无限激动。往事历历如在目前。那时刻，我欢送掩护在曲江卫生院的革命同志一一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如袁鉴文到韶关军分区任副政委，赵学光当区委，李凌冰担任党报的总编辑，莫德焯负责工会工作……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出各自的才能，我感到莫大欣慰！卅八年来，不觉从中年到了老年，每想到长期阔别离开乡土的韶关朋友，想到祖国仍未统一，我的心潮又起伏不能稍息，我还要为祖国统一的到来，继续努力！

（作者系民革韶关市主委、韶关市政协副主席）

热心艺术教育的赵如琳

曾 炜

话剧表演艺术家、艺术教育家赵如琳，于1983年11月23日在法国巴黎病逝，终年74岁。

赵如琳先生在抗战时期为艺术事业贡献了全部气力，在广东话剧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页。我，作为他的学生，较为接近他、理解他，对这逝去的老师，有责任尽我所知真实地写出来，让熟悉他的朋友、校友补充、修正，使他的史实，载入广东话剧史册。

赵先生成长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话剧艺术落籍中国，正在中国发展的时代。话剧这一艺术形式，被认为最能表现现实生活，最富于战斗性，从“五四”到“九一八”，一直被认为是进步文艺，是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武器。这样，到了三十年代，中国话剧运动，便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参加话剧运动者，都被认为倾向进步的。那时，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全国革命志士都涌来广东，震撼世界的省港大罢工，也通过当时叫做“白话剧”进行宣传鼓动。到1929年至1930年初，欧阳予倩应李济深、陈铭枢的邀请到广州开办“广东戏剧研究所”。这研究所并非象大学的研究所那样正规的艺术研究机构，而是田汉和一批热心于文艺运动的进步人士支撑起来，作为创造适合时代，以发展民众新戏剧为宗旨，培训骨干的阵地。那时候，赵先生在中山大学教育系念书，英文特好。他被话剧迷住了，常为戏

剧研究所的杂志周刊撰文和翻译。直到解放后我才了解，当时他和两人最好，其一是现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广东文联主席、著名作家欧阳山；其二是著名新闻界人士，香港沦陷后，到韶关任《建国日报》总编辑的赵慕鸿（抗日胜利后在广州逝世）。当时，欧阳山是左翼作家，搞革命文艺运动，发表了大量作品，有东方高尔基之称。他和赵先生是好朋友，对赵影响最大，是他引渡赵走进话剧迷宫的。当赵在中大毕业时，碰到个人出路问题，便面临严峻的抉择了。若搞话剧，象“戏剧研究所”这样不正规机构，收入是极其微薄的，生活亦无保障，别说一些老眼光把戏剧看作“下九流”那样低下了。选择一条平坦的道路：当中学教师、校长、教育家；当助教、讲师、教授；翻译、著作、学者，未始不可能，但为实现自己的爱好、理想，一心为话剧奋斗终生，又有矛盾。最后，赵浑身的艺术细胞、进步思想影响起了决定作用，他宁愿当个穷艺术家，不愿碌碌无为地渡过一生。古今中外多少艺术家，正因为独具艺术家气质，走上了一条坎坷、甚至是悲剧戏道路。这样，赵在中大毕业后，便正式参加研究所的编辑工作。后来还参加了剧组，和卢敦、黄宗保、李晨风一起演戏，饰演了他一生最成功的历演十余年的角色——《油漆未干》的哈医生。以后，还和卢敦等组织了“广州剧联”，又和他夫人杨瑞初以及黄宗保等另在远东中学成立剧社，继而组成“前锋”剧社，从此，赵先生在话剧艺术的道路上，长久地走了下去。

广州沦陷前夕，他夫人杨瑞初由于两个孩子生病，带着孩子离开了广州，去新加坡投靠她姐姐，这又给赵先生以难题，和妻儿一起去新加坡过和平生活，还是在战火中实现自己理想？最后，他和许许多多艺术家一样，撤离广州，于

1939年到了广东临时省会韶关。

韶关这个广东战时省会，比起沦陷前广州冷清多了，天地窄了，且战争气氛甚浓，大量救亡青年和艺术工作者都奔赴前线，动员民众，宣传抗日。赵和许多艺术界朋友一样，带领一个宣传队，在粤北前线演出。一个有理想的人，总是永远不满足现实的。他碰上一个机会，和当时的教育厅长黄麟书陈述他的理想——考虑到广东战时艺术骨干少，建议创办“广东省战时艺术馆”，培养艺术骨干。黄麟书接受了他的建议，自任馆长，委任赵为副馆长，抗战前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长胡根天为教务主任。艺术馆分戏剧、音乐、美术三部，赵兼任戏剧部主任。全都招收训练班，半年一期。现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也主办了戏剧舞蹈班，三个月一期。这个战时艺术馆通过各样活动，取得优异成绩，获得社会支持。第三年（1941年）春天，赵为了进一步扩大培养艺术骨干基地，建议并取得教育厅批准，由战时艺术馆改为“广东省立艺术院”，除保持各科短期训练班外，还招收高中毕业的二年制戏剧、美术、音乐本科生，赵被任为院长。1942年，教育部以为“艺术院”与当时的学制不符，又鉴于艺术院办得有成绩，拥有的教授也相当多，便改为正式的专科学校——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仍设戏剧、美术、音乐三科，聘赵为校长。

那时的广东是前线，一些有威望的艺术家不在重庆就在桂林，赵一心扑在艺术教育事业上，不遗余力，一往无前。他费尽心机，网罗了一批有名气的教授，象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的张趺峰、舞台美术家赵越、著名导演陈卓猷、舞蹈家吴晓邦、原广州市美校校长胡根天、教授吴琬、音乐家黄友棣、梅耐寒等等；有些不愿久居的，也经常请来讲

学，象当时名气最大的提琴家马思聪、著名哲学家石兆棠、心理学家阮镜清、剧作家洪深、戏剧家向培良、熊佛西、胡春冰等等。在战时省会拥有这样阵容，实不简单，因此“艺专”之声望，与日俱增，被认为是华南的艺术最高学府。

赵是一个出色的演员，是个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务实者。他从开办战时艺术馆到艺专成立，思想是明确的：艺术不能停留于理论，应与实践相结合。于是，一开始便办了个实验剧团，经常上演话剧，他主演的《油漆未干》，从抗战前在广州直至在韶关、桂林，均有广大的观众。他所扮演的哈医生，更为观众赞叹不已。之外，音乐科的教授、学生也经常举办个人独奏（唱）会，舞蹈科也上演了舞剧《宝塔与牌坊》，吴晓邦、盛婕也进行了舞蹈演出。美术科则经常举办画展。这样与实践相结合，既教育了学生，也满足了人民的艺术欣赏需要。艺专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便越来越高。但赵不满足于此，他还翻译、著书立说。战时的韶关，物质条件甚差，他住在竹棚里，没有电灯，后来在艺专，也不过住竹织批荡的小房子，一盏油灯，一字一句把英文译成中文，或是创作剧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了《卢老虎》（独幕剧）、《冲出重围》（三幕剧）等5个剧本，并译出了汉米尔顿的《戏剧原理》、《苏俄的新剧场》等7本译著。

1942年，广东成立剧协，赵被推为广东戏剧协会常务理事。当时的教育厅长黄麟书，很是赏识他所取得的成就，把艺专校长委任于他。那时的他正处在黄金时代。他在学校还提出建立“民族现实的新艺术”的口号，只是没有进一步提出纲领性的理论，未成为理论体系，因此，未引起全国艺术界的注意。但从这口号的提出，也反映了他意欲建立自己的艺术流派。

1944年春，西南剧展在桂林举行。当时三个多月，集中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演剧队伍观摩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最大的一次活动。那时，中国半壁江山沦陷，重庆已成为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南的桂林，也成为抗战前沿的中心。在重庆的文化领域方面，国民党一直与左翼抗衡，而桂林却得天独厚，因广西桂系的李济深比较开明，为进步文化人拥戴，因此，桂林便成为战时进步文化中心，许多进步报纸、杂志、书店、学校、艺术团体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那时田汉、夏衍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都在桂林活动，盛极一时，西南剧展是左翼文化战线发起的，以此来显示进步戏剧力量。

赵非常重视这次活动，一早便决定参加，并作充分准备。西南剧协欧阳予倩也出面主催，对老朋友大力支持。当时，广东在前线，偏于一隅，广东艺专办得怎样，赵如琳演技如何，也不为后方人所知。赵选择了苏联名剧《苏瓦洛夫元帅》（百胜将军）、老舍的讽刺国民党官僚的《面子问题》以及《油漆未干》参加剧展。三个剧都是赵亲任主角。《苏瓦洛夫元帅》是歌颂俄国一将军，已在苏联拍成电影；《面子问题》被认为是进步的，早已在政治上有了定论；《油漆未干》虽不接触政治，是暴露人类贪婪的弱点，也无可厚非。之外，还准备了许多资料、舞台模型等参加展览。

可是，实践的结果恰恰与赵的美好愿望相反。演出的《苏瓦洛夫元帅》却受到了批评，因突出事物为主要特征的“样式化”装置，被说成“不伦不类”；还抓了语言不纯，说是“俚俗”……

事实上，经过数十年的观察，我还认为那时艺专上演的戏，在政治上是站得住的，艺术上是上乘的，那怕在在个别

语言运用上有些不妥，但总体上说是好的。展出结束后，大会发觉这样批评不妥，田汉还请了赵先生吃饭，酒后致以歉意，并在《力报》发表了文章，说了赞扬话：《百胜将军》在所有此次上演的外国剧本中应居首位。它的演出，都是比较自觉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艺术理论的实践，至少他对建立体系理论有强烈的要求，而这种强烈要求是应加爱护和扩大的，不能稍一不慎损坏这种艺术幼芽的滋长。同时又指出：“初期性，那是大胆的勇敢的，但总免不了瑕瑜互见，缺乏完整，丝毫不能低估这种试验的重要性和成功的前途。”（1986年在桂林召开西南剧展纪念会上，广东戏剧家协会主席李门作了发言，公开指出当时的批评不对，历史最终是会得到公平的估价的）

桂林是说普通话的，粤语行不通，我们演不了几场，上座率低，把队伍拉到讲粤语的柳州上演。但柳州是个小地方，也演不了几场，演不下去。这样一来，经济大受损失，连回韶关的旅费也无着。最后得到沙街（最大的商业街）东帮的支持，由广东旅桂同乡会包了几场，旅费才有着落。这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

西南剧展结束不久，日军大举侵占西南，跟着，韶关沦陷，艺专被迫迁到西江罗定县。这比韶关的条件更差。一些教师不愿去偏僻的小县城，招收学生也少了，艺专转入“惨淡经营”阶段。幸而仅仅一年多，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广州光复，人们纷纷返回广州。深居小山城的艺专，上至校长，下至工友，无不喜悦，憧憬着艺专迁回广州后的美好前景。可是，身为艺专校长的赵如琳，却一直没有接到迁校的命令，等得不耐烦，他只身跑回广州去活动。那时，我正从东江回到广州，碰上了他，他拉

我一起跑艺专回迁之事。

省教育厅设在净慧公园，机构庞大，人头拥挤，我们天天跑去反映艺专情况和提出一些要求。但又不能坐着等，每天都忙着去找回迁校址。那时候，只有我和他，住在小旅馆里，什么助手也没有。

对艺专的迁校问题，由于省教育厅厅长换了姚宝猷等种种原因，经过成个月的奔跑，终于无可奈何地找到宝华路内街宝华中中约一间小学。这是一间平房，破破烂烂，教育厅也乐得照准拨给。赵为了先把艺专迁回广州，不管怎样委屈，也当机立断决定下来。

几经周折，艺专总算草草地在几个破烂的课室开课了。赵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30平方米的民房，带着两个幼孩，过着清淡的生活。到1946年初，全国民主运动兴起，广州大专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高潮。艺专以戏剧科学生为首，与广州中共地下学联取得联系，冲出校门，参加广州学生民主运动，学校的民主墙报也办了起来。这样一闹，冲破了艺专长期不问政治的平静生活。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大举镇压，砸兄弟图书公司、逮捕进步学生、扫荡民主墙，艺专的三青团学生便公开集会亮相。不到半年，一左、一右，两股政治浪潮冲击艺专。赵作为一校之长，面对这复杂的政治环境是难于应付的。幸而，在民主运动高潮时，他没有执行镇压学生；也没有支持三青团学生在校的活动。他既不左，也不右，象个学者，不偏不倚。但在国民党官方看来，赵是个不中用的书生、校长，不久就被免职，委任丁鏞接任。赵苦心经营的艺专，从此易手。

以后，赵去香港，转居新加坡。这数十年，远隔重洋，不知音讯。后从他在广州的亲戚处知道一鳞半爪。从新加坡

出版的《油漆未干》一书的文章看，知道他去新加坡后，还搞了学校戏剧，还亲自上演哈医生。后到了法国，据说在经营餐馆之余，还翻译一些作品，近几年还在香港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戏剧艺术之发展及原理》，可见他晚年还醉心于艺术。可惜在资本主义世界，无法舒展其才能。

1962年春，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全国剧作家云集广州。我有幸参加会议。和赵在三十年代一起在戏剧研究所共事的钟启南、陈西名，有时也来听报告。偶然间，钟启南谈起赵如琳，希望我能向当时主持会议的中国戏协主席田汉建议，请赵回国。我和田汉说了，他立刻表示赞同。我给赵去了信，却没有回信。前五年，当我知道省文联主席欧阳山是赵的挚友，又向他建议请赵回来。他一口应承，促我写信，我写了信，很快得到回复，表示选择适当时候回来走走，见见故人，并表示对过去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的依恋，对同学们寄予期望。可惜，他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便客死巴黎，不能亲睹新中国朝着“四化”的发展！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秘书长）

爱国民主人士张光第

卢小周（整理）

张光第，字贵宽，号伟生。生于1893年11月27日，始兴县城水云楼人。义父张丽山，为清末县衙门东房先生；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光第小时就读于私立崇阳学堂，刻苦认真，爱好文学，能作一手好诗，曾受到当时国文老师陈及时的称赞。

光第是广东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抗日战争期间，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利用所担任的国民党始兴县党部筹委会宣传部长、国民党第二路总部秘书处中校秘书、始兴中学教导主任、始兴临时参议会议长和省议会驻会委员等职，积极支持、掩护和参与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从事大量的有益于人民和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此外，张光第还为始兴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不服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于1945年10月14日被国民党县当局杀害于始兴县城西郊，时年52岁。

早期革命活动

1921年，张光第参加了由早期共产党员谭平山、谭植棠在广州举办的“宣讲员养成所学习班”学习，学习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等革命理论。次年3月14日，张光第又参加了在广州东园召开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会议，成为广东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从而进一步

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实为打破资本主义的武器，且含世界性之真革命……”（摘自《广东青运史资料与研究》1983年第4期《一份珍贵的早期S·Y团员张光第日记》一文）。3月26日，谭植棠主持召开了宣讲员养成所所务会议，讨论该所事务和确定各股办事人员，共分四股：编辑股、演讲股、文书股和庶务股。张贵宽（即张光第）为编辑股的负责人，分管有关编辑事宜。

1924年前后，张光第先后在始兴修仁小学、德华小学等校任教。当时由于军阀混战，战争不断，张光第所在的德华小学如同大多数学校一样被迫停课一个时期，张光第便在家开办私塾；借此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讲授文化科学知识。在他的精心教育和引导下，曾谊勋、陈亿勋、陈培兴、陈晓春、凌约翰等一批进步青年很快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8月，张光第、钟远徽、黄云非、李大光、陈竹君等创建了进步青年组织“新兴社”，出版《始兴青年》杂志，宣传民主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1926年春，张光第参加了国民党始兴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并任宣传部长。在钟远徽、陈竹君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顿岗等地的农民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大批农民纷纷起来要求减租减息，反对包庇烟赌，并聚集到县城示威游行，赶跑了当时的县长陈成威，给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始兴反动势力向革命阵线发起猖狂进攻，陈竹君惨遭杀害。张光第、李大光、何贞忠等进步人士遭到通缉，被迫暂时隐匿他乡，始兴农民运动一时陷入低潮。

张光第离开始兴后，正准备南下广州，不料在途中遇上
一位中学时的同乡同学，得知广州情况更为危急，后改道投
奔到张发奎属部。起初担任录事、文书之职，不久升任少校
秘书，负责文牒工作，如代复一般信件、起草一般的讲话文
稿等等。1931年，张光第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秘密聚集曾
谊勋、陈培兴、陈亿勋、吴新民、张谔、刘昌生、刘世周等
人，在顿岗、杨公岭等村恢复了“一战”时期被破坏的农
会，成立了“农协”小组。1933年冬，在张光第的指导下，
始兴农协得到进一步扩大，公开的群众性组织有兄弟会、耕
牛会、陂水会、观音会等，通过这些组织动员广大农民为自
己的切身利益展开同地主的斗争。在顿岗、罗坝等地制止了
地主强迫农民承担的一些不合理要求。

1932年，旅穗学生陈培兴、曾谊勋、邓文礼等在广州秘
密组织革命团体“狂流社”，准备出版刊物，揭露军阀和地
方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因被人告密，拟发行的刊物尚未出版
即遭国民党广州当局查禁。张光第得悉此事，极为愤慨，他
在给陈培兴、曾谊勋的复信中写道：“……一个小小的刊物
要二百元保证金并保证了后，还可以随时证而不保的，要它
停止出版，这简直是赢秦再世，路易十四的世界了。哪里是
民族复兴、青天白日、三民主义旗帜之下的自由世界啊”！
他还在信中告戒他们：“……我以十二万分的热忱希望你们有
志气、有思想、有热情的青年们要万分的当心吧！…我愿意
你们散布革命种子，尽心尽力来改造乡邦，犹愿意你们爱惜
你们的头颅，为革命保存元气。我知道革命免不了牺牲的，
但我不愿意无代价的牺牲。所以，在我的愚见，以为多爱惜
一个革命青年，就是多保存一分革命的势力”。并表示：
“我得勒紧马缰，加鞭的飞到革命之路去和你们来共同奋

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黑暗反动势力的无比义愤和痛恨，及对革命青年的极大关怀和期望。

1934年冬，张光第赴河北定县、邹平考察平民教育情况，次年一月中旬返抵始兴。2月9日又离家取道广西，后入贵州，3月7日被调任国民党第二路军总部秘书处任中校秘书。不久，到四川、武汉、上海等地考察，目睹各地惨况，张光第深感痛心，决意南归，年底返回始兴，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当张发奎调任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总指挥时，张光第又前往该部，被委为上尉军需。但不久因得罪了一些上层人物，被调离。

投 身 抗 日 运 动

1935年，张光第受张发奎之遣，带着张发奎所给的十万元存款，回家乡始兴创办学校。张光第热心教育事业，经常到各地了解、考察教育状况，对教育理论也有一定的研究，尤其是对陶行知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论很感兴趣。为了取其精华，张光第便亲自到南京考察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搜集了大量有关教育方面的材料，并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晓庄教育考察记》的文章，介绍晓庄学校的有关情况。同时，他还到上海选购了一批教学用书带回始兴。

1936年春，张光第带领陈亿勋、陈培兴、陈晓春等来到张发奎的家乡——始兴清化彩岭村，开始筹建为纪念张发奎父亲（竹溪）的“竹溪小学”，后根据当地村民的意见，改为“风度小学”，以纪念唐代丞相张九龄。张光第担任校长。学校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思想教育，除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识外，还着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有关游击战术的军事

训练。此外，还在周围村庄开办了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等。张光第除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外，还经常抽出时间对学生进行形势与爱国主义的教育，并深入乡村，处理民事纠纷、禁烟禁赌、破除迷信等等。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1936年春，学校创办了进步刊物——《风度周刊》，张光第为该刊题写了刊头。“周刊”起初只是不定期刊物，油印一些宣传抗日的文章，后改为周刊定期出版，内容大多取材于中共党的内部刊物，文章短小精悍，又不乏战斗力，深受大众的喜爱。发行量不断增加，由几十份发展到几百份。1939年《风度周刊》改为《风度报》，张光第常为刊物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斗争，揭露反动统治。

1936年4月，陈亿勋、陈培兴等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秘密革命武装“始兴青年歃血团”，陈培兴为书记、刘世周为团长，张光第、刘梦兰被推举为顾问，深入开展革命武装活动。同年，张光第、曾谊勋、陈培兴等人又主持创办了“乌鸦文艺社”，出版《乌鸦》杂志，团结抗战人士，介绍进步文学。

1937年初，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百天，张光第专程前往上海购置了一幅刻有鲁迅头像的底版，并以此作封面，编辑出版了纪念鲁迅逝世专刊——《乌鸦第二声》。张光第在该刊发表文章，赞扬鲁迅先生“是大众喉舌，是革命导师，一生奋斗，呐喊彷徨皆淑世；为思想先驱，为文坛宿将，此日同悲，南腔北调尽哀音”。对鲁迅先生的逝世致以深切的哀悼。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爱国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曾谊勋、吴新民、陈培兴等在张光第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成立了以青年为骨干的“始兴

青年抗日同志会”，通过演讲、话剧、墙报等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日寇的侵华本质和汉奸卖国贼的卑鄙行径，动员广大青年奋起抗战，从而大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1938年春，张光第先后鼓励和支持陈培兴、邓文礼、邓文畴、曾海容和儿子张柏坚奔赴延安“抗大”学习，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当时，由于延安经济十分困难，“抗大”建校时学校发动大家捐资，张光第得悉后，立即从始兴汇款到延安，支援“抗大”建校；同时，他还寄去一批书籍支援“鲁艺”建校。

1938年夏，在张光第的倡导和组织下，曾道勋、赖廷枢等人主持动员，广集私人藏书，在始兴粘米行福寿堂开办了大众图书社，宣传抗战形势，传播新文化。

1939年冬，陈培兴、梁炎木、邓文畴、邓文礼等先后从延安返回始兴，在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的同时，加速了武装抗日斗争的组织准备工作。其时，正好张发奎任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部驻扎韶关。张光第便亲自出面，利用他与张发奎的特殊关系，以卫校保乡为由，多次面呈张发奎，向张发奎索取武器装备。张发奎有感于当时抗日保乡的需要，应允了张光第之请求，拨给风度学校步枪三百多支，冲锋枪八支，重机枪两挺，手枪十多支，多种弹药和军衣等军用物资一批。这为后来创建风度大队作了物资准备。

1939年冬，张光第任始兴中学教导主任，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1940年春，中共省委先后派温盛湘、廖琼、容民经、刘彦邦等人到始兴开展建党工作。为了掩护他们开展工作，张光第便以合法名义，聘请他们到始兴中学任教，使这一工作很快开展起来，不久便成立了中共始兴县委。是年夏，张

光第得知有了党组织后即向县委书记张华申请入党，张华就此请示省委书记张文彬。张文彬指示说：“光第同志已够入党条件，但考虑到他的地位和作用，暂不吸收他入党为好，作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作用更大些，工作更方便些，等到需要吸收他入党时再考虑。请将这个意见向光第同志讲清楚，希望他继续为党工作。”事后把这个意见转告了张光第，他十分赞同，并表示日后要更努力工作。

1941年初，国民党在各地的反共活动猖獗一时，就连一个小小的始兴中学也卷入了这个漩涡。当时，张光第仍在始兴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国民党始兴县党部书记长吴英禄等人对张光第疾之如仇，暗中指使始兴中学一些人，以张光第小学都没毕业，没有资格当教导主任为借口，要他马上撤职，张光第考虑到当时斗争的形势和需要，决定先辞职离任。一天中午，留在始兴中学的中共地党人员容民铎吃完午饭后正准备回宿舍，突然遭到莫飏等人的围攻殴打。进步学生立即向张光第作了报告，张获悉后，随即通知警察局，并随同几个武装警察赶到始兴中学，对正在围攻容民铎的莫飏等人厉声斥道：“打人犯法……。”嚣张一时的暴徒们一下子慌了手脚，灰溜溜地跑去了。当天，中共地下党继续组织和发动学生揭露事件的真相，要求惩办凶手，张光第挺身而出，直言向国民党县党部提出，迫使他们执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最后，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下令撤换始兴中学校长并勒令莫飏等人限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始兴。

1942年，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张光第出面向国民党县政府推荐地下党员郑屏担任县政府自卫中队队长，被获准。此后，张光第便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到自卫中队，给士兵们分析抗战形势，宣传抗日主张，受到大家的拥护和欢迎。

1943年，张光第出任省参议会驻会委员，1944年，又出任始兴临时参议会议长，是年下半年返抵始兴。11月，日寇进军粤北，国民党驻军160师节节败退，始兴国民党当局竟不顾人民死活，在日寇尚未入境之前便逃往离县城一百多里的清化桃坝村躲藏起来。始兴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之下，遭受空前的浩劫。张光第对国民党当局这种贪生怕死的行为极为愤慨，坚决拒绝与当局同行，而坚持住在偏曲村，与中共地党同志一道奔赴各个乡村，宣传抗战形势，壮大抗日武装。

1944年冬，为联合抗日，中共始兴县委和国民党始兴当局协商同意，组建了“始兴县政府抗日自卫队风度学校卫校独立分队”，然而，自卫队刚成立不久，县长江锦兴、县国民党部书记长吴英禄假借抗日之名，向风度独立分队索要枪支，企图削弱风度自卫队的武装力量。在这关键时刻，张光第与地下党同志一起商量应付办法，说要请示张长官，使江、吴索枪一事未成。

1945年4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王致远在清化召集翁源、始兴、南雄、曲江、仁化等县头目开会，密谋反共计划，企图以调任为名，夺取郑屏的兵权。中共始兴县委得悉后，急告郑屏率队起义，并嘱托张光第与队同行。但张光第却谢绝这一安排，要求继续留在偏曲做统战工作。他说：“我是抗日民主人士，又是参议长，留下来还可以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更好地开展抗日。”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以张光第鼓动郑队“叛变”为名，于郑屏起义的第二天拘留了张光第等进步人士。

1945年5月13日，始兴人民风度抗日自卫大队宣布成立，并发表了成立宣言，谴责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号召人民坚持抗日。1945年6月29日，吴新民、周耿

光、陈培兴、邓文礼等指挥风度、外营等地的抗日队伍共六百余人进军桃村坝，摧毁了国民党反动县政府和县党部，活捉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吴英禄、特务头子杨瑜，救出了张光第等一批被捕的同志。

牺 牲 前 后

张光第出狱后，仍继续参与风度自卫队的领导工作，战斗在第一线。不久，因病返回偏曲疗养。此时，他虽然重病缠身，但仍时时刻刻关心着党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挂念着与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一次，他在禾花塘治病，得知东纵北上的消息，便立即派身边的警卫员到司前等处与东纵联系，了解有关情况。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却想尽千方百计来诱惑张光第，给他的信中写道：“你只是抗日，无罪，风度队的事是共产党干的，与你无关，保证你生命安全”等等。为了治病，张光第决定迁离偏曲移居县城。国民党187师师长张光琼、160师师长温淑海等人，得知张光第到县城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一方面派军医为张光第治病，一方面对他加以软禁和审讯。要他设法“叫吴新民归来”使“彼辈归正”等等，遭到张光第的拒绝。张光第被审讯回到家后，准备立即逃离县城。但此时家中前后门已被敌人设岗把守，无法逃脱。当游击队派员乔装卖柴人送柴进屋，以“能否逃出”相询时，张光第告知来人：“逃脱已不可能，请转告同志们坚持斗争！”随后，即被国民党县警察局抓走，投进监狱。在狱中，国民党反动军警仍想尽办法威迫、诱骗他出面“招抚”风度队为“政府效劳”，均遭到张光第的拒绝，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遂下令处死张光第。当张光第被押赴刑场时，他大义凛然，向沿途群众高呼“我抗日无罪”，

“革命一定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1951年，始兴县人民政府决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迁墓仪式。张光第作为一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一位爱国爱家的民主人士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始兴人民心中。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 告各界人民书

从前各省军队，到处摧残蹂躏。人民所受痛苦，真是火热水深。闻有军队到来，即行逃匿山林。此等流离惨状，本师夙所痛心。今者本师过境，恐怕人民虚惊。特将本师宗旨，向我各界声明。本师是革命军，是人民的卫兵。为谋人民利益，历史无限光荣。自从民十北伐，以及回师讨陈，讨沈与讨杨刘，几次东征南征。皆为人民而战，受尽人民欢迎。所有全体官兵，概属工人出身。为了失业破产，才来投入军营。家中父老兄弟，仍是农民工人。与我各界关系，无异骨肉之亲。军民原属一体，毫无畛域可分。此次奉命北伐，专为伐罪吊民。打倒吴贼佩孚，剿灭叶贼开鑫。会师武昌汉口，长驱直捣北京。所有大小军阀，与夫贪官劣绅。以及帝国主义，务期剷除肃清。解除人民痛苦，拯救国沉沦。师行所至之处，纪律绝对严明。凡有一举一动，概为主义是遵。决不分毫骚扰，失我父老同情，望我农工商学，都各尽其所能。从速联合组织，起来帮忙我们。实行军民合作，团结一致精神，共同努力奋斗，和那军阀战争。本师誓作先锋，为我人民牺牲。所望各界团结，来作本师援军，完成国民革命，实现统一和平。特此诚恳布告，幸勿疑惧横生。

——这是1926年6月北伐军进军湖南时沿途张贴的布告。原文是湖南永兴当年读小学的廖恒爱抄录在《杂录课本》上的。

罗佛金与九龙起义

江 军

罗佛金（1897—1952），原名罗德金。广东英德县九龙乡金造村人。解放前，曾任九龙乡乡长、杀敌大队长，英清阳边境联防队长，抗日自卫大队长等职。

罗的祖父罗绍雄，在九龙墟开米铺，生意兴隆，颇有积蓄，家境富庶。后因好赌博，把积攒下来的钱财输光了。父亲罗世福，是个书呆子，教书先生，好吸鸦片，加上儿女多，罗佛金的手下有四个弟弟，因此，生活负担日重，家庭已完全破产，只剩下两间房屋栖身。兄弟十岁时，仍无裤子穿，更没机会读书识字。为了生活，只得四出谋生，先后淘过金、开过赌、当过兵，然而，还是无法摆脱困境。

当时，族中秀才罗文灿，发现罗佛金很有义气，为人公正，而且胆识过人，遇事亦能挺身而出，便将他收在身边做自己的助手。文灿去世后，由罗佛金充当族中的“一哥”。当时，族中若发生纠纷，只要罗一出面，便可解决。因此，在九龙一带，他成了一个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人物。1944年，罗佛金被推荐为九龙乡乡长兼抗日自卫大队长。以后，又兼任抗日杀敌大队长。

一、出人出枪，拉起抗日队伍

1944年夏，日军为了打通粤汉路，再度窜犯粤北。阳山中学的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暑假期间，组织

起来，下乡进行抗日宣传。由罗文渊任队长，罗佛金之子罗发任副队长的有十多个同学组成的宣传队，从阳山长途跋涉，一直活动在英西九龙、明迳等地。

宣传队到达九龙金造，得到担任九龙乡乡长兼抗日自卫大队长的罗佛金的帮助和支持。他将宣传队员安置在乡的抗日自卫大队部，免费招待食宿。宣传队住下之后，立即向一百多抗日自卫大队官兵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教唱抗日歌曲、讲解游击战略战术等军事知识。在罗佛金的赞同下，宣传队还上街演抗日话剧，唱抗日歌曲，张贴漫画和传单。宣传队的这些活动，也使罗佛金受到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

1945年1月，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为了开展英西一带的武装斗争，根据九龙地区形势和罗佛金的表现，决定在九龙组织一支抗日武装队伍。经得莫雄（原国民党挺二纵队司令员）的同意，成立挺进第二纵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九龙地区拟组编该中队的第二小队，由罗发任小队长。为此委托当时在九龙一带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学基（即熊河清）做罗佛金的工作。

李是罗发的老师，罗佛金对他很尊重，并邀他留在家中过春节。李学基利用春节期间，经常与罗佛金谈论国际国内形势，激发他爱国抗日的热情。待时机成熟时，便将成立一个抗日小队的打算告诉他，和他一起商量。罗佛金受到耐心的启发教育后，欣然同意，并将一挺机枪，28支长枪，3支短枪（这些武器大部分是罗的私产），连同人员一起交给他的儿子罗发。一支30多人的小队很快就组织起来了。事后，族中人知道这支队伍是红军，很有意见，想把枪和人要回来。罗佛金得知此事后，亲自出面对大家说：“好了好了，红军就红军，给了就算了。”

部队成立不久，便开赴清远前线，并入成立不久的挺二九中队。就在第二小队成立还不到10天时间，获悉清远联防大队长何秋带领一班联防队员，窜回清远太平乡大布岗老家扫墓。这股汉奸队伍，武器精良，横行乡间，有恃无恐。第九中队第一小队和第二小队三个班把这股汉奸包围于田垌中，命令他们放下武器，来一个突然袭击，活捉包括何秋在内的联防队员19人，缴得长短枪17支，以及物资、弹药一批。

以后，这支队伍参加了夜袭清远城日军驻地、截击国民党反动特务武装别动军等战斗。1945年6月，第九中队宣布武装起义，成立北江抗日同盟军第一大队，何俊才任大队长，杜国栋任大队副，朱小仲任政委，熊河清（即李学基）任教导员，罗发也升任第一中队队副。

此外，据罗德海回忆，1944年夏，日军100多人进犯九龙，罗佛金布置抗日自卫队员进行狙击，以掩护群众撤退转移。战斗中，打死一名骑马的日军军曹，还缴获一支枪，交回大队部，罗佛金十分高兴，连声称赞队员：“很勇敢，不错不错。”

二、竭尽全力，支持革命斗争

“我儿子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也有我一份”。不识字的罗佛金，由于他和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经常接触，受到他们的教育和影响，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逐步加深认识，因此，对革命斗争事业，给予积极有力的支持。

当时，凡是去到他家里的，只要说是罗发的老师、同学、朋友，他都一概负责招待食宿。如吴畏、成崇正、李学基、陈传玉、郭坚等人都先后去过罗的家里，罗佛金明知他们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但仍大力支持和掩护。由罗佛金安排在营下

小学教书的郭坚，将有人跟踪他的事告知罗佛金，罗便主动送一支手枪给他作自卫防身；当国民党区分部说郭坚是“八字脚”（共产党）时，罗佛金即给予辩护。事后又迅速叫儿子罗兴强通知郭坚，要他小心，不要让敌人抓住把柄。

自罗佛金的儿子参加共产党后，他不但不反对，而且把自己的家变成中共地下党的交通站和联络点。为便于中共地下交通情报人员工作，罗佛金利用乡公所和大队部的公章，开出大量通行空白条、身份证给有关人员。连江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周明，由麦冠常两次带到九龙和金造，在罗佛金家的楼上与中共省委派来的李福海等人接头会面。据当年中共地下交通员莫坤回忆，经他带去部队而路过九龙金造的就有好几批共约100多人，都是由罗佛金招待食宿，离开时，既开给通行证，又赠送路费。

1945年，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在黎洞白沙接到上级电报，要该支队设法找到在英德、清远、阳山、广宁一带活动的珠江纵队，通知他们一起北撤。由于当时部队只有收报机，没有发报装置，黄松坚只得派麦冠常去九龙找罗佛金，告诉他有要事找罗发的部队商量。罗佛金考虑到当时的形势相当紧张，叫麦改姓罗名茂，并派两个亲信一起上路。三人到达清远白芒，找到当地武装势力的头目、开明坤士梁享，说：“大哥（罗佛金）叫茂叔来找亚发，带点东西给他。”梁享告诉他们，昨晚还有部队在村后的莫屋住过。由于梁提供线索，很快找到了部队，将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及时转达给周明。

完成联络任务后，根据周明的意见，成崇正赶回九龙金造，会见罗佛金，告诉他说：“罗发找到了，他很好。但部队许多东西很缺，粮食可以筹集到，而药品、鞋等物资却很难解决。”罗佛金当即表示，尽量想办法。以后，他在桃

源乡以罗北林“天成”伙食店和罗继华所开的砖瓦厂作点，筹集大量的枪支弹药、医药用品、六耳胶草鞋、油印纸张等物品，利用晚上叫罗姓人挑到预定地点放下，再通知部队派员去取。部队的枪坏了，也拿到点上去，再想方设法搞来零件，修好后送回给部队。1946年，部队北撤山东后，多余的武器均送到九龙，交由罗佛金保管，以后部队发展了，这些武器又如数交回部队。

1946年7月，中共小北江特委准备举办一个英（德）清（远）连（县）阳（山）等县区以上干部参加的训练班，要中共英西副特派员成崇正找一个既保密又安全的地方。这是关系到能否办好这次训练班的大事。经过反复研究，还是选在有一定基础的九龙金造。成崇正与罗佛金商量，罗欣然同意，并在他的果园后屋作为办班地点。十多人秘密地从后门进去，白天锁着果园门，办班人员在里面上课学习和讨论，李福海、李冲、李信等人轮流在此上课。办班所需的柴米油盐等开销均由罗佛金支付。每天的饭菜，均由罗的妻子钟玉妹煮好然后派专人送去。因此，办班一个多月，竟无一外人知道，也没发生过意外。

1948年7月，连江支队主力团飞雷队准备挺进连阳地区开辟武装斗争，将连江两岸连成一片。原计划从广宁经怀集挺进阳山到连县策应起义，但在途中经清远浸潭被强敌狙击而被迫退回广宁。后改从广宁绕道英清边境，再挺进阳山。部队到达九龙金造时，得到罗佛金的支持。他将筹集来的稻谷，分派给各家各户进行磨米加工，很快凑齐了3千斤大米，以解决当时部队给养。同时，派向导带部队安全通过九龙黄花，渡过小北江，胜利进入阳山境内。1949年1月，欧新部队到达金造时，罗佛金的妻子还拿出自己果园收获的3大

箩桔子，分给战士们吃。

三、交出队伍，举行九龙起义

1948年冬，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淮海战役已全面展开，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农村游击战争和中共华南香港分局关于《粉碎蒋宋进攻计划，迎接南征大军》的指示，中共广东省西江区工委决定，组织和发动九龙武装起义，建立英清阳边区人民解放大队。

1948年8月，粤桂湘边纵队政委梁嘉，委派中共地下党英西南县委书记谢鸿照负责起义前的准备。罗发也专程赶回金造，协助谢鸿照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周密细致的工作之后，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谢鸿照、罗发约请罗佛金就起义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地点选在金造罗家果园里罗佛金的卧室。

谈判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一是起义部队问题，决定全体起义，起义后，罗发任大队长，谢鸿照任政委；二是罗佛金的生活出路问题，当时向罗佛金提出两个方案：（1）起义后跟部队走，到秦皇山我们的部队驻地，那里很安全，生活由部队供给。（2）起义后即赴香港，先给2千港元，以后每月发给部分生活费。罗佛金经过再三考虑，由于早年因枪走火伤脚，随部队行走不便，决定选择赴香港这条路。

起义的前几天，按照预定计划，罗佛金先到达英德浣洗，然后，其弟罗德全从金造将预先商量好的一封信寄给他，大意是：目前黎洞、大洞游击队活动频繁，使九龙一带受到很大威胁，望大哥速将队伍拉回来保卫九龙。罗拿着信，当着众人，即挂电话英德“请示”县长，说明拉队回去的

原因，随后于1948年12月16日晚，亲率自己所辖的三个排80多人和3挺机枪、80多支长短枪，从滄洗拉回九龙金造。

第二天（12月18日），罗佛金将其所有武装人员，包括武器装备（轻机枪3挺、长短枪100多支和弹药一批）交给儿子罗发，由谢鸿照当众宣布罗佛金队伍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的队伍以金造村为据点，以太平水、大洞、黎洞为后方，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武装斗争中去。起义后，共摧毁乡公所2个，警察所1个，反动据点2个。从而补充轻机枪6挺，长短枪400多支。接着，以武装起义的人员为主，组成了英清阳边区人民解放大队。从此，这支队伍踏上了新的征途。

罗佛金起义后，按照预定方案，携带妻子儿女4人赴香港，由粤桂湘边驻香港办事处安排在该办事处的交通站内居住。临走时，罗佛金把自用的一支短枪送给与他交往密切的中共地下交通员莫坤。罗说：“这支枪是我的命根子，我把全部家产都交给共产党了。”另外一支心爱的小手枪（三号左轮），也托人将它送给隐蔽在九龙的表姐（鲁焰）使用。

四、离港回乡，参加祖国建设

1949年，全国大陆刚解放，罗佛金不顾自己年老体残，毅然离开香港，返回清远县城，由当地政府安排房屋居住，参加家乡的建设。

回来不久，任清远沙河区长的莫坤告诉他，该区国民党时期的一个大队长何继林，现仍在广州。罗佛金当即表示，愿去广州劝他放下武器做好人。罗去了两天广州，反复做何的工作，向何讲明道理。最后何表示不打算回去，但托罗将他的一支左轮枪带回沙河转交给莫坤。

1950年，小北两岸仍有土匪出没，影响水上航运。北江专署专员何俊才，亲自批准北江军分区拨出12支步枪，交给罗佛金，让他组织护航队。护航队成立半年，小北江水上航运趋于正常，罗佛金也靠参加护航所得的收入维持生活。

1951年，北江专署副专员戴作民，找到清远县委书记兼县长云昌遇商量，希望他能安排好罗佛金的工作。云考虑到罗佛金已年过半百，体弱且脚伤行走不便，因此，当清远县城成立电影院时，罗佛金便被安排在该电影院当经理。

1952年4月15日，罗佛金被错杀。这是历史上的一宗冤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韶关地委、英德和清远县委、根据实事求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指示精神，于1982年1月30日，给罗佛金进行彻底平反昭雪。对罗佛金的历史作用和对革命的贡献，终于实事求是地作出了公正的历史评价。

（作者附言：本文是根据采访知情人罗星、吴畏、莫坤、罗发、麦冠常等老同志和在英德九龙召开的座谈会获取的资料整理而成的。成稿后，又得到周明、冼润泉、吴畏、莫坤、罗发等老同志的审阅、订正。在此，特向这些老同志深表谢意。）

林宝衡支援革命回忆片断

林 英

林宝衡是英德县江古山村人，家庭出身为地主兼工商业，但因长期受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故对共产党在英东（英德东部，下同）一带的地下活动，曾经给予很大支持，为抗日和解放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仅据我所知的一些片断，回忆如下：

林宝衡为人正直，从不愿过游手好闲的寄生生活，从年轻时起，就开始经商，初在英德横石水街开设榨油铺，后回江古山开设“恒隆”杂货店，每墟肩挑进货，微利经营，生意颇好，兼有田地出租，所以收入颇丰，故有能力积极支持儿女读书。他的儿女陆续长大后，适值抗日战争开始。林宝衡目睹日寇的残暴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心中极为悲愤。广州沦陷后，其次子林名勋（当时在广州市立庚戌中学就读。解放后曾任韶关地委书记、华南工学院党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副秘书长）辍学回乡，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宝衡之弟）和名扬（宝衡长子）、名煜（宝衡之侄），由于受名勋的影响。不久，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解放前，我还长期担任江古山村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兼交通情报站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林宝衡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开始同情逐步发展为积极支持它的活动。

林宝衡支持革命活动事迹很多，现凭记忆略述一二：

筹粮捐款支援革命活动

1940年1月，林名勋参加了由中共地党粤北特委直接掌握的第七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简称挺二，由国民党进步人士莫雄任司令）。1942年11月间，因“挺二”活动经费困难，上级党派名勋和地下党员黄洞华（当时“挺二”副司令）、朱小仲等回江古山等英东地区进行筹款活动。由名勋亲与其父宝衡、祖父选三商量，其父立即应允，将家里所存二万斤稻谷，给予“挺二”以做生意为名，由我（林英）直接运往英德县城，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为“挺二”活动的经费。

1946年5月，中共北江支队北撤烟台，名勋回江古山和我们党支部一起动员群众捐献粮、物，林宝衡又捐赠胶鞋100双。同年2月，国民党军扫荡英东一带，捉去江古山村群众400多人，扬言要全部把他们杀掉。林宝衡主动协助中共地下党支部筹集稻谷一万六千多斤，由“内线”转送驻军（国民党军）姓徐的团长，全村群众始准由保长保释回家，幸免了一次大流血的灾难。又1948年1月，国民党以一个整师对英东、翁源等北江一支队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支队司令部转移到溪头山，展开反“围剿”斗争时，粮食、物资都出现较大的困难，林宝衡又主动将存放的三千多斤稻谷交中共地下交通站设法转运给北江一支司令部，及时给予支援。

掩护中共地下党领导人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林宝衡的家曾经是中共英德县地下县委机关所在地，因此，地下党往来他家的人很多，就算是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况下，他均能毫无畏惧地出色地

完成掩护中共地下党的任务。

1944年至1947年间，林宝衡先后接待了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路东工委书记谢永宽（路东是指粤汉铁路以东的英东、翁源、新丰、佛冈地区）、北江支队司令员邬强和佛冈、翁源、英德等县及部队许多领导同志，在他家里进行掩护，并巧妙地掩护他们开展了各种活动。这方面的事例很多。

如1945年6月下旬，粤赣先遣支队（即北江支队）在组织偷袭翁西（翁源西部新江一带）反动头子、翁西联防大队长何子华战斗的前夕，当时支队领导邬强、林名勋等在林宝衡家的一个楼阁上召开一次部署战斗计划的会议。他（宝衡）虽不知也不问会议在研究什么，但他心里明白他们一定有重要的事在商量，因此会议开到深夜，他就在楼下等到深夜，并主动为同志们当炊事，亲自下厨杀鸡煮粥，准备“夜霄”，还亲自送上楼上去让同志们吃。（会后，由邬强派出游击队，地下党支部派人带路，袭击何子华老巢太平寺，一举全歼翁源反动联队，当场击毙联防大队长何子华）。

林宝衡的父亲林选三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生，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林宝衡家就成为北江支队伤病员治疗养伤所。1947年秋，北一支钢铁大队杜国栋、第三大队周辉等就是在他家掩护，并经他父子精心护理治愈后才重新归队的。是年冬农历十一月，林宝衡和民兵林细有发现国民党便衣特务进入江古山收集情报，就立即报告江古山地下党支部，并在北一支手枪队黄洪勋等的协助下及时跟踪追捕，随即在江古山对面的麻地黄村活捉了3名便衣特务。

积极协助地下交通站活动

林宝衡的家还是当年中共地下交通情报站。这个交通站

常在他的支持帮助下，顺利地开展许多秘密活动。

1945年8月间，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共游击区，并对英东地区进行严密的封锁。在这白色恐怖异常情况下，当时隐蔽在江古山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浩、王茨萍等因工作急需调往外地活动。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林宝衡一方面帮助筹足他们外出的路费（宝衡将家里的稻谷卖去一千多斤），另一方面为李、王两人化装成农民打扮，并安排由交通员林锦扬母子以贩鸡鸭的名义引路，从而使李、王两人安全到达了目的地韶关。1947年夏先后由外地来参加北江第一支队的有柯丹、李锋等，均是先在林宝衡家这个交通站掩蔽，然后由他们协助安全进入部队的。

由于林宝衡父子、兄弟、子侄一家积极抗日反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致引起国民党的切齿仇恨。1948年5月，国民党军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头子龙鉴川、林世康等实行“三光”政策，大举扫荡江古山村，捕捉村民400余人，杀害村内民兵、农会会员、交通员10多人，并悬赏通缉他的儿子林名勋，还将林宝衡的家洗劫一空，房屋也一把火烧成灰烬。

虽然遭遇了这样大的困难和灾难，林宝衡从不动摇，也没有悔恨，而是默默无闻地作出了自己为革命事业的奉献。作为历史，我认为应为他记上一页。（郑宣整理）

从“捞家”到革命者

杨 博

聂钰是乳源县大布乡聂屋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跟随祖父迁到英德县石牯塘乡黄竹坑村居住，种田度日。后遭匪劫，母亲被劫持走。到聂钰21岁那年，母亲才回到家里团聚。因害怕土匪重来，再次遭殃，又迁到独山乡沙湾落户。不久，聂钰去独山乡公所当所丁。这时，李富股匪四出打家劫舍，所丁都要去剿匪打仗，难保无生命危险。聂母心很不安，要聂钰回家。经舅父朱亚礼多次劝说，他才解甲为农。辛辛苦苦耕了一年田，收到的谷子，还不够交田租，生活十分困苦。于是，又不得不离乡别井，外出谋生。先在八宝山采矿，后到黄家山“义成矿务公司”当保镖。抗战期间，“义成”下马。聂钰失业，回到大布老家。

在此期间，聂钰练就一手好枪法，命中率高，人们说他是神枪手。同时，结识了一帮“捞家”，亲如手足，十分密切。有的拜为“同年”，有的结为兄弟，斩鸡头，饮血酒，誓同生死，相依为命。由于聂钰枪法准，胆子大，敢冲敢杀，说一不二，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一般的“捞家”都很敬佩他。韭菜黄屋房份斗争，他充当打手，扶弱制强，1947年上半年，英西沙坪的结义兄弟张胜，受大地主张浩泉欺压，为报仇泄恨，邀集聂钰、邓新、何琛等“捞家”密谋，同时行动，分头行刺张浩泉一家数口。聂钰竟于白天在独山圩开枪杀死张亚选。事后，遭通缉，其他“捞家”纷纷逃到异乡避

难。聂钰龟缩在高山僻壤的大布家里。提心吊胆，日子难捱。

这时，中共英西地下党正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争取早日解放全中国。决定开辟与英西接壤的乳源大布地区，为英西人民武装起义后，部队有个回旋地。由巫大杰改名李添，率领武工组，以贩卖枪枝作掩蔽，进入大布区。

李添在平崆认识了“私塾”李锡富先生。李先生在李添的教育启迪下，对革命满腔热情，想方设法帮助李添开展革命活动。积极建议做大布聂钰的工作。他说聂钰是个“捞家”，重义气，讲信用，敢冲敢杀，说到做到。一般“捞家”都听他的，有一定势力，把他争取过来，对革命很有帮助。李添听后，感到聂钰能左右一般“捞家”是个值得争取的重要人物。于是，通过李锡富约聂钰到书房相会交谈。李添谈到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举行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打倒国民党反动势力，分田分地给农民。聂钰感到正符合自己的心愿，真是求之不得。横下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随即加入“农民自救会”。在李添直接领导布置下，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个别串连发动农民参加地下农会。教育“捞家”，支持革命。调查筹集枪枝，从赤水、卓屋、聂屋等村，借到六支步枪，密藏在平崆李杵贵家里，准备武装起义。

1948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连江支队的主力“飞雷队”，从广宁挺进到英西大湾地区。中共英西地下党在连支主力支援下，立即发动英西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公开宣布成立“英西人民抗征自救队”。不久，起义部队转移到乳源平崆整编，改名为“英阳乳曲人民反蒋抗征队”随后开到大布活

动。聂钰公开站出来，迎接部队，为部队筹粮，解决给养问题，又从聂屋二侯屋、坑唇田等村，借来步枪三支、驳壳枪五支，充实和加强部队的武装力量。尔后，跟着部队游动，做安定人心的工作。每到一村，则向群众宣讲：共产党的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害群众利益等等，教育群众要支持部队，要起来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分田分地，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教育那些不务正业者，要支持革命，不要捣乱，否则就没有好下场。这时，白竹东坪的土匪头林永邦，纠合一伙土匪抢劫东坪林屋。聂钰协助部队将林贼抓获，公开处决了。这次还查明大布垭头谢德新等人有份参与抢劫，就以部队名义责令他们把抢去的耕牛和其它财物交回原主。又有一次，江湾的土匪在刀田坳抢去大布曾发几匹布，聂钰公开发出警告：谁抢的，我知道，不交出，就捉人，小心脑袋。土匪听到之后，怕得要命，赶快把抢去的布匹送回给曾发。从此之后，在大布、江湾、白竹游击区里，再也没有发生抢劫案了。社会治安，空前良好。人民群众从此认识到共产党真正为人民除害，为人民谋利益的。

1948年10月底，英东突击大队、英西李冲部队和曲江潭颂华部队，在江湾会合。乳源县自卫总队前来进剿，驻在白竹。聂钰冒着生命危险，去白竹塘面，找到文亚佑、文亚典等人，了解到敌情，提供给部队首长研究，结果，打了一场胜仗，毙敌两人，伤敌数人，缴获步枪一支，子弹两箱。战斗结束后，留下在江湾坚持的周平武工队，通过聂钰与上座刘神养的“同年”关系，到上座掩蔽活动，以开辟九仙新区，建立据点。

“捞家”出身的聂钰，经过艰苦的斗争考验，受到领导的信任和重用。1949年春，英阳乳曲人民反蒋抗征队队长兼政委李冲任命聂钰担任新成立的“东山队”队长（中队建制）。同年七月下旬，全副美式装备的交警一个营和曲江地方反动武装七八百人，进剿江湾游击区。部队在周平的指挥下，发动江湾、大布民兵，配合“东山队”反清剿，编成机动灵活的战斗小组，占据高地要塞，打山地麻雀战，聂钰亲自率领游击队一个班和部份民兵，开赴最前线的扑船岭，与敌人展开战斗。踞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敌人。全体军民经过七日八夜的苦战，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毙伤来犯之敌30多人，我军却无一伤亡。

1949年10月，乳源解放。我和聂钰带部队进城后，改编为乳源县公安队。聂钰任队长，我任政治指导员。工作需要，聂钰带一个排的兵力，随主管乳北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即副书记）长征老干部丁兆臣驻在枚花（现归乐昌）做治安保卫工作。1950年春，土匪暴动，枚花区中队叛变，大桥区人民政府被数百土匪围攻，丁副政委带公安队前往援救，在柯杵下，遭匪阻击。聂钰指挥部队勇敢战斗，把敌人打退。同年，丁兆臣亲自批准聂钰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聂钰转业任乳源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大布公社民政助理员，最后，任乳源县敬老院院长。今年81岁高龄，已离休在家安度晚年。

（作者系韶关市粮食局离休干部）

李汉魂与南华寺

古 衡

南华寺是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宣扬“南宗禅法”佛典的发祥地，是我国著名的佛寺之一。在我国，甚至在日本、东南亚一带都有很大的影响。

南华寺始建于南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在这一千四百八十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统治者都曾多次对该寺进行修葺扩建，赐物封名。在近代，最后一次比较大规模的修建是平南王尚可喜于清代康熙七年（公元1658年）进行的。到了1932年，李汉魂任广东省西北区绥靖委员兼独立第三师师长，督师驻扎韶关期间，鉴于南华寺经过二百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整个寺院已十分破旧冷落，崩败荒芜，他多次到寺内参拜游览，看到这情景感触甚深，遂萌生了重修南华寺的念头。

要重振南华寺六祖道场，必须有个高僧作主持，李汉魂便想到福建鼓山寺的虚云长老。于是，他多次打电报请虚云前来粤北，共商其事。据虚云和尚书云，在此之前，他曾在一夜之间，三次梦见六祖惠能召唤他来南华寺主持法事。然而，虚云和尚又深知当时的南华寺已今非昔比，他便向李汉魂提出三个条件，若能答应，才来南华参阅。（1）六祖道场南华寺，永作十方丛林，任僧栖止；（2）宜征取原有子孙房众愿意交出，不可胁迫；（3）所有出入资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等事，概由施主（指汉魂——编者注）负责。

李汉魂对虚云提出的条件，一一立允。旋即，派秘书吴种石偕同广州、香港缙系十余人，专程前往福建鼓山涌泉寺，恭迎虚云赴粤。

虚云到达南华后，发现南华寺颓废败落的限度比想象中的还要差，除祖殿和宝塔、苏程庵较完整外，其余房舍，大都摧朽。看此情景，便对李汉魂说：“此事实费踌躇，贫僧力薄，恐不胜任矣。”李知道这是推托之词，逐细细询问这是什么原因，并表示，只要汉魂能办得到的，当一定尽力为之。虚云看到李汉魂颇为诚恳，便告诉他：“此系宇内名胜祖庭，今颓废如此，非翻掀重建，不足畅祖源而裕后昆，若作成次序如法，亦非历数年工程，费数十万金不办，贫僧安有此力哉？”汉魂听后，即表示只要法师留下来主持南华寺，筹款之事我一定尽力操办，并当即绘图参酌。至此，虚云长老遂于民国23年（1934年）农历八月初三六祖惠能圣诞节那天解去鼓山职务，到南华寺主持法事。

1933年，李汉魂在广州成立重修南华寺筹备会，并到处游说，带头捐出巨款（连同后来的补款，即重修南华寺未完竣，李汉魂奉准辞去绥靖委员职，捐款事宜刻日结束，而所捐款项入不敷出，欠款均由李及秘书吴种石补足。其中吴种石捐款合1058.1毫洋）2000毫洋。在李汉魂的努力下，霍芝庭、何芸樵、李宗仁、陈济棠、余汉谋、邹敏初、张汝新、陈兰影、陈维周等人士、以及许多单位、社团慷慨解囊，捐出巨款。据统计，自1933年9月至1934年8月，共捐得款项计毫洋31486.6元。重修工程亦于1933年9月按照所参酌之图纸开始动工。李汉魂除经常关心过问此事外，特派出秘书吴种石专门负责具体事宜。到1934年8月后，虚云和尚又继续募化筹款，继续重修工程。此次重修，除灵照塔和六祖殿

外，几乎是掀翻重修。此外，还捐廉奉大藏经复祖殿收藏，新造储宝橱若干皮藏圣旨、木雕和铁铸佛像、经文等寺内珍贵文物。并且，汉魂还欣然命笔，为宝塔重修题了“灵照”二字，为祖殿等处题了“衣钵真传明心见地；菩提无树落叶



归根”和“锄月耕云种昙花祇树；枕流漱石听暮鼓晨钟”两副木雕对联。使整个南华寺面目一新，更加庄严肃穆，辉煌壮丽。

1933年，日军占领广州，广东省府北迁韶关。李出任广东省府主席于韶关，将家属迁往南华精舍居住。此时，他更关心和支持南华寺。拜虚云长老为师，并用“南华”为自己的号。



1949年12月，李汉魂与夫人吴菊芳移居美国后，仍一直记挂着南华寺。1979年，李汉魂的侄儿耀辉想去美国定居，李获悉后，便劝侄儿别去，说家乡不错嘛，并嘱咐侄儿帮做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了解南华寺的情况。耀辉受托，1980年初赴南华寺住了两天。当时南华寺管委会主任林得众亲自陪同耀辉游览了全寺。对南华的情况详细作了介绍。当李汉魂在美国收到侄儿所拍的南华寺的照片，得知南华寺保存如此完好时，很是高兴，当即写信给林得众主任和南华寺的释惟因方丈，对他们表示谢意。林得众主任接信后，又复信给他，将南华寺详细情况和最近的变化，逐一作了介绍。信中还热情邀请他回祖国重游南华寺。李汉魂接信后，心情十分激动，表示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一定回来看看。

1982年6月5日，李汉魂和出生于韶关浈江河畔的女儿李演、儿子李浩等亲人，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浩、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左洪涛、韶关市统战部长冼润泉、曲江县统战部长王和清等人的陪同下，随南华寺主持释惟因法师，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南华寺。他亲眼看到南华寺保存得如此完好，当年重修南华寺的石碑和自己的亲笔题的牌匾和对联，以及蒋中正、林森等的题匾至今仍保留于原地，且油漆

一新，十分高兴。当来到祖殿前，李汉指着“衣钵真传明心见性；菩提无树落叶归根”问父亲，是否忘记了，汉魂连声说：“记得，记得，我死也不会忘记，落叶归根，落叶归根。”一边说一边邀大家在对联前拍照留念。中午，他特意在南华寺边的“精舍”小憩，真有游子终归家的惬意，甜甜地酣睡了两个多小时。

1987年6月30日，南华居士李汉魂先生不幸在美国纽约病逝，享年93岁。消息传到南华寺，寺内众僧特为汉魂老先生拜了两堂普佛，为他进行超度。1987年9月，李夫人吴菊芳，这位中山大学农学院学士、抗战时期广东省新运妇委会主任委员、广东儿教院院长，从太平洋彼岸的纽约专函南华寺释惟因方丈，拟在丈夫生前最关心和尽力支持过的南华寺营造环寺林，并捐栽岭南名果南华李一千株，让南华寺更加美丽、更加苍郁、幽静和肃穆。



图为1982年6月5日李汉魂（前面持帽者）一行随释惟因法师前往后山参观九龙泉时的情景。

附：

重修南华寺记（碑文）

释氏之入震旦，始于汉永平千八百余年矣。能师振锡，而南宗称盛，厥后衣钵不传，是南华实集佛教之大成，其声闻宏远，盖有由矣。夫因果之说，圣人不讳，释氏之广大深微，足以赅纳上智，显示诸象，足以警惕下愚，而中士存亡，亦能戒惧身心。旁辅政教，为智者辟禅悦之门，愚者迁善之径，而其象教越世，开哲学之津涯，尤彰彰也。今大府倡存名胜，响之摧陷廓清者，咸名有司谋所以保存之，著为令。曹溪于南，中国为名丛林。顾自唐龙朔而还，代远年湮，虽屡完善，亦就荒圯。汉魂受命绥靖，典军韶州，治军之余，少得瞻仰，恍然兴重修之愿，爰征贤达鬻赏，逾二万金。且以广州筹备会之推责也不敢引辞。乃命秘书吴种石董其事，鳩工庀材，简元设计，因其地以结庐筑榭，辟曹溪林营，南华精舍，拓田园五百亩，艺花果千万株，草莱者芟之，剥食者新之，而寺以濯以显。经始于民国二十二年九月，越岁八月而工竣。更捐廉奉大藏经，复祖殿为藏经阁，造储宝燹度法物，以永其传。且礼请虚云和尚来主是寺。于戏，宏宗阐法，非汉魂钝根所敢闻，他日祇园永茂，华实增繁，嘉树成林，民生少补，寓胜残于去杀，期解甲以销兵，庶不负斯举欤。谨以厓略志于石，与事捐助，例得另书。

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吴川李汉魂记厓大埔邹鲁书
镌雅斋梁朗文刻石囹囿

（碑文内标点是编者加的）

蒲风在翁源

黄安榕

按：蒲风是三十年代著名诗人，原名黄日华，广东梅县人。1911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①；抗战第二年——1938年到国民党陆军部队154师922团任上尉书记；1940年参加新四军，任皖南文联副主任（当时称“总文抗”）；1942年“皖南事变”突围后，牺牲于安徽天长县。

他一生用了大部分精力致力于新诗歌运动。曾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成立中国诗坛社。主要作品有《茫茫夜》、《生活》、《钢铁的歌唱》、《六月流火》等，先后创作诗集十五部，译诗二部、诗歌论文集三部。另有两本日记，其中一本十分完好，记录了1937年1月至1938年1月他在韶州、汕头、厦门、广州、梅县、香港等地的工作、生活、学习、创作，以及开展组织新诗歌运动的详细情况。



1938年时的蒲风

这里，着重介绍他在翁源的生活及创作情况。

1938年，抗日的烽火正燃向南粤，为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为了加强武装抗日的力量，蒲风决定携笔从戎。经同学

梁一飞^②介绍，他以“黄风”的名字，加入国民党陆军154师922团任上尉书记。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该团团长沙履逊，广东揭阳县人，“一·二八”事变时，任十九路军少校营长，曾与日本侵略军打过仗，被称为“一·二八”炮手。由于团长待人和气，敬重蒲风，且又允许他在军中开展文化——特别是诗歌的活动，这使蒲风增强了从军的决心。他在1938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决定点是：一、能有充分的写作时间，那末并不限制我的创作活动；二、军队工作较目前为实际，我正志愿着有入军工作的机会；三、团长是儒将，爽直，一切均便利；四、梁兄^③是团副，一切更无问题；五、中校团副孙晋^④相貌不凡，可以有为；六、此部队多前进人物；七、新兵，可展开一切新的教训。”由此可见，他是看准了这个部队的可塑性，早就准备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从事军中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

他在部队期间，常常特别为士兵们写诗，还亲自刻蜡板，绘封面，油印成册，并大量分发给士兵们。他的诗集出版后也是如此，无论相熟与不相熟，几乎人手一册。这些诗集如果落在不识字的兵士手上，他就说：“不要紧，你可以寄回家里去，你乡下总有识字的人，这是写给你们看的啊！如果没有钱买邮票，我给你寄，请将你家乡的地址告诉我。”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师的官兵都知道有一个诗人蒲风，他的作品流传到很远的地方。1962年，我第一次赴广东各地搜集他的遗作时，曾有人主动将他的诗集赠送给我，这距他去世已20年了！可见他当时的做法，还是有其远见的。

三十年代的翁源，还是一个小小的县城（即现在的翁城镇）。在作家的笔下：“这里／简直还谈不上‘文化’！／市街上一片肮脏／全城没有一份铅印的报纸，／来来往往的／

没有一个是青年学生。”但是，当时的翁源却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抗日阵地，为此，他又在同样的一首诗中向友人表示：

“在这冰天雪地般的／类似西伯利亚广大的荒原里，／我的歌喉诚然不能不唱，／慷慨激昂的唱”；“消极，悲观从不曾爬上我的心。／我用一切过往的信誉作保证，／我决不放弃我的责任。”“要把我们的歌奏／像空气般的播布在大众里头。”（《真理的光泽·在广大的荒原里》）。

在那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为了使自己的心愿得以实现，使自己的心声更加速即地传达给后方，他从广州买回大量的明信片，天天晚上给朋友们写“诗信”，并称之为“明信片诗”。这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特种写作！他认为“明信片诗”可以即兴即寄，以报告的、对话的、抒情的方式，毫无拘束地歌唱生活，歌唱群众英勇的抗战。他于同年3月4日抵达翁源，5月5日调防往钟落潭，前后不过二个多月的时间，一共写了21首“明信片诗”，这些诗，多是抓住刹那间的激情，一气呵成“直透肺腑为文章”。在他的诗中，有对翁源街头的描绘，有对欢迎他们的小朋友，见到军人主动敬礼的感受；有对翁源歌咏团诸同志的礼赞；还有对一次前方打了大胜仗，祝捷的人群涌向街头热烈庆祝的场面的描述。

1938年3月18日，在给诗人零零的诗中谈到他刚到翁源不够半月，真正的努力应该在迎头的日后（《真理的光泽·在广大的荒原里》）。

1938年3月24日，在给诗人可非的诗中谈到“世间正缺乏脑子政治化了的诗人。他希望自己的诗歌每一句都相似大炮、炸弹、冲锋号，猛烈地向敌人轰击。”（《真理的光泽·诗的材料象空气》）。

1938年3月25日，在给广州“中国诗坛”诸同志的诗中

提到，他每天起得比勤务兵还早，匆匆洗面，即在大道上奔跑，从不让痛苦或疲倦偷偷爬上脸！并说明，他正在对军中往来的公文程式进行改革。他取消了“实为公便”的滥词，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还始创了由左至右的直行写法（后来均被广泛推广）。（《真理的光泽·我沉浸在工作里了》）。

1938年3月吃杂粮日，在给友人的诗中提到，他从4岁起就失去了父亲，虽然靠远在印尼的大哥栽培，却也是一半吃番薯长大的。他的骨髓里有的到底是农民的本质（《真理的光泽·今天，我们开始吃杂粮》）。

1938年4月4日在给学生谢培贞（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诗中提到，陋劣的街道上，许多诚挚的小朋友举起欢迎的手，使作者深感肩负责任的重大。（《真理的光泽·敬礼》）

1938年清明节见到上坟的人后，在给友人冀春的诗中谈到，假如我们生前没有为国家出力，没有用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写下自己生命的光辉，只是为着一餐两碗饭，共着老妻生孩子，那么世间就不会有红场的肃壮，黄花岗的伟大——他们用生命的波浪来逗引起人们的景仰！因此他觉得不能在“等因”，“奉此”里过活（《真理的光泽·“等因”“奉此”》）。

1938年4月10日晨，在给诗人连城的诗中提到，青年的中国，在血泊里，在火焰熊熊中前进，成长！诗人业已与现实打成一，伟大的现实展开在血泊中，火焰里；这仅是一个起点，要再加强马力，让全世界人一瞻新中国的颜色！我们的意志是火！我们的力量是火！不久我们便是太阳！（《真理的光泽·我兴奋地欢笑起来了》）。

1938年4月13日，在给诗人林林的诗中写到，翁源古城流过了汹涌的人潮、火浪，祝捷的鞭炮声，欢欣的锣鼓声，打进

了每一个乡民沉静的心，这是因为前方打了大胜仗，日军死伤二万多人！作者在火烧的行列中，想到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欢欣，那就是当我们收复了南京、上海、平津……的时候！

（《真理的光泽·火 的行列》）。

在翁源，他除了写“明信片诗”之外，还写抒情诗、歌词和散文，并开始着手整理译诗《十二个》（俄国诗人勃洛克著）。他曾为翁源第一女子公学写了校歌，后来由著名音乐家李焕之谱曲，广为流唱；戎装随笔之一《小事大记》、戎装随笔之二《大事小记》，均曾发表在1938年3月2日、3日的广州《救亡日报》上。他的作品总是来源于生活，刚到翁源参加军官短训班归来，即创作了一首《练兵歌》（歌词附后）。

还有一次，他骑上高头大马奔驰在翁源的驻地上，当晚就写下了《奔跑吧，马儿》这首诗，离开翁源后又写了首《战马嘶鸣》。他为自己戴上近视眼镜，却能穿上戎装，武装起来为国争光，感到非常的自豪。

好男儿为着真理死
死了也荣耀，
若是一朝带得
最后的胜利回，
无限的光荣
永远照在心头！

后来，他终于病逝在战场上！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实现了他死了也光荣的诺言。这位忠实于生活献身于革命的诗人，不懈地从事诗歌运动的文学工作者，将永远地活在人们的心里！

1987年8月13日蒲风牺牲四十五周年纪念日，于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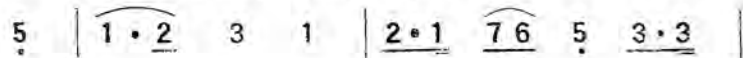
附：蒲风在翁源创作的两首歌词

练 兵 歌

1 = G $\frac{4}{4}$

蒲 风 词
煥 之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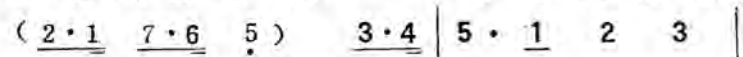
进行曲速度（用军号战鼓伴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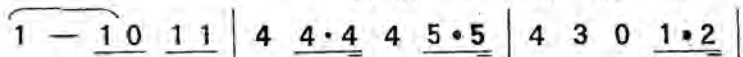
练 兵 翁 源 救 国 重 担， 今 朝
练 兵 翁 源 拯 民 水 火， 我 们



落 在 我 们 两 肩！ 我 们 不 逃 走，
原 本 来 自 田 间！ 我 们 不 怕 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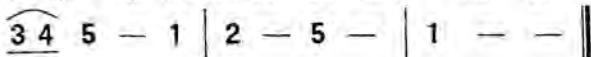
我 们 心 象 铁 石
我 们 心 象 铁 石



坚！ 我 们 要 练 好 准 确 的 炮 火， 射 杀
坚！ 我 们 要 握 紧 锐 利 的 刺 刀， 杀 绝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强 盗， 战 取 集 团 的
日 本 帝 国 主 义 强 盗， 战 取 集 团 的



名 誉， 垂 传 永 远！
名 誉， 垂 传 永 远！

（1938年于香港）

校 歌

(广东省翁源县第一女子公学校歌)

1 = F $\frac{4}{4}$

蒲 风 词
焕 之 曲

中板

(5 | 1 · 7 1 2 | 3 2·3 4 3·4 | 5 — 7 — |
1 — —) 55 | 1·7 1 2 | 3 — — 11 |
个 个 努 力 自 强, 个 个
1 · 2 3 4 | 5 — — 11 | 6 · 5 4 34 |
要 为 国 增 光! 我 们 新 女 性, 讲 团
5 12 3 55 | 3 · 3 2 3 | 1 — — 11 |
结, 讲 亲 爱, 立 志 做 个 好 国 民。 我 们
4·3 2 5·4 3 | 6·5 4 0 2 2 | 3·4 5 1·2 3 |
个 个 要 为 国 增 光, 我 们 个 个 都 努 力
4·3 2 0 5 | 1 · 1 2 2 | 1·2 3 0 2 |
自 强! 我 们 的 学 校 好 比 是 — 地
5 — 7 — | 1 — — 0 ||
久 天 长!

(1938年春于香港)

注：作曲李焕之，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注①：196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笔者的复信中提到：“1938年蒲风即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具体入党年月未详”。近从1985年4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人物志》中获知他是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故以此为准。

注②：梁一飞，广东梅县人。以后情况不明。

注③：梁兄，指梁一飞。

注④：孙君，即孙宝刚，江苏人。1938年任154师922团中校团副。“国社党”骨干。1946年初，曾以“国社党”代表身份参加民盟。以后情况不明。

〔作者简介〕黄安榕，蒲风独生女，中共党员，福建省戏剧家协会理事、福州市政协文艺组秘书、福州市文联副主任、《榕花》主编。

记全赓靖校长

张 艺

深受人民敬重的风度小学好校长全赓靖，殉难已四十二周年。为表达对她的缅怀，特撰写此文。



全赓靖校长像

(一)

1910年6月17日，全赓靖诞生于河北通州（现北京郊区通县）富兴庄的书香门第之家。

全赓靖女士的父亲全绍清，满族旗人，出身医生，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系。清王朝被推翻后，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过教育部次长。民国时期任过天津市卫生局长，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会长。北平解放后，任北京市红十字会会长。1951年8月因患脑溢血病辞世。

全赓靖女士是长女，深受父母宠爱。从念小学到中学，进的都是外国教会办的洋学堂。她从小勤奋好学，聪明灵敏。她有许多爱好，既能歌善书（画），又能弹得一手好钢琴，英语也讲得很流利。

1928年夏，她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附中，继考入国立中央美术学院就读。在美院，她结识了许多进步同学，尤其同进步的女同学方群奋亲如姐妹。在进步同学的影响和开导

下，开始阅读一些进步书报，常参加进步同学发起的课外活动，开始受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

1932年夏，她在中央美院毕业后，经挚友方群奋的介绍，同留美回国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的叶绍振教授结了婚，迁居上海。婚后三年中她生下一男一女（叶元鹤、叶元桐）。一家四口过着称心的生活，两个孩子也逗人喜爱，她深感自慰。

可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35年6月21日，叶绍振猝然死于心脏病。这使从来没有承受过如此沉重打击的全赓靖女士，陷入了深沉的悲痛之中。后来，只得带着孩子回到北平父母身边。

时正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中国，华北和平、津危在旦夕。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至使祖国大片河山被丢失，因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1935年冬，北平正酝酿着一场抗日救亡的学生爱国风暴。全赓靖女士在这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前夜，唤起了关心祖国生死存亡的热情，毅然投身于炽热的爱国运动中去。她积极走家串户，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发动各家各户给前方抗日将士写慰问信，捐赠慰劳品。还领着年小的妹妹全赓珍、全赓青到医院帮助护理伤兵。

12月9日，北平举行了示威游行，抗日救亡的烈火燃遍了北平城的大街小巷。全赓靖手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小彩旗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中去。

在“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遭受过国民党警察的军棍拷打和目睹这场白色恐怖的全赓靖女士，经受了一场严峻斗争考验和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春，住在北平古城的人们，人心惶惶，纷纷携带

家小出走。全废靖女士也带着两个孩子，在妹妹全废珍陪伴下离开北平，南下广东。几经周折，辗转到了丈夫的老家广东梅县大河背叶屋村。

丈夫的老家有一个从年青一直守寡的婆婆和一个守寡又长期患病的姐姐。三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度日也真够艰难，幸亏婆媳姑嫂彼此同情谅解，相依为命。

为致力于教育事业，她应聘到梅县广益中学任教。

在大河背农村，她结识了许多称心姐妹，精神上又增添了安慰和寄托。她看到南方妇女深受的重重压迫和极端贫苦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对她们具有的勤劳善良的美德，表示钦佩。为了唤起社会尊重和关心妇女，她将所见所闻写成文章，投寄香港进步刊物《中国妇女》，文章得以刊载。

1938年春，在香港的挚友方群奋要赴苏联学习，邀请全废靖女士同往。她十分乐意，由衷的高兴、激动。但是，在她从梅县乘汽车去香港途中，因翻车拆断了筋骨。无奈，又返回梅县治伤。赴苏没有成行，又中断了同方群奋的联系。伤愈后，只好又回到广益中学任教。

1939年春，全废靖女士丈夫的老相识、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到梅县视察时，召见了她，并劝她到自己家乡（始兴清化彩岭村）的风度小学任教导主任。她于同年夏天带着孩子应聘赴任了。

（二）

风度小学广大师生热烈欢迎全废靖到校任教。在风度，她感到自己不再是孤独无靠了，心里踏实了。翌年春，张光第校长调离风度小学后，任教导主任的全废靖女士接任校长职。

学校图书室藏有许多进步书刊。她被这些在别的地方不容易看到的书刊迷住了，便如饥似渴地阅读，祈望能在书海中寻找到她多年苦思不解问题的答案。

当时，在风度小学任教的中共始兴地下党县委和风度党支部负责人袁鸿飞、邓文礼、周耿光、吴新民等，都很关心她，主动向她传授革命道理，以积极的姿态支持她的工作。

全校长经常同教师一起到农村接触农民群众后，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对学生也更关心和爱护了。她常对教师们说：“我们当教员的，就要把全部爱倾注到学生身上。”学生病了，她像慈母般的到床前看望，交待校卫生室免费送药，叮嘱厨房做病号餐；学生大多数是贫苦人家的子弟，为减轻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在张发奎将军支持下，免收学生学费和书杂费，免费发给每个学生衣服，每周免费给每个学生伙食加半斤肉，有的特别贫困的学生便享受工读生待遇，并免收伙食费。学生张发福，家贫如洗，尽管全校长月薪只有三百多斤稻谷，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已够紧了，但她还是自己掏钱为张发福代交伙食费。

全校长还带领全校教工一起，对当时的教育内容和制度进行改革。同时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在教育改革中，全校长把“教、学、做”三者结合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毅、勇、决、诚”作为风度的校训。她敢于摒弃国民党规定小学必读的“复兴书店”（有同志说是“中正书局”）出版的课本，而采用“开明书店”出版的较进步的课本。

国民党规定，小学应实行“新生活运动”和“童子军”制度。而风度小学则以适应抗日救亡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实行军事化制度。每周两节军事课，学生接受军事训练，高

年级的学生要扛着步枪上军操，不时举行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为使各种制度持续下去，学校开展“三化”（思想科学化、生活军事化、体育普遍化）竞赛运动，每月每季组织检查评比，表彰先进班级和个人。

为发动全校师生大唱抗日歌曲。全校校长经常亲自教唱和领唱。学校经常举行歌咏比赛。此外，全校校长还亲自为《风度学校校歌》作词，（著名音乐家孙慎为该歌谱曲，见我刊第九辑）。校歌气势雄壮，很有鼓动力。

为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上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在全校长主持下，学校先后出版了《风度报》和《风度》三日刊（均油印版），深受校内外读者的欢迎。在1941年后的几年中，学校利用寒暑假，三次组织大型的“风度抗日文艺宣传队”，在全校长亲自率领下，远途跋涉到翁源、英德、曲江、始兴县城的一些学校、墟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博得了社会上的普遍好评。

全校校长在风度进行的教育改革和支持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遭到了顽固势力的诽谤，并向张发奎将军密告。结果，她被调到广西柳州志锐中学的小学部任主任，暗中对她进行审查。她多次机智地应付各种审查。最后，又把她重新调回风度任校长。

（三）

1941年夏，曲江“三青团”总部派骨干分子林培营潜入风度小学，以读书为名，大量收集进步学生言行，并欲在学生中发展“三青团”组织。全校校长获悉后，便在学生大小集会上点名批评林培营，使学生认清了林培营的面目，因此，没有一个学生参加“三青团”组织。林培营被孤立后，被迫

提前退学离开了风度小学。

1943年暑假期间，中共风度地下党为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培养骨干，在学校举办了以教工为主要成员的军事训练班。全校长不但从财力物力积极支持，而且自己也积极参加学习和训练。在她的积极支持和影响下，训练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4年夏，志锐中学的反动校长杨瑜，为收集风度中共地下党情报，进而控制风度，他便以协助风度小学教学为名，派了三名爪牙（志锐学生）进入风度小学。全校长知道后非常气愤说：“杨瑜既然又踩到我的头上来了，哪就再比个高低吧！”于是，她警告他们三人，要老老实实教书，不得胡作非为。三人一听面如土色，低头无语。由于面目被识破，活动又无门，不久，杨瑜只好将他们撤回志锐中学。

1944年夏秋间，中共北江特委组织干事李福海，在曲江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押关南雄监狱。风度中共地下党委托全校长出面营救。全校长社交广，在上层人士中有一定关系和影响，她欣然接受委托，四处奔走。最后，她通过早年跟随过孙中山，富有正义感的广东省侨务处长张天爵先生将李福海同志作为归侨保释出狱。

1939年至1941年期间，风度小学董事长张发奎将军，根据风度要组织武装抗日救国保家乡的要求，先后拨给学校300多支（挺）枪支。1944年冬，国民党始兴县长江锦兴，县党部书记长吴英禄和志锐校长杨瑜合谋，以加强保卫县政府为由，用借的名义，企图收缴风度小学的武器。全校长同大家商量后采取了对策：根据张发奎将军原同意风度组织抗日武装的电报，组织起风度护校独立分队，同时配给一些教师自卫手枪，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把自用后多余的武器秘

密转移到安全地区掩蔽；由全校长出面对付“借”枪者。

一天，江锦兴带着随员到风度小学直截了当向全校长提出借枪之事。全校长回答说：“在这动乱的日子里，县政府的保卫工作确实要加强。但也不瞒你说，由于我们不会管理，许多枪支都坏了，好的没有多少了。江县长一定要借，我还得请示张长官，他吩咐过，没经过他同意不准外借。请江县长稍等一些日子。”她巧妙的回答，使江锦兴无话可说，快快而去。以后，又派员多次来校催借，全校长总是说：“真对不起！张长官还没有回信”。其实，她没有因借枪之事给张发奎将军写信，哪有回信呢？借枪之事就此一拖再拖，不了了之。

1945年春秋，中共北江特委林华康和同行的张泉林，从英德到风度小学路经清化隘子墟时，被国民党驻军拘留。当时林的手杖内密藏着中共省临委的绝密文件，情况十分危急。全校长受中共风度地下党委托，在周耿光陪同下前往交涉。最后，全赉靖以校长名义具保后，林华康和张泉林才当场释放出来。

1945年2月始兴沦陷后，全校长积极支持学校广大进步师生参加风度抗日游击队。将学校全部武器（计有重机枪1挺，冲锋枪10支，手枪20支，步枪200多支，手榴弹100多颗，子弹六、七万发）交给游击队。学校拿出钱，她也把卖掉丈夫名份家产所得的钱供给游击队。

1945年4月，县参议长张光第先生和坚持地下工作的“抗盟”盟员田章、郭家兴等人被捕入狱。全校长不惧威胁，冒着生命危险，几次只身进入县衙门，当面指责江锦兴无辜扣押抗日爱国人士，要他无条件放人。还亲自到狱中探望和鼓励在押人士。

由于顽固的江锦兴坚持不放手，又威胁全校长，要她交出风度抗日游击队大队长吴新民，企图以人质逼风度抗日游击队就范。以后，又派出军队围剿风度抗日游击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抗日风度大队和其他游击武装一起于6月下旬攻下始兴县政府，营救出所有被关押的爱国人士和群众。

在中共党的长期教育下，全校长在残酷斗争的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1945春末，她终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中共北江特委林华康亲自主持了她的入党宣誓仪式。

(四)

风度抗日游击队占领始兴县政府后，设在风度小学的中共地下党据点暴露了。为了集中力量到前线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关闭了风度学校。全校长携带着儿女和最后一批中共党员、盟员及进步师生参加了风度抗日游击队。

由于全校长身患风湿、贫血和心脏病，又深度近视，不便于跟随日夜行军和连续作战的武装队伍，她奉命留在游击队根据地八约花山村负责民运工作。她带着刚十二岁的儿子和十一岁的女儿住在花山村后，便积极走家串户，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保家乡的革命道理。举办民众文化夜校，教农民识字，教农民唱歌，她召集村上儿童组织起儿童团，也支持儿女加入，并指导儿童团排练文艺节目，到各村进行宣传演出，布置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路过的陌生人。她常到风度抗日游击队设在花山村的临时医院看望和帮助护理病员。农民的孩子生了病，她领到临时医院免费看病取药。风度游击队大队长吴新民，参谋长邓文礼等人给了她一些钱，叮嘱她买药治病。但她把买药的钱救济了贫困户。她结婚时的一个白金戒指，是身上唯一最值钱的东西，跟随她已20年，也把

它变卖后所得的钱救济了贫苦农民。广大群众也很关心她，有的给她送上几只鸡蛋，有的给她送几斤花生……。

1945年8月1日天未亮，离花山村不远的地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全校长断定是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风度抗日游击队发动进攻。在这危急时刻，她即告知临时医院护理人员刘望恩，刘贤思带着伤病员疏散上山。交待交通站长，儿童团负责人官汝川将儿童团分散到农户家掩蔽。动员村上农民青壮年上山躲避。她换上农妇服装准备突围。可是，花山村已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大小路口也布上了岗哨。来不及撤退的全校长和女儿叶元桐，以及20多位游击队的伤病员，工作人员和许多农民群众被逮捕了，并于下午押往始兴县城。

全校长虽遭到国民党团部、师部以残酷的电刑进行审讯，但她总是顽强坚持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没有罪，何来其罪的坚定立场。最后国民党师部把她押送到江西寻鄜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

1946年春末，年仅36岁的全校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她的鲜血洒在寻鄜的土地上。

解放后，始兴县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全废靖校长光荣的历史功迹，将她的英名刻在始兴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并将当年她生活战斗过的清化地区的司前小学改名为“废靖小学”。

笔者附言：笔者当年在风度小学任教。此文曾同全废靖的妹妹全废珍、全废青，儿子叶元鹤进行了修改补充。女儿叶元桐去世前已提供有关材料。亦参考了原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军队中任指导员、参与审讯过全校长的周冷、张易生提供的材料。经原中共始兴地党县委书记，风度小学党支部书记周耿光（周健夫）的最后审阅。

悠悠寸草心 耿耿赤子情

——记艰苦奋斗的教育工作者包华

陆 素

前韶州师范校长包华已逝世二十多年了。他于1964年4月被肺癌夺去了生命，时年仅53年。在这53年中，他有24个春秋辗转战斗在韶关地区，献出了他的一切。现在仅就自己所见所闻，粗略回忆他的一些事迹，权当我所敬重的一个优秀的老知识份子奉上一瓣心香。

执着的追求

包华是日本归侨，原姓鲍，祖籍广东省现珠海县前山区白石乡。1911年2月出生于日本横滨市一个洋行职员和华侨家庭。小时就读于孙中山先生创办的有革命传统的日本横滨市华侨学校。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和高尚品德的教育。

1923年，他在这个学校毕业。因遇上日本大地震，父亲带着他的弟妹们回国暂住，留下他只身在日本。这时他逃难到神户市，进入一间英国轮船公司当童工，从此踏入终日忍受残酷剥削的境地。他怀着求知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强烈愿望，白天累死累活的劳动，晚上到一家华侨教会尚志社办的夜校读英语。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到进步教师组织的读书会中，接触到不少进步书刊，思想受到很大影响。有时，他还参加日本的工会活动和一些大学的集会，看到了轮船公司属下的海员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的

斗争，从此，他立下献身革命的抱负。

1927年他在英文夜校毕业，但因出身卑微，仍然要做杂役。同年，他回到横滨，仍找不到职业。只能夜间在家里开办英文补习班，换取一点收入；日间学日语和自学中文。到1928年他才进入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当职员，担负着一家十口人生活的大部份。这时的中国，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国内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部份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远涉重洋到日本去，马列主义的传播更为广泛，日本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包华开始自发地和一些进步华侨青年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书写和散发传单、组织读书会、开办平民夜校等。到1929年春，由广州起义失败后转到日本活动的中共党员郭勤和潘兆奎（潘达的父亲）介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只有18岁。他在新成立的中共东京总支横滨支部担任宣传委员。当年10月，对中共组织及其外围进行大搜捕，东京总支被日本政府破坏，包华连同他的父亲、二弟一同被捕。在敌人搜查骚乱的间隙中，他机智地指使他还是小孩的三弟溜出去通知潘兆奎转移，得以脱险。

事件发生后，东京总支个别党员变节，暴露了组织情况，包华的身份也暴露了。在人证物证面前，他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对敌人展开了斗争。这个情节，在建国后审干时，由于“左”的影响，竟导致他终身受屈。

1930年，包华和横滨支部全体党员都被驱逐出境，押回上海，时年19岁。

1930年至1938年，包华丹心一片，执着追随革命，寻找党组织，艰苦奋斗了九年，最终回到党的怀抱。这九年，他辗转活动于广州、香港、澳门，教书、办学、写稿、筹组“旅澳青年回国服务团”……经常处于忍饥挨饿，疾病缠身

之中。

1932年初，包华转到离家乡较近，条件较方便的澳门。当时“九一八”、“一二八”事件接连发生，包即想到要投身救亡运动，掀起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抗日救亡高潮，同他的引路人培养他一样，他开始以学校为阵地着手干起来。他先是进入澳门望德女子中学任教，并尽自己所长，开展进步的文化活动，如依靠进步书店出版《学生杂志》，为当地当时比较公正的《大公报》副刊撰写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接着又和从日本回国的几个进步青年合力难苦创办濠江中学，以后还办了成人夜校，免费招收社会青年读书，参加的有工人、城市贫民。以濠中和夜校为阵地，他们积极地教育和培养青年，组织和辅导大家阅读进步书刊，排演抗日救国的话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大家参加社会上的爱国活动，组织短期下乡宣传等。成批的青年学生、工人，城市贫民从濠中和夜校受到启迪，在迷惘中找到了奔向革命的光明大道；其中的骨干份子大部份后来成为中共党员，不少至今仍在领导岗位上，而包华和其他一些教师在这许许多多工作中却仍然经常挨饥受饿。有些青年的学生回忆起来说，他们甚至经常偷着给这些老师送去食物，有时甚至只能送一点面包碎。

尔后由于大局的需要，他们把历尽艰辛办起来的濠中无条件地送给别的同志办，包自己则转入更艰苦的工作中。他组织读书会、组织业余剧社，继续团结教育青年，宣传抗日救亡，还在广州出版过小报《南国青年》。1937年他曾和许多进步朋友一起创立《旅澳中国青年回乡服务团》，并得到了中共澳门组织的领导。他和当时已经是中共党员的廖锦涛担负筹募经费和后勤工作。

1938年10月间，包华由当时澳门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余美庆介绍，重新入党。他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归宿，不再是“孤雁”了。他又把名字改为“哲魂”。寓意为灵魂有了党维系。

1938年冬，旅澳服务团大部分成员辗转到高明工作。不久，组织上也派包华回国到高明参与服务团的领导。此时广州已沦陷，形势迅速变化，继续募集经费已没有门路，服务团面临解散与坚持战斗的抉择。稍后他们得知驻四会县国民党税警总团政治大队负责人田竺僧愿意接纳进步人士去工作，并了解到田在大革命时期曾是中共党员，后因病不能随队而脱党，一直倾向进步。经过全体人员反复讨论，一致认为，他们在西江开展工作已经有一定基础，应当争取条件坚持下去，决定参加税警总团政治大队（后来这个机构改为暂八师），以合法身份坚持抗日。最初包华任该团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后任书记。在组织群众抗击日寇，培养发展一批地下党员等方面，工作卓有成效，受到中共西江特委的重视。

1939年秋，中共西江特委个别负责人听说有托派嫌疑的李之华和旅澳服务团关系密切，认为四会地下党组织情况复杂，决定解散税警团政训处特支。由于左的影响，包被停止了党的生活。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正掀起反共高潮，包华处于更险恶的境地。1940年初他离西江北上韶关，通过原来一些进步关系的介绍，到乐昌任民众教育馆长，落脚谋生，并作为阵地开展救亡工作。不久，一些不能在原地立足的地下党员，也陆续到包处栖身立足，协同开展工作。他们给民众教育馆购置一批一批的新书，开展读新书活动。仅半年，他又被乐昌反动当局迫走了。从此，又是失业，又是流浪。

乳源和“鲍先生”

1940年秋冬之间，包华跟在第四战区工作的廖锦涛联系上，廖建议他到偏僻的地方去教书，埋头苦干，作长期打算。包接纳了这个意见，1941年春，他通过关系介绍到当时最偏僻、最贫穷落后的乳源县去，改名鲍兆华。从此，他在乳源转战了五个春秋，不避艰难险阻，三进三出，做了不少的工作。那时乳源城几乎男女老少都知道有个“鲍先生”。

乳源原来大部分学校都是私塾式的，县城也仅有一所云峰镇小学，学生寥寥无几。“鲍先生”到这间小学任教导主任后，立即聘请了几位原在十二集团军工作而处境危险的地下党员到校任教，使他们掩蔽下来。他们着手改进教学，提倡新文化，推行白话文，给高年级的学生（不少已二十岁以上）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组织演讲会，时事座谈会等。同时，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进步戏剧、绘制漫画、编写街头壁报……。乳源当地一些青年说：“乳源的学校教育，是鲍先生来了才有了生机。”家长和地方人士也给予称赞。一个学期以后，各乡原来在私塾读书的青年学生也纷纷远道来“云小”读新书。

包华和一些教师，由于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而团结了一批青年，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从1941年开始，他先后通过地方人士安排了三十几个进步青年到乳源工作。分布在乳源几十个乡任教，取得了更广阔的开展革命工作的阵地。女同志还开办了妇女识字夜校，个别的还担任了县的妇女总干事，有了合法的工作地位。

1941年夏，包华为创造更为有利的工作条件，进一步提高乳源的教育文化水平，积极奔走呼吁，推动了当地士绅到

国民党县政府申请，于同年10月正式开办了乳源县立中学（一说是“创办”，一说是“复办”），并安排了一批进步教师。

经过几年积极的活动，乳源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乳源反动当局对包也产生了怀疑，而包自己也为未找到党组织而焦虑不安。1943年1月，他离开了乳源到连县，进入省立女子师范任教。1944年初，乳源国民党政府易人，包又冒险回到乳源，仍进入乳中这个老阵地任教。在学生中，乳中培养了一批觉悟较高可以信赖的骨干。这批青年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中共党员，成为乳源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坚力量。

潘达因事于7月离乳源，乳中的工作以包华为主支撑着。那时国民党三青团韶关分团干事长亲率所谓巡视团到乳源动员学生参加反动的青年军。包华对上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在下紧密依靠学生骨干和当地进步青年，彻底摧垮国民党反动派这一阴谋，结果，没有一个人参加“青年军”。

这年的12月，乳源反动当局串通校长把包华和另二位进步教师驱逐出境，妄图进一步加害，但乳源的群众同心协力地护送他们撤退了。

1945年1月，曲江沦陷，包华入山区罗坑他的学生处避难，并在那里得了病。在病中，他对他的学生和七、八个“逃难”到罗坑的青年女教师悉心进行教育开导，后来他的学生和其中4个女青年都成为中共党员。

3月初，乳源群众要求组织武装抗敌自卫，国民党政府却多方阻挠引起群众强烈的不满。地方势力头子肖作非率群众千余人包围了县政府，把它烧了，还杀了一个国民党军官车团长和一个监狱长，抓住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吕志明（后逃脱）这次事件纯系出于义愤，干完就散了。这就是当

时轰动一时的乳源“三·三民变”。这时乳源反动政权一时处于空白状态，当地进步青年主动占领了云峰镇公所，控制着乳源县城。包华闻讯，不避一切毅然又重返乳源，筹划中、小学的复学，并以镇公所名义举办青年文化补习班，开展对青年进行武装抗日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宣传工作；又筹划以“武装护校”的名义组织群众武装。4月间，日寇突然进犯乳源，包等星夜突围，撤到“民变领袖”肖作非处，说服和促成肖组织群众武装，保卫家乡。肖任联防大队长，包为政治指导员。不久，肖因经费困难，缩小了队伍，而肖的拜把兄弟——一个地主头子杨寅恭在乳源山区汤盆水挂起“乳英边区抗日联防大队部”的牌子，自任大队长，并取得了国民党游击指挥部的承认。包转到杨寅恭处做他的工作。杨对他相当尊重，但他的学生为他的安全担心，因肖作非曾经手逮捕过潘达（后为群众营救出来，掩护撤退），杨毕竟是土豪，劝包走避。包却认为：乳源，我们经营了几年，同广大群众和一些开明士绅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联系，别的地方没这个条件。我们自己又没有武装，只有对这些武装力量进行改造，创造条件建立自己的武装。同时对肖进行具体分析，认为肖、杨和原来乳源反动政权没有勾结，而且矛盾相当大，工作做得好，是有意义的。这样，他坚持了下来，并派了一学个生去找潘达回乳源共同开展工作；还出版了一份小刊物，鼓舞群众坚持抗日保家，实行坚壁清野，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久，他们又和当地进步青年江萃华领导的一部份武装联络起来。

八月间，日军还未正式投降，乳源日伪组织退出县城，包和地方武装率先入城维持秩序。这时潘达已接上中共党的组织关系，包华非常高兴。

日军正式宣布投降，地方武装被宣布结束，包华又回到乳源中学。这些年，包华的生活是清苦的，连一件棉衣也没有，开课后，一些学生和老师才凑钱给他买了一件。1945年10月初，邝哲民和潘达受中共北江特委的委派到乳源建党，包华才获得正式恢复组织关系。1946年2月因工作需要，他和潘达一起调离乳源。

真诚赤子心

建国以后，他先任北江公学副教育长，1950年秋公学停办，调任韶州师范学校校长。1954年8月间，以“托派”和“自首叛党分子”罪名，将他开除出了党，使他在历尽坎坷之后又再度陷入痛苦之中。然而，包华还是包华，他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在他所热爱的教育工作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对党无限信赖，不断地诚挚地提出申诉，每月仍把他应交的党费存起来。他总说：“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骨头，都是党的。”平日，还耐心地去劝那些因“左”的影响受到委屈的同志的工作，劝导他们相信党，任何时候都要积极工作，不要怨天忧人。正是他的这点精神，使一些同志以他为榜样，得以在艰难坎坷的岁月里保持了革命的坚定性。不幸的是，他因精神和肉体上受到长期的摧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终年为革命颠沛流离，他年近四十才结婚，身后留下一对稚子和年轻的妻子。去世前，他唯一的遗言是：“让党组织按党的原则严肃审查我的一切，解决我的党籍。如果生命不允许我等待，也希望组织经过调查，根据我处分后的表现和以前的一贯斗争的考验，死后追认我为共产党员。”并嘱咐死后将积存的党费交给党中央，以表示我对党的热爱！

1981年8月，包华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注：本文部份材料为包华遗孀冯昭仪所提供。

台湾何时光复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日本投降代表、日本台湾总督兼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领受中国受降主官的“第一号命令”，办理投降手续；然后中国受降主官广播：“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第二天，台北市举行庆祝大游行，……接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成立，行使职权，全省重新划分为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台东、花莲、澎湖等县和台北、基隆、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九个省辖市；宜兰、花莲港二县辖市。

——摘自1985年10月25日《人民政协报》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

黄 力

1947年秋天，我在广州市东北郊一个山村小学里，以教书作为掩护，和梅日新、吴锦华夫妇一起，发动东北郊农民起来抗丁抗粮、反对内战，并打算进一步筹建“农民互助团”。他们夫妇是农工民主党党员，那时候，我才是20岁的小伙子，虽然我是因在广西大学搞学生运动受到学校开除，并且国民党桂林警备司令部还发出通缉令抓我，但我毕竟年轻学识浅薄，斗争经验少，和他们相处，使我学习到不少东西。后来，我的联系人陈残云在香港来信要我立即赴港，我便和相处数月的战友们分离。

到了香港，在九龙香岛中学找到了姐姐黄新娥及姐夫陈残云，他们征询我的意见，说是在粤北打游击的粤赣先遣支队（1948年冬改为北江第一支队）派人来港，组织一批知识青年到游击区去，问我可否愿意参加？我当即表明了参加的决心。残云很严肃地对我说：

“打游击是很艰苦的。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党和人民，随时都有牺牲性命的危险。”

我坚定地点点头。

第二天下午7时，我按照联络地点见到了支队来港的组织科长刘秉阶，在他身旁还有两位比我年纪稍轻的青年，他们就是香岛中学学生石安培和陈玉辉，刘秉阶向我们交待了往游击区的路线、联络地点及暗号，说我们是第一批先走，

要求明天早上就出发。

我们一行3人，在晨光曦微的早上，登上了从尖沙咀开出的列车，告别了充满光怪陆离和矛盾色彩的香港。

到达广州后，立即转乘粤汉铁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大坑口又改乘长途汽车，傍晚前赶到翁源县新江乡公所，找到了乡公所文书胡国忠，我们对上了联络暗号，大家都亲热地围坐一起，胡也是年青人，还不到20岁的年纪，但斗争经验丰富，他告知我们，这个乡公所是“白皮红心”，也是支队的交通站。这天恰逢重阳节，他弄了一大碗肉招待我们，革命的情谊使人深感温暖，永记不忘。

夜里9点钟，胡国忠派了两名手枪队员，还请了几名民兵给我们挑行李，到达太坪大水坑支队部时，已是午夜时分。

支队部各部门住的都是竹棚，除了哨兵外，大家都进入了梦乡。负责接待我们的人带着我们进了一座小竹棚，这就是我们正式参加人民革命武装部队的第一夜。

第二天，支队政治部主任林名勋要我们写了“自传”，并分配我和陈玉辉到英东第三大队，石培安是英东人，分配他回家乡武工队工作。

在“三大”，我要求搞军事，大队长周辉要我担任军事教练员，陈玉辉任三中队小队长。

香岛中学的第二、第三批的学生陆续到来了，陈锐辉分配在三大队手枪队，莫启泰（莫雄的侄子，改名莫稚）任三中队文化教员。王冰、陈湘两个女同学留在政治部，陈道六（改名陈基）和陈裕兴均是英东人，他们也到英东武工队工作。以后还陆续来了广东文理学院学生卢绩仁（改名卢灿）、香港的技师王刚，他们到支队主力钢铁队去。知识分子参加

游击队，和战士结合在一起，既可以得到锻炼、改造思想感情，提高革命觉悟，又可以使部队提高政治、文化素质，这正好证明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伟大和正确。

当时，支队所属各地区捷报频传，从山区到平原连打胜仗，敌人龟缩一隅，不敢出动到游击区来。在这大好形势下，支队便于12月份集中各地区青年干部及新参军的知识青年，在翁西太坪支队部所在地，举办了“青年干训班”，进行军事、政治的训练；中共区党委也抽调东江、北江各支队连、排军事干部一百多人，举办“粤赣湘边区军事教导队”（代号东北队），在新丰县集中培训。我和陈玉辉、莫稚要求参加“东北队”学习军事，领导上同意了，陈玉辉便在“东北队”担任小队长，莫稚任班长，我则当政治战士。

刚好过了“冬节”，国民党军152师纠集了保安营、武警队等一千多人，向我们在新丰县羌坑集结的“东北队”进攻。战斗在凌晨打响，在新丰县的连队掩护下，我们抢先登上山头，与前来进犯的敌人展开激战，我们这个班负责掩护领导机关撤退，一直在前沿作战，直到下午二时，领导机关已安全撤走，敌人用重机枪封锁了我们后撤的道路，眼看着对面山头的敌人象蚁群似的冲过来了，我提议退下山坑掩蔽，莫稚带领全班撤退，山路崎岖陡峭，突然莫稚不小心直向山谷底下滑跌下去，我们焦急地想，这回莫仔可“革命成功”了（游击队员称牺牲为革命成功），幸而半山腰伸出的一棵树阻挡了莫稚的坠势，使他安全地下到谷底，只是头部起了几个小泡泡。

这次战斗，我方击毙敌军营长以下二十余名，伤敌军十多名。我们除了几位同志负伤外，无一名牺牲。

“东北队”转移到翁源县李洞乡，没有料想到敌军一直在追踪。这时候，1948年元旦过后不久，在翁西的支队部也遭受国民党军147师和整编99旅长途奔袭，幸有主力钢铁大队和保卫大队奋起还击，掩护支队部和青干班安全撤退。而“东北队”在半夜转移到李洞乡一间小学时，大家疲累不堪，正要躺下休息，就听到哨兵和敌军打上了，接着是机枪、手榴弹象冰雹似地倾泻而来，新丰县的连队最早冲出外面迎击敌军，掩护我们突围，当我向正前方的山头冲去时，一挺机枪从右侧扫射过来，我突然感到右股后边给重物擦过，用手一摸裤子给打了六七个洞，没有受伤。正在庆幸间，左前方又是一轮机枪扫射过来，我朝前面田坎跳下去，一个黑影在我身傍跳了下来，原来是东北队大队长陈培兴，只见他的上衣给扫射了十多个小洞，皮带也断了，肚皮给子弹擦了两道疤痕。我们冲向对面山头，陈培兴指着山道两旁一些打了结的小草说，这里刚过去敌人，这是他们的路标，我们这边走比较安全。我这时才发现我的左手腕在冲击山头时，给滚下来的大石头砸断了，手抬不起，好象已不属于我似的。没有药也没有绷带，我立即用毛巾把左腕包扎固定，陈培兴照料着我向山顶爬去，突然间两个人一齐跌进半山腰的一个小山洞里，洞口立即又给野草覆盖了，真是一个天然的避弹所呀！不久，枪声沉寂了，天也亮了，我们听见敌军吹集合号声，知道敌人要走了，心里牵挂着同志们该安全突围了吧！这时饥饿、口渴、疲累、伤口的痛楚都来了，我在裤袋里摸出一条红皮红心的红薯，拿给了陈培兴，他用劲掰断两段，两个人分吃了。

为了防止敌人留下埋伏，我们在洞里谛听着山下村庄的鸡啼声、狗吠声，就是听不见人声！直到夕阳西下，我们才

摸下山来，刚好碰到几个当地农会老乡，他们凄戚地捧来了稀粥咸菜，请我们饱啖一顿，还带我们找到了掩蔽着一个伤员。陈培兴给农会同志布置了善后工作，带着我默默地走上了归队的小路，天已黑了，迎面奔来了钢铁大队的大肖。他奉何俊才之命来联系的，他向陈培兴传达了支队在罗家山召开的反扫荡斗争紧急会议的精神：“东北队”结束集训，队员返回原单位……我和陈培兴握别，向英东方向走去。

“东北队”从集中开始就一直战斗着，战场就是课堂，战斗就是训练，直到结业还是以战斗作结束，这些实战经验比什么训练还要宝贵。

我回到英东后，还经历了多次反扫荡战斗，直到1948年7月，反扫荡斗争胜利结束，我奉命调往曲南凡垌武工队工作。

回顾七个月来的反扫荡战斗，我们消灭了大量敌军，缴获了大量的军用装备和武器，粉碎了敌人的叫嚣“三个月肃清游击队”的美梦。当然，我们也遭受到一些损失：省文理学院来的卢灿，在钢铁大队任政治指导员，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香港来的王刚在钢铁大队任文化教员期间患了重病，在当时缺药少粮、战斗频繁的岁月里，久治无效而去世！香岛中学陈锐辉这个年轻小伙子，在英东一次战斗中，他和连队为了赶援被敌军围困的“飞虎队”，当他冲向敌军时，不幸中弹倒地，卫生员扑向他，为他包扎伤口，他却大声地说：“不要管我，抢救前面伤员要紧。”他终于伤重牺牲了！……这些来自香港、广州各大中院校的青年学生，他们为革命奉献出一切，用我们惯用的充满乐观主义和自豪的语言来说：“他们革命成功了！”

在游击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我经受了战火的洗礼，

也感到自己成长了，思想也逐渐成熟了。不久，我也光荣地正式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1987. 10. 15于广州（科普楼）

（作者是广东科普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作协广东分会理事。现已离休）

民国时期官俸制度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官等官俸制度，将文官分为特任、简任、荐任、委任四等。特任不分级，中央各部部长为特任官，月俸八百元；简任分八级，中央各部（会）次长、司局长、省主席、市长等为简任官，月俸四百三十元到六百八十元；荐任官分十二级，中央各部会，省、市厅处的科长、秘书、视察、督学及县长，省辖市长等为荐任官，月俸由一百八十元到四百元；委任官分十六级，各省、市政府及中央机关的科员、股长及县政府的秘书、科长等是委任官，月俸六十元到二百元。

粤北空战录

南雄空战

陆光球

按：“九·一八”事变后，两广当局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形成半独立的局面。当时李宗仁在广西柳州办了一个航空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空军飞行员。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爆发，这些飞行员参加空战，战功显著。本文作者陆光球便是其中之一。他当时任第八中队长，为空军中尉，广东航校六期毕业，曾留学日本明野陆军飞行学校。他根据亲身经历，写了《广西空军抗日空战追记》，现选录其中《南雄空战》一个章节。

1937年12月空军第三十二中队在南宁使用破旧飞机迎战强寇以后，天天盼望接收新机参战，一直盼了半年多，未得一机一弹补充。

1938年7月，中国从英国商人购得“格里埃提”战斗机（简称格机）30架，运到衡阳机场组装。经试飞后，认为转弯性能比“伊——15”式还好。也安装固定式机枪4挺，用作缠斗最合适。唯灵敏性较“伊——15”式稍逊，为此嫡系部队都不肯要。但对“杂牌”部来说，正是“如获至宝”。于是第二十八中队（广东）、第二十九中队（广东）、第三十二中队（广西）各分得10架，皆喜出望外。

1938年8月，第三十二中队奉命前往衡阳接收“格机”

并移驻衡阳机场，归回第三大队直接指挥（此时第三大队的七、八中队已集中衡阳机场）。第三十二中队飞行员听说要接收新飞机，个个磨拳擦掌，都暗暗想：“这回轮到咱们威风威风吧！”他们离开南宁前夕，一遍又一遍抚摸自己的老伙伴“九一”战斗机，不忍离别。三十二中队就是依仗这些老伙伴与敌搏斗，使敌机自从那次空战以来，不敢再来侵犯，保证了南宁半年多的安宁。

第三十二中队到达衡阳接收“格机”以后，人人细心检查，反复试飞，对“格机”的性能尚称满意。常和七、八中队的“伊——15”式练习缠斗。“格机”转弯性能好，“伊——15”式灵敏性能佳，真是互不示弱，各有千秋，配合使用最理想。

当时敌机分批分散窜扰广东各地，狂轰滥炸，第三大队奉命派机移驻南雄机场伏击敌机。大队长（中校）吴汝璠伤愈出院不久，因报仇雪恨心切，于某日亲自率领第三十二中队“格机”6架进驻南雄机场，准备伏击（南雄机场较小，补给不易，且伏击不宜使用多机，只派6架）。翌日晨，敌战斗机9架直飞南雄上空寻衅，敌我即展开激烈空战，激烈程度亦不亚于归德空战（指徐州会战之役，在临城归德，两次击落敌机多架情况）。因敌众我寡，而且敌机向南雄上空直线飞行，我警报传递需时，致我机高度不及敌机，处于低位。激战将近半小时，大队长吴汝璠、分队长马毓鑫（桂林人，空军中尉，广西航校一期毕业）阵亡，为国捐躯。另一个分队长倪世同（桂林人，空军中尉，广西航校一期毕业）飞机中弹着火，幸跳伞生还。吴汝璠性刚强，被广东飞行员称呼“浪哥”（粤语：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归德空战后，报仇思想强烈。伤愈出院不久，即奋勇出战，不愧“浪

哥”美名。马毓鑫、倪世同也都是非常倔强的飞行员。

大队长吴汝璠、分队长马毓鑫的陈亡，分队长倪世同的飞机被打伤，都使第三队飞行员非常痛心。尤其经过战斗分析，痛心之后还要痛心。广东全境一向只有敌轰炸机分批分散窜扰，从未见敌战斗机活动，为什么情况突然变化，敌人突然在广东使用战斗机寻衅呢？更为奇怪的是，为什么我第三十二中队飞机刚刚飞到南雄机场，第二天一早，敌大量战斗机就跟踪而来，反而一架轰炸机也不见来了呢？对于这些为什么，第三大队飞行员人人心中明白：我各级指挥机构里肯定有鬼。不然的话，为什么我机伏击敌机不成，反而中了敌人的奸计？汉奸之可恨，应与日寇同诛。

事后据“航委会”公报略称：“是役我方击落敌机三架”云云。但我方牺牲了大队长和一位分队长，另一位分队长身受重伤，第三大队飞行员能够甘心吗？

注：吴汝璠，新会人。初习文科，毕业于上海南华学院，后在广东航校三期毕业，供职空军甚久，屡建奇功，授二星奖章。1938年8月30日在南雄空战牺牲，遗体由南雄县长莫雄亲自护送运回广州安葬。

“中国的战鹰”陈瑞钿

黄严 郭玉林

祖籍广东台山的美籍华人陈瑞钿，1913年生于美国砵仑市，1932年在砵仑美洲华侨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随回国投效广东空军。1936年春，被选去德国空军实习驱逐专业技术战术。1937年，任空军第二十八中队上尉副队长。抗战军

兴，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他奋不顾身，出生入死，表现出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参战两年多，击落敌机多架，骁勇善战，1939年秋，升为空军第三大队少校大队长。他作为一名爱国华侨和抗日军人，备受海内外同胞的爱戴和尊敬。国际人士誉为“中国的战鹰”（CHINA'S WARHAWK）且将他的空战事迹，编成英语课外读物，教育青少年。

1937年秋，他奉命率机3架转战粤北基地，担负粤汉铁路南段的空防任务。是年冬，他与僚机（关燕孙）在英德上空合力攻打敌轰炸机1架，敌机重创坠河而没。继而，他率同僚机（黄肇濂）追击漏网的敌轰炸机。他们轮番扫射，象离弦的箭直插敌机身上。这架敌机终于迫降在粤北始兴县南边，俘获受伤的敌飞行员1人，其他机组人员俱已饮弹毙命。

注：陈瑞翎，于1939年12月为掩护苏联援华志愿空军出发轰炸昆仑关一带敌占阵地，因座机中弹燃烧，严重灼伤，卒弃机跳下。后辗转去美国就医。伤愈曾一度回国当民航飞行员。1952年在珠仑市邮政局工作，至1983年退休。

广东妇女生产工作团在马坝

伍坤顺

创建的背景及经过

1938年夏，日军侵占广州的形势越来越紧。中共广州市委为了武装保卫广州和作打游击的准备，推动国民党当局搞社会军事训练。广州市社训总队在营模范团，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其任务是培养社会军事训练的骨干。团内有妇女队。第一期妇女队结业的学员，分配到市内各区训练女壮丁，当时市内各区都成立了妇女壮丁队。1938年七、八月间，为了开展郊区农民抗日武装，中共地下广州市委又决定推动省妇女抗敌同志会副主席陈明淑（国民党参政员、广州市政府第三科长陆宗琪的妻子）筹建“广州民众抗敌自卫团”。她对武装妇女很积极。八月间，在江村正式成立“广州民众抗敌自卫团”，团内设妇女队。陈任队长，伍坤顺任她的助手兼管教育工作。从妇女队毕业学员中调来张馥茵、杨月婷、陈素云三人作军事训练骨干，分任一、二、三分队长。以广东妇女抗敌同志会部份人员为基础，又从外面调来几个参谋、军医、会计等，成立了队部。经过深入宣传动员，有八十多个青年妇女报名参加。九月间开始训练。由于十月广州即告沦陷，我们脚跟还未站稳，被迫撤走。当时有20多人决定跟我们走。于是把她们组成“战时卫生队”和我们一起撤离广州。共产党组织派伍坤顺负责妇女自卫队的工作，由市委副书记罗范群直接领导。市委对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十分重

视。在广州撤退前，罗范群吩咐伍坤顺要同陈明淑带妇女卫生队一齐撤退，任务是在离开广州后，要抓住一切机会推动陈明淑开展妇女工作。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广州，我们带着战时卫生队，经四会、广宁乘船到左水圩。同行的有张馥茵、杨月婷、陈素云等。到左水后部分干部调到妇女大队，伍坤顺也留下。不久，由于陆宗琪的支持，由陈明淑改编为妇女大队，成立“妇孺工作团”。

此时的妇女大队，是由原广州市社训总队第二期妇女连、广州各区妇女壮丁队、第一期妇女队部份毕业学员及少年连组成。这些妇女连、队及少年连是广州沦陷时由阮秉坤（国民党女军官）、周玉珍及中共地下党员李静音、陈咏淑同各区教官带队撤至古水。到古水后成立妇女大队。广州战时卫生队是由张馥茵、杨月婷等带至妇女大队的。妇女大队原是阮秉坤任大队长，陈明淑来后，阮秉坤极为不满。当时，原广州市长、广州社会军事训练总队总队长曾养甫要把妇女大队的枪枝上交，阮秉坤也乘机逼着要交枪，学员们痛哭流涕抱枪不放。后来由湛小岑（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书记长，对抗日较有积极性）出面到曾养甫那里调解，这事才算宁息，枪支保留下来。

1939年春节前，妇孺工作团迁到连县三江圩，第一、二中队大部分学员调到干训所及卫生队受训，余下的第三中队及少年连共有二百余人。

当时妇孺工作团由陈明淑任团长，伍坤顺任秘书，下设一个中队（中队下有三个区队）一个少年队。中队长张馥茵，一区队长李云霞，二区队长杨月婷，三区队长陈素云，少年连由雷凯联负责。当时除进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外，已

开始为附近军队缝布袜。当时的学员都统称为学生（以下称学生），干部都以老师称呼，但仍然全副武装。

同年4月份，我们经过十天行军，月底到达韶关。少年连调到儿童教养院，妇孺工作团其余人驻马坝圩，住马鞍山脚下陆军医院旧址。那时广东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新运妇女会）设在韶关，中共派区白霜（梦觉）等参加。在区白霜等的推动下，新运妇女会号召组织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时，广东省赈济委员会号召各群众团体“生产自救”。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这两个会的主张。通过区白霜和陈明淑（新运妇女会委员）的努力，5月份把妇孺工作团改编为妇女生产工作团。

生产团的组织和任务

妇女生产工作团在行政上属广东新运妇女会领导，财政上由广东省赈济委员会负责。开始时，工作人员和学生约200人，以后从沦陷区、半沦陷区陆续抢救一些战地妇女来参加，到1940年春约有400多人。

当时的团长是陈明淑，秘书是伍坤顺。秘书的职责是协助团长工作，团长不在可以代拆、代行。还设有教导组、业务组、总务组。教导组长廖嫣红、业务组长陈添椒、副组长陈冠型、总务组长陈惠珍。下设二个中队，在马坝时，第一中队长张茵菡、一区队长李云霞、二区队长杨月婷、三区队长冯玉珍。第二中队长陈致一，一区队长叶宝琳，二区队长梁惠明，三区队长名字记不起来了。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是伍坤顺、陈泳椒，后来调来廖嫣红、陈冠型、邓毅如，又发展了张茵菡、冯玉珍等。由于有了这个干部班子，对开展工作十分有利。

陈明淑是国民党左派，思想开明，抗日积极，同情共产

党，很相信我们，对我们的建议都愿意采纳；也能深入群众，生活朴素，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我们为有这么一个团长而高兴，敢于大胆放手工作，可以通过她的支持，实现共产党的各项主张和建议。她也为有我们这些抗日积极分子而高兴，既可以有机会实现抗日救亡的愿望，又可以协助她做出成绩，赢得荣誉，提高威望。我们根据她这些特点，凡遇到比较大的、有群众性的好事，都拉她一齐干，提高她的威信。所以她觉得我们很贴心，是得力助手，因此，工作起来比较没有阻力，并为抗日救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时生产团的任务：主要抓住搞“生产自救”和抢救难民妇女的时机，扩大生产团，团结教育妇女，提高她们的觉悟。一方面学习文化和坚持军事训练，学会掌握武器；另一方面，必须搞好生产，发展生产，使生产团能巩固和发展下去，成为培养妇女先进思想的基地。

生产团在马坝的活动

(1) 关心群众疾苦，努力做好群众工作，把群众团结在组织的周围。

在妇女大队时期，负责总务的因克扣军饷，米里渗沙，伙食差极了。我们到马坝后，第一步就抓改善伙食，撤了原来的特务长（事务长），改由司徒蕙兰等担任，并教育她们要廉洁奉公。她们为了增加饭菜花色，起早摸黑地跑很远的地方去采购。有次事务长，还带着学生们到田里去拾捡农民收割后掉在田地的花生，用以改善伙食。在她们的努力下，使伙食有明显的好转，大家逐渐安心团的生活了。

学生们初到山区，水土不服，常常闹病，我们专门搞了病号餐，干部亲到寝室，端茶送饭，买药治疗。有个学生徐

泳絮病得面黄肌瘦，需要补养，我们给她买淮山、杞子炖果子狸，吃了几次，果然面色好转，使这位学生充满无限感激之情。区队长杨月婷还以自己微薄的报酬，买了一百多个鸡蛋分给大家吃，大家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

深秋了，天气渐寒，我们鼓励学生利用生产余下的剩料，每人做二双布袜，有的还做成棉袜，有如棉鞋。布袜穿在脚上，可比光脚穿草鞋舒服多了，大家都感到满足。

干部也很重视身教重于言教，经常到群众中去问寒问暖，晚上查铺盖被，为群众排忧解难。这些活动，我们常邀请团长陈明淑参加，她也很乐于深入群众、团结群众的。有次开大会，陈说：“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庭，我就是你们的妈妈，伍坤顺她们就是大家的大姐姐，你们喊我‘妈妈’好了。”大家齐声喊了一声“妈妈！”到会人员无不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由于干部、学生都亲身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惨遇，都是有家归不得的人，到了这个组织关心、姐妹们互相关心的环境，又受到一系列的教育，都自觉自愿地团结在组织周围，无形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力量。生产团的一切号召，真是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2）坚持军事、政治、文化教育，提高学生素质。

我们很重视干部和学生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作息定有制度，每晨早操后，各人拿张小板凳，按班级（老师干部分别参加）找一个树荫下看书、写字、记日记，或讨论问题、教唱歌。没有纸笔，用竹壳写字，或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早饭后正式上课。

坚持军事训练，每天三操二讲，按中队或区队进行，从不间断。除基本动作训练外，有时还到郊外打野战，晚上紧急集合。

政治课不分班进行。一、政治理论性教育。如讲《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二、设立了《三民主义》课，主要讲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伟大号召以及实现“三大政策”对挽救中国危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三、重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着重讲帝国主义侵华史。如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京、中日战争、历次战争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等。特别讲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侵华形势。还经常讲国际形势，揭露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恶勾当。

通过国内外形势教育，以激励大家参加反侵略战争行列的斗志。这些宣传教育材料，除了由领导我们的罗敏坤提供外，还有马坝书店韩文潮（在广州时的名字，在马坝时的名字用什么不清楚）亦经常提供。中共地下党马坝支部徐侠梅还以“抗先队”员名义常回来生产团讲课。

文化课根据文化程度分班：有初中班、小学班，每天上午上课，每周三个半天。文化高的还规定每天记日记，以加快写作、记事能力，教材内容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十大纲领”，宣传国共合作，启发爱国主义思想，提高革命觉悟为目的，从而达到提高文化水平。我们自编、自印讲义，更符合自己的要求。

针对生产团学生文化低的特点，当时在教学上很注意深入浅出，采取形象化教学方法，讲事实、举例子，教了“木兰从军”、“秋瑾就义”的慷慨激昂事迹，以及“梁上有双燕”、“买柑者言”等，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

为了响应生产自救，生产团成立后，就为附近驻军编草鞋、缝布袜、制肥皂、煮浆糊，并学习做军衣。此外，还发动学生养鸭、种菜。各中、小队都有农场，场与场开展种植

比赛，促使了各队的瓜菜种得又肥又大。那时有草鞋凳100张、缝纫机6部，后来陆续购买达100部。请了裁缝师傅、机修师傅做指导，成立车缝组，培训车缝技术。每天下午为生产时间，我们的口号是“生产救国”，“工场即战场”。使整个生产团呈现出一片生产繁忙景象。

为了开展文体活动，我们还经常组织演讲比赛、爬山比赛、排练戏剧、表演节目，还号召大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民主。对团长陈明淑的某些缺点也直言不讳，从而增进了团长和干部及学员间的相互了解。当时生产团学习“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可以说学到了手了。

为了宣传、教育、组织农民群众，一到马坝，我们就布置学生和工作人员利用空余时间帮助附近群众打扫卫生，帮助孤寡老人担水劈柴，农忙时全团出动，帮助农民割禾插秧、晒稻子，年纪大或体弱的学生组织起来，分赴各村，替农民带孩子、烧饭，让大人去搞生产。马坝的十几个村子，家家户户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

我们还开展民众识字运动，办有妇女识字班、男子成人读书班、儿童识字班。妇女、男子晚上上课，儿童白天上课，每二个月一期，轮流学习。我们以2人为一组，负责一个村，天天晚上提着小马灯，分头到上河村、下河村、廖屋、水口、矮石、扬岗山、马坝墟等去上课。主要是教识字（日常生活、生产用具的写法），教算术（认钞票、斤两、收入、支出帐），教应用文（写信、记事），更主要的是利用这些讲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大部分教材都是自编的。有的是马坝中共地下党支部供给的。当时生产团有的学生文化低，不敢去上课，我们就建立备课制度，白天为学生们备课，张馥茵教算术，伍坤顺教语文，廖嫣红教讲客家话，政治

教材由徐侠梅提供。晚上学生去讲课，“现买现卖”。培养“小先生”，为大面积开展宣传教育、识字教育创造了条件。农民们学习认真积极，晚饭后鱼贯而来，有的农妇还背着小孩或携着孩子来上课，可见农民是渴望识字，关心国家大事的。

在识字课中，每月组织一次月光晚会与农民联欢，由陈明淑或伍坤顺作宣传教育动员，然后教抗战歌曲，表演节目。在中秋节的月光晚会上，我们还发动学生去摸田螺，请农民吃田螺芋头粥，大家说说笑笑，边吃边讲，尽情欢乐。

总之，我们利用一切机会，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对农民也是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他们抗日救国的积极性。

大约在39年8月份，新运委员会通知要在生产团发展国民党党员，陈明淑把一叠“国民党入党登记表”交给我，要我办。我是共产党地下党支部书记，这工作不好办，后经过党支部研究，上级党同意，采取拖的办法，陈明淑催问了几次，我说：“大家都说抗日何必参加什么党派，没人愿意填表啊！”后来上面催得很紧，陈明淑便召开大会亲自动员说：“大家都要参加国民党，谁不参加，谁就是共产党。”为此，我们做了不少串联、启发、辨别是非等工作，结果，跨党填表参加国民党的有十多个人。其实，陈明淑何尝不知道大家讨厌国民党，以后她也没有再干预这事。表送去后也从未有人联系过，这件事总算结束了。

1939年12月，日寇扬言要攻打韶关，国民党机关忙着疏散，生产团被指定疏散到坪石，我们就此离开了马坝。

回顾这些学生、干部，都能站稳抗日救国的立场。以后都表现得爱国、正直，没有辜负生产团的培养和教育。

（作者原为杭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现已离休。）

青年会在韶关

王以敦 谢琮孙

按：青年会为公益事业所开展的各种活动，历为社会各界所称誉。其在广州时期的组织及活动，与广州沦陷后迁到韶关的组织活动，是相联的、系统的，为使读者和历史研究者能窥全豹，现将广州时期的一段，一并在此发表。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事业团体。十九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于今有一百四十多年。在中国，恰是一百周年。广州青年会也有77年的历史了。

广州青年会同其他青年会一样，本着基督教精神，以德、智、体、群四育，培养人格，服务社会为职志的。

由于孙中山先生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广州成为革命策源地。孙中山先生1924年在青年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极力赞扬了青年会以“人格救国”相号召。在这重大的策进下，广州青年会到了二十年代，就把以会所活动为中心的“四育”事业，推广到学校、工厂、商店、农村、军营及战地。其所举办的爱国运动、社会服务，在中国青年会运动中，可称得上最活跃、最积极。兹回述其荦荦大端。

热腾的爱国义举

(一)沙基惨案事起，青年会负责人李应林即驰往现场，搜集罪证，编印《六月廿三》小册子，分赠各界，并译

为英文，遍寄各国，以揭发英法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平民的罪行，为正义呼吁。

（二）省港大罢工事起，青年会组派人员到罢工总部为罢工工人服务。

（三）“九一八”事变，青年会即集中全力致力于对日研究，进行反日侵略的种种活动。半年之间，举行不同内容的活动六十余项。其中，给人民群众影响最大的为大量翻印日本首相《田中奏折》（秘本）赠给群众。从这时起，至日本投降的十多年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莫不按着《田中奏折》为蓝本。

（四）“九一八”之后，青年会一直以动员民众为中心，从各方面进行工作。1935年所办的民众歌咏队，之后发展为民众歌咏团，集合全市音乐界参加推动，进行作曲、教唱、大合唱、表演唱、全体唱。抗战期间最流行的《全国总动员》一曲，就是由作曲者何安东将其原作《前进》在本团改编。今晚教唱，第二天就在学校、工厂唱了起来，街头巷尾也唱了起来，对鼓舞群众的爱国热情，起了很大作用。

（五）“七七”事变后，广州受到轰炸。青年会立即组办两个服务团队，一为随军服务团，一为战时救护队。随军团原于事变发生的前几年已倡议组办，其时原拟随援热（热河）之师北上服务，未果。“七七”事变后，即乘机组织，随第十二集团军部队出发江苏东战场服务。当时参加的有12人，多是职业青年，由干事李圣华任团长。到前线后，遇日军进犯，转南京，再转湘赣区，为后备部队服务。次年再度组办，与香港中华青年会合作，成立委员会，扩充名额至50人，由广雅童军教员、原已担任战时救护队队长的邓锦辉为团长。在广州沦陷前，出发南浔线，随第九战区部队服务。

从此，每半年征求新团员补充。共组办了6届，为时达5年之久，参加团员有165人，服务地区达5个省分。据悉，抗战以来，由民众组办的战地服务团队，其能支持之久，经历地区之广，参加人数之多，所随部队之众，以青年会随军团为罕见。

（六）战时救护队。广州受到轰炸后立即组办。此系为市区服务的组织，参加队员50人，皆青年学生。由邓锦辉任队长，吴文伟任教练，李拯中任秘书。队部设在青年会。队员们由于爱国热情，勇毅果敢，常常奋不顾身，敌机未遁，即赶到灾区，迅速将受伤群众抢救送到医院。群众称赞为“青年救护队是得力的救护队”。

（七）其他爱国工作，有“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慰劳十九路军运动，大量征集内衣及献金。有“八一三”的救济上海回粤难民，由民政厅委托青年会办理，设有难民营多间，接待住宿及遣送回里。有“七七”后的推销广东全省的救国公债运动，由财政厅委托主办。有协助方便医院筹募经费，以维持这个慈善医院在战时的服务工作。还有推派主办广州市红十字会会务的开展等等。

迁 韶 设 会

广州沦陷前夕，青年会将全体工作人员遣资疏散。除布置一些员工驻会留守外，并保留谢琼孙、刘君朴主事两人，迁港设办事处，藉以联系会友，保存会体，一面支持已经出发前线的随军服务团继续进行工作。1939年3月，随军服务团团团长邓锦辉从前线回港，准备再组新团员之际，其时，以南浔线抗战有功而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李汉魂，托邓转信给青年会董事会，征求派员到战时省会所在地的韶关组办青

年会。青年会董事会接受邀请，当即组织人员往韶，并指定谢琼孙留韶办理。同行的，除谢、刘之外，还有张宗象、王以敦及彭持盛、涂祖贺等（涂是青年会原干事涂景元之子，其后参军，在滇缅路之役壮烈牺牲）。青年会人员抵韶，受到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欢迎与支持。借得循道会风度路楼宇为会址，于6月1日成立。刘、张返港，余则留韶工作。其时，韶关常受轰炸，会务进行深得新闻界、美术界、音乐界以及教育界、文化界的热烈赞助，使计划中的种种会务，如各种演讲会、抗战画展、民众歌咏会、卫生运动、音乐演奏会、“七七”售章慰劳、教会联合服务、青年小组以及会计训练班等等，皆能迅速办起，群众参加青年会活动的，很是踊跃，使青年会工作能在烽火中迅速发展起来。

那时，在风度路，每天入夜，人们常常到青年会门前，看青年会的“会务报告牌”所标示的会务讯息，选择自己喜爱的活动。短期间，把战时韶关沉寂的局面改变过来。记得青年会在开办只三个月，广东省动员委员会主任陆宗琪曾来会访问，了解到我们连伙伙仅有4个人，地方只借用了礼拜堂的三楼一层（不是固定），每个月经费，头一个月国币280元，其后增至400元。其中有两个干事的工资由香港办事处支付。认为这么人少、地方少、钱少，能够作出这么多的工作，是很不错了。当然，我们的工作是由各界赞助的。我们以能适应环境而举办各种会务，有许多工作不需花钱的。陆宗琪对此甚感满意，在纪念周会上，介绍青年会情况，号召“要向青年会学习”。

1943年春，青年会曾邀国内青年会一些人员举行会议，报告来韶四年的进度，有下列情况：人员从4人发展为二百四十余人；场所由只有大半幢楼宇发展为7个工区；经费由

每月国币二百余元，发展为全年六万余元（救济金不算）。

工区的分布情况

青年会迁韶设会次年，即1940年秋间，顾问总干事骆爱华再度由美来华，参与韶会工作，使会务进一步发展，先后成立7个工区。

（1）会本部——包括办事处、韶关活动中心、图书馆、休憩处、救济事业处。

（2）公园前工区——有职业学校校舍、小型球场、暂宿处、来韶的教会人员联系处。

（3）黄田坝工区——有归侨宿舍、游泳场、球场、施粥站、随军团总部。

（4）龙归乡村服务处——有文化体验馆、赠医赠药处、代省银行办理农贷事务、农民接待处、入村服务。

（5）坪石学生服务处——（由港教会指派牧师主持）设小型礼拜堂，为坪石校区学生服务，办理该区学生的救济等工作。

（6）连县工区——是一个小型的青年会组织，设有委员会，由当地教会借出场所为会址，另建游泳场。会内经常举行各种活动，为当地居民及迁来内地的人员服务。1944年韶关疏散期间，韶会人员部分迁去连县，皆参加工作。

除上述外，在后期还组办海县青年会。由董事会将何明华会督在其来韶参观青年会之后所捐助的五万元，为海县分会筹备费，并由会组派人员办理。

在韶关沦陷的几个月前，还在兴宁设办事处，将会本部的办事处设此。一方面联系着仍在进行中的“枫连线”疏散救济，一方面为兴宁群众服务。并为准备上马的广州市市长

陈策，进行将在广州举办紧急救济的组织和计划。

大办救济事业

通过骆爱华同英美教会援华会的关系，请来赈款，在韶关开办种种救济事业。大致有下列诸端：

(1) 归侨服务——港陷，不少港澳同胞跑进内地。由于路途不熟悉，行旅有困难，青年会为帮助他们得到行旅上的便利，举办了归侨服务。先从东江办起，在交通要道设站。由会制订进行办法，组办人员携备经费，前往设站所在地展开工作。第一个站是惠州，得到当地青年会协助，借用场所、台凳、床板，并介绍人员参加工作。继在惠州以南的淡水陈江桥；以北之河源、灯塔，先后设起站来。主要工作是行旅上的人事服务、交通舟车、行李搬运、膳宿地方、邮汇通讯等等。各站皆设有茶水供应。

东江站办起之后，继在北江之清远、芦苞、广利等处以及三埠亦设起站来。在湛江亦设有联系处。各站的设立，皆在韶办事处组织好，根据进行办法同当地教会联系举办，约办理了半年。

(2) 战时救济——继办归侨服务之后，在韶关成立委员会，发救济金，以救济进入内地的难民。包括生活、旅费补助、设难民临时宿舍及介绍职业、医药救济等等。设专案组，审查办理。另一工作，为转付教会赈款。兴海区、潮汕区、惠阳区、北江、西江及三埠的教会，凡重庆付来的赈款，由战时救济会代为转付。后以此种转款为数日增，不宜由青年会名义办理，乃由重庆派人另行组织广东国际救济委员会办理。原来由重庆付给青年会战时救济会的赈款，亦改由国际救济会拨付。

(3) 学生救济——“七七”事变后，全国青年会为救济接近战区的学生，使能继续学业，即有全国学生救济之举。广州未沦陷前已经组织委员会办理。迁韶之后，继续组办。以粤北地区的学校为救济对象，包括韶关、坪石、桂头、连县。由学生本人填表申请，经学校审查提名，再经委员会复核决定。后期，改用工赈办法，使受救济者通过自己的劳力，并增加其服务他人的精神。

(4) 枫(湾)连(平)线疏散救济——这是救济事业中的创举，系从战火边缘中办起来的。韶关失陷前一日，骆爱华未离韶前，交给青年会钞票和药物4箱，青年会乃将上述东西运到韶东三十余里的水村安放。随即派员携带到枫湾，以备进行救济。其时，麇集于枫湾的难民已是人山人海。青年会即邀同疏散前来的熟人，立即进行施粥。接着，选好场地，开设了难民营。再隔一日，六个难民营组成，难民进场，有食有宿。同时，医疗站亦组成，由岭南大学医学院师生负责。枫湾施粥展开之夜，韶青年会最后一批疏散人员又携同韶循道会医院、岭大部分学生、韶教会教友、青年会朋友及街坊等一二百人，星夜到了枫湾。青年会人员集中于枫湾水村。枫湾营成立次天，青年会干事部邀同一些董事及朋友，开会商讨今后的工作。决议：1. 成立委员会，推潘允和、黄玉贞、马汝庄、许彼得、赵韶光、王以敦、谢琼孙等为委员，潘任主席；2. 疏散目的地为东江。

其时，粤北大雪，群山皆白。干事部邓锦辉等根据委员会意旨，组织疏散前来的16人，冒雪开路。沿途一面踏勘路途，一面布置营站。从曲江经始兴、翁源、连平，地跨4县，绵亘三百余华里，中间设有难民营3处、难民站3处、茶水站4处、通讯站1处、医疗站3处、难童所1处。从枫湾起

至连平止，称为“枫连线”。枫湾设营1个月，并从难民中组办疏散队，50人为一队，设领队、副领队、服务员、卫生员各一人，由同行者推选。领队带头，副领队押尾，服务员等帮助行李笨重者或扶老携幼者，卫生员在两头巡视。每队配有药物及多少零用金。如此一队又一队地到达连平城，约有五六万人。疏散队共办了50队。抗战以来，一个城市沦陷，难民纷纷，确象倒泻一箩蟹，而枫连线能办得整整齐齐，使之安顿得所，疏散有着。全线先后参加工作的不下三百余人，皆来自疏散的人丛中，他们自觉地出来热情协助。人们常常听到：“政府办不到的，青年会办到了。”“我们不是走难，而是旅行。”等等心里话。

“枫连线”从韶陷办起直到日本投降结束。青年会干事部的分工由王以敦任总干事，谢琼孙任副总干事兼曲、始区区长，邓锦辉任总视导兼翁、连区区长、邵明耀任总视导兼总办事处主任。后期，干事部人员移至兴宁，枫连线由原干事李圣华负责。

迁韶后的工作

青年会迁韶工作，项目繁多，过去在广州时未曾办过，或者规模较小者，迁韶之后，不因场所条件所限，都办了起来。

(1) 抗战画展——到韶初期，得到部队、机关、美术界，及由桂林来韶的美术界的热烈赞助下，举办了较大规模的抗战画展，出版专刊，引起张发奎、蒋光鼐将军等前来参观。

(2) 战利品展览——粤北大捷，缴获甚丰。随军团部分团员，因工作之便，将一部分战利品用车运韶开展览，

群众参观者甚众，大大增强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

(3) 邀请教授来韶讲学——青年会常常邀请中山大学等教授、学者、专家来韶讲学，或作系统性的专题演讲，青年学生深表欢迎，如王亚南教授讲经济，陆侃如教授讲文学，听者均极踊跃。前后被邀请的教授约有二十多人次。

(4) 乐队合奏——参加的有4个乐队，门票收入，全部用作劳军。唱片音乐欣赏，是条件所限的产物，过去在广州未曾举行过。完全由群众自己组织的演讲会，在韶亦是首办。1944年韶关疏散期间，青年会由星期一至星期五，晚晚有时事演讲。按时间，群众自己开门、开灯，讲完了，由群众息灯、关门。如是者，凡四个月。

(5) 专款办救济——过去在广州均属协助政府而办，或为灾情筹集善款。在韶期间，则大规模办理救济事业。

(6) 设立工区——来韶时才兴起。乡村服务设有场所，亦广州时所无。从青年会在韶关所设立的种种工区，反映出越在战乱之中，其服务机会越是广阔。

(7) 会友征求的突破——青年会的事业经常费（非救济费），全部均由社会人士捐助，故每年有一次会友征求运动之举。迁韶之后，征求新会友三次。1941年，以国币二万元为目标，征得四万余元；1942年目标四万元，征得六万余元；1943年，以“准备复员百万捐金运动”为口号，征得一百五十六万元。其时韶关二十二万人口，而重庆一百五十万人口，征求数却为韶关压倒，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可以说，是中国青年会征求运动的空前成绩，也是世界各国青年会征求运动的空前成绩。因为各国青年会的事业费，所仰赖于社会仅属其半数，从没有如此巨大目标。我们从这次征求运动观察，青年会迁韶工作并非徒然，它为中国全民抗日战

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人 事 一 章

青年会立法组织是董事会。迁韶期间，设董事分会，成员由原董事会的书记函聘。几年来，董事分会由黄雯任主席，邝嵩龄任副主席，熊真沛任书记（及伍学宗），区党孟任司库。还设名誉董事，由非基督徒马廷瑞、杨伸理，妇女界区婉蕖、刘丽贤及西教士山德士、谢雅各等担任。

干事部于1943年由王以敦任总干事，谢琼孙任副总干事，骆爱华任顾问总干事。几年来较得力的干事有钟国文、钟志强、邵明耀、邓锦辉、何德安等多人。

三届在韶举行征求活动，皆敦请李汉魂为总队长，余汉谋为名誉总队长，林翼中为总参谋，李大超为征求委员会主席。发动全省邀请各界热心人士组织征求队共同进行。

在韶6年，日间烽火弥漫，晚间全城灯火光辉，我们的工作不断进行，敌人无奈我何。

过去深刻的印象不能忘怀。现将谢琼孙于1970年4月所写的《烽火韶关》一首录出，作为本文的结语。

最忆当年风度中，漫天烽火赋从戎；
男儿报国心同德，猎猎旌旗映日红。

八年抗战六年韶，岁月非常是此朝；
空袭何曾吓倒我，雄心一颗胜千条。

困难不挡我前行，莫道战时有困难；
七个工区遍粤北，辉煌战果在韶关。

晚霞如锦映西门，帽子峰前一片红；
两岸连营三百里，武江湍水水淙淙。

1987.5

【作者简介】王以敦，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广州市政协副主席；谢琼孙为归国华侨（1980年由澳洲回国），是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战时广东临时省会通信建设概述

许宗熙

一 战时省会通信建制时期

广州为祖国南疆门户，即使在陈济棠主粤七、八年间，两广处于半独立状态，但对祖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株、韶段铁路建设，以及沿线的电信事业建设，也从未停止。因此，抗战前长途电话已能从广州至衡阳、长沙、汉口；广州至赣县、南昌。广州至苍梧、南宁，都有铜线载波电话直通。广州沦陷韶关为战时省会以后，就面临着如何收拾半壁河山，重建广东省电信分中心网络问题。当时省内英德、德庆与韶关电报局都是中间局，不是终端局。因此必须建立载波机务站于韶关，装用E式单路载波电话终端机，以通衡阳、桂林、赣县。而英德至韶关，德庆至苍梧，则保留铜线电话，没有载波设备。其时，省内外电报业务却相当发达，韶关局不仅是收、发电报的终端局，同时也是集中的转报中心。它与衡阳、桂林、重庆、赣县及省内兴宁，均经开放韦氏自动收发报机电路，速度、质量、效率均较好，只省内铁报线不多，且锈蚀严重，绝缘不良，难以开放长距离的韦机电报电路。而莫氏报机又因缺乏电报纸条，改用电话机作话传电报代替，通信距离短，漏电大，效率不高。因此明确了只靠有线电信不行，必须发展无线电信，以求通畅发展。至电报部份，省内东路区中心设兴宁，西路区中心设德庆（成立了广东电政管理局西南办事处），但不起作用，仅能通有线

电。南路区中心设茂名，及附近敌占区边沿局的电信，如清远芦苞局、鹤山沙坪局、三埠新昌局、遂溪麻章局、钦州东兴局，均以无线电信为主。对方以15W手摇发信设备便于疏散开设，同时加强韶关收发讯设备力量，以辅助对方之不足。即使与全国中心重庆的通信，也辅以无线设备，得以兼容并蓄。从战略意义上说，无线电信的作用，应该得到重视。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够重视，对通讯网络，也不是全国统一的。不仅部队有无线电台，公路、银行也有其独立电台，直至进行与沦陷区通信，干着别的勾当。

韶关电报局前身是曲江电报局，设在市区上后街前清中营守备衙门，后门在风采路，后辟为韶关邮电局。但韶关自1937年8月底首次被敌机轰炸后，市民白天闭门疏散向东西两郊躲避，夜间回城营业或工作。学校、机关都在市郊或四乡设立。市中心建警报台，发出警报信号，悬挂标识，以示警报种类及敌机远近。韶关电报局为了适应战时体制，首先将机线设备迁至韶市西北郊上窑村老虎岩。当时各路长途干线改筑引入，线报房设在山洞内，洞口设无线报房（即中央室遥控发讯台）、机务站与长途台。发信台与修机室由省管局直辖，设上窑村北松树林中。在市区北门大码头开设营业处，经营报话收发投递业务，具有一定规模。

但是整个战时省会的通讯建制规划，仍然存在临时任务观点，因循、保守、简陋、草率，欠缺长远、安全考虑。利用茅舍、葵棚、竹篴等简易建筑物装机贮料，没有可靠水源，要到河边担水作水冷却之用。就这样的简易措施，一遇到破坏，其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二 上窑机房火灾后恢复时期

1940年冬春之间，韶关战时省会对外电信联络，组建网制，初具规模。广东省电政管理局经营了上窑村北发讯台（机房）修机室，并蓄存油料及维修用料备用。但由于管理制度不严，麻痹大意，导致发生了上窑机房失火，顷刻间将整个机房及存油棚察付之一炬，损失之大，无法估计。起火原因，至今不明。为了逃避责任，减轻罪责，广东电政管理局制造夸大为政治破坏案件，诬过于中共地下党蓄意破坏，纵火焚烧。但无实据，便将嫌疑犯陈姓工人，自行拘捕，私设公堂，严刑拷打迫供，最后以政治破坏案移送军法审理。不久陈某死于狱中，其事遂寝，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机房失火”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权利是没有保障的，在那时候，法制也是荡然不存。

韶局机房，既遭火灾，如何恢复？规模怎样？倒是个急迫问题。有线通信，受到线路设备限制，无法扩大，只有扩大无线通信，成立直属管理局的曲江电台（笔者当时任电台工程师，其后并入韶关局任工程师，负规复之责），计划装用TF—600报话双用机，配附菱形对渝定向天线，增设自装的300瓦及100瓦发报机各一部，以加强发讯能力。为了满足扩充电台发讯需要，必须自行办电，乃成立电力室，装用以木炭气为动力燃料驱动八汽缸引擎35千瓦直流发电机组（供报房电灯照明）拖动6千瓦交流发电机供收发讯机之用。同时以砖瓦结构建筑单独的电力室，牢固的蓄水池作水冷却，重新架设无线电话遥控线路及交直流传输线路等工程。不仅供应了电信用电，同时也使岩洞内用上直流电灯，减少了煤油灯的污染，保障了工作人员之健康。此时，港澳又陷

敌手，疏散来韶的难民日众，广州过去一批公私立大、中学校，纷纷迁来韶关，中山大学迁至乐昌坪石，一时市面繁荣。及时扩充了无线电信，使电信服务，能够配合跟上。

到了1943年之后，敌人屡次扬言进攻粤北，为应付计，将100瓦发报机及3000瓦汽油发电机疏散至兴宁，加强兴宁电信局设备，设立兴宁电台及修机室，以作全省战时通信网络预备补充的考虑。当时韶关业务负担很重，但沦陷后，兴宁很快成为电信中心，负起通信任务。

三 韶关撤退沦陷时期

1945年1月23日，敌人南北两路进犯粤北，乐昌、英德相继陷敌，韶关随即撤退，大多数职工包括笔者在内家眷老弱，无车接运，只得向四乡疏散暂避。然后将电台设备搬至市区大码头待运，当日下午四时，局长们及管财务的人都逃跑了，我亲自率领电台人员守候至夜间九时，才获得一部两吨卡车，装载电台机件轮运出市，沿韶雄公路，在曲江县平铺卸车以后，回头再运一车设备及载同电台员工离开韶关，此时已是凌晨三时了！这些电台设备，得到全体员工冒险救出，很快在和平县恢复设台，维持对重庆全国电信中心之联络，并与兴宁负担起全省及东区分中心网络之电信通畅责任，至今想起来，犹历历在目。

附言：本文仅凭记忆所及草成，承欧兆仁、谭懋猷两同志提供线索，校对资料，特此致谢。

（作者系广州市政协委员）

抗战时期的英德

日机狂轰滥炸

据目击者苏耀回忆，1933年春，为截断南北交通大动脉的粤汉铁路，处于英德县境内的黎洞火车站，成了日机覬觐轰炸的目标。

黎洞火车站，西临北江、东靠小山丘，南边一公里处有“铁溪”铁路桥，再往南一段有大庙垅隧道。广州沦陷前夕，这个火车站的交通运输更为繁忙。

一日，大批逃难北上韶关的旅客，随着列车来到黎洞车站。这时，只听见防空哨所发出了最后的“当、当、当……”连发紧急警报声，旅客们立即化整为零，速迅疏散到邻近的小山丘或河坎去躲避。旅客中，有商旅，也有学生。这时，一批大学生躲到车站边的大地角村造饭吃。由于日机已迅速逼近车站上空，大家都迅即再躲避到远一点的山边去了。唯独有一个女大学生，因从广州逃难以来，三天没吃饭了，饿得要命，不想再走避了，留在房子里。主人一再催促她要立即离开，她还是说：“实在太饿了，走不动，吃饱了才算，有咁啱（广州方言。凑巧的意思）炸死我就做个炮灰”。话刚说完，日机倾泻了大批炸弹落到铁路东侧。一颗炸弹正落在这个女大学生吃饭的房里，只听得“轰隆”一声，房屋倒塌了，火光冲天。这个女大学生两条股骨被炸飞了，当场毙命，惨不忍睹！与此同时，另一个躲避在这里的商人，也被倒塌下来的房梁压死，大地角村六、七间民房也被炸塌了，福田村那边炸死不少人。由于日机连续盘旋投弹，人

被炸死，房屋被炸毁，路轨被炸断，有些铁轨炸飞到半空，落在山丘背面。

日机除轰炸铁路桥、火车站和大庙垅的火车外，还沿着北江河岸，扫射机关枪，轰炸沿河船只，惨死者，负伤者，不计其数。

由于当时日机不敢低飞，命中率差，所以其轰炸的主要目标——黎洞车站、“铁溪”铁路桥，依然完好。

据青塘老居民64岁的郑胜和69岁的廖荣杰老人回忆，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搬到韶关，第四战区司令部和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搬到曲江、翁源等地，地处广（州）韶（关）中点站的青塘镇，交通来往更为频繁，成为日寇飞机狂轰滥炸的重要目标之一。

1941年农历八月初三，是青塘街日，四乡农民赴墟赶集，聚到青塘。突然拉响紧急警报，只见九架日机随即出现在青塘的上空，经盘旋后，轮番俯冲轰炸，在青塘墟投下约280多个炸弹，几条街顷刻即成废墟，瓦砾片片，断壁残垣。其中西大街损失最为惨重：恒源、恒发源、和隆、保安堂、太和堂、顺隆、永源、怡泰等五、六十间大小商店被炸毁，建筑较为牢固的当铺围墙，也被炸弹的冲击力冲离了位置。天盛那间经营小百货的商店，有一个老妇人走动不便，被炸倒的柱子压死，死得好惨！日机投下的炸弹，既有摧毁性的重磅炸弹，也有杀伤性很强的平射炸弹；炸弹坑横直有两平方丈，深度也有一、二丈。和隆当铺背（即现在的青塘机械厂背），有这样的炸弹坑十多个，现在还留有残迹。日机投弹轰炸后，对走避不及的人群还不时用机枪扫射。

1944年农历7月的一天下午，又是青塘街日，一架日机窜到青塘上空投弹轰炸，把未逃进石洞的三、四十人，炸得

血横肉飞。村民陈阿安与父亲陈道房两人早上抬猪肉上墟卖；下午，陈道房被炸得尸首分离，肢离骨碎，由其儿子一块一块拾回，用箩筐挑回埋葬，好不惨痛！群众郑胜说：

“这对父子，上午抬猪肉卖，下午挑人肉回去，真是悲惨啊！”

几年来，青塘惨遭日机狂轰滥炸浩劫，计被炸毁居民住宅和商号有280多间，余下的150多间，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被炸死的群众共计有300多人。（陈评整理）

日军割人惨况

据谭亚宽和莫善贤的回忆，1939年冬，占领广州的日本侵略军向北进犯，侵入了英德县境，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情报不实，防守疏忽，致使敌人长驱直入，窜到县城南山，方被发觉。县府武装中队仓惶迎战，终因孤军无援，县城失守。敌人以县城为据点，四出活动，其中一个大队，以伪装的汉奸为前导，向城北十多华里近两千人毫无戒备的洋高乡（即现在江湾村）进行搜索掠夺。敌人到达该乡老围后，副乡长谭有举错把汉奸当自己人，迎上前来，向他们打招呼：“先生请饮茶。”岂料随之而来的是一大队的日本侵略军。众乡亲扶老携幼，慌忙地躲进附近蔗田和坑塘里，副乡长谭有举和在乡公所的群众谭子运、谭宜省和谭桂如同时被擒。狠心的日本侵略军，先把谭有举钉在老围岭松树上，用长长的刺刀从他的胸部一直捅到肚脐，连心肺都挖了出来。接着是生割谭子运和谭宜省，虽然没有钉在松树上，但鲜血四溅，惨不忍睹。最后杀戮谭桂如的时候，鬼子有些胆怯了，一剑捅向谭桂如的颈侧，谭昏迷倒在血泊里，鬼子未检查就忙着抢劫

去了。当谭桂如苏醒过来后，即带着严重刀伤，连夜爬回老围塘尾找到年迈的父亲谭佳为他敷药，才得以从死里逃生。

日本侵略军离开杀人现场老围岭后，便四出搜索，见猪鸡就杀，见青年妇女就奸淫，群众家里的衣物，全被捣毁，群众的家具，集中焚烧，带不走的粮食，拉屎糟踏，米缸和饭锅，到处留下粪便。

日本侵略军蹂躏了一夜，整个洋高乡满目疮夷，不堪回首。（苏鸿炯整理）

虎口杀出生路

83岁的卢勋骞回忆：我家在英德县青塘镇青北意隆村。1940年元月的一天，日本鬼子兵来了，他们一进村就搜索、掳掠、放火焚烧。我们兄弟三人，眼见就要无家可归，迫得冒险赶回家里救火。不幸，兄弟三人被日本鬼子抓住。

第二天早上，我们兄弟三人跟着鬼子兵开到青塘，接着又到了翁源的官坪。我们兄弟三人被迫给鬼子兵挑东西。我用一支没有子弹的冲锋枪，挑着他们抢来的牛肉。

到了新丰小场坪，已是黄昏时候，鬼子兵把我们三人赶进一间房子里，外有哨兵看守。不久，来了几个操中国北方口音的“日本上官”，他们问道：“这三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抓来的？”鬼子兵回答“是从青塘靠近公路不远的村子抓来的。”几个“上官”听后，竟吩咐哨兵不给我们饭吃，准备吃完晚饭后就把我们押到公路边杀掉！当时，我心里想：我们三兄弟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几个钟头后，我们就要没命了。与其在这里等死，倒不如冲出去，或可杀出条生路！这时，房的前面有两个哨兵，而且还有一个高大的医官在门口坐着，怎么办呢？经过商量，由我负责打死那个医官，哥哥

和弟弟负责击毙两个哨兵。主意定了，我们等着时机到来。

“哗——”响起了哨子声，要集中吃晚饭了。鬼子兵一窝蜂拥到晒坪去了。我们认为时机已到，于是我冲出口口，顺手拿起木槌一槌把军医打倒在地；我们三人合力左右各一槌，干掉两个哨兵。但是外面晒坪还有一个鬼子蹲着吃饭，我又顺手两槌把他打倒在地，冲出村子去了。

鬼子兵发现了，立即跟踪追赶搜索，我和哥哥卢勋过拼命往山上跑，钻进深山密林。鬼子兵没有办法，胡乱向山上乱放枪。我们终于避过了这场灾难。弟弟卢勋跌，因为来不及跑上山岗，躲进了厕所，被鬼子搜索出来，插了两剑，鲜血直流，死得好惨啊！

天黑以后，鬼子连夜收兵，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就一直往山里走，越走越远，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就沿着电线杆，走到了新丰的寨下。几经辗转，历经艰难，终于回到村里。此时，村上一片凄凉，到处硝烟瓦砾。走到菜园，发现堂嫂赤身裸体，阴部竟被一条木棒插着，尸体已经发臭，凄惨万分，令人愤慨。（陈评整理）

摧毁日军船队

1945年春夏间的一天，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西北支队在侦得日寇运输船队要经北江南坑的情报后，决定由刘黑仔带领一个中队埋伏在北江西岸南坑一带。那天，日寇由十艘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分成两排由北向南气势凶凶地向南坑开来，当敌运输船队靠近伏击点，进入伏击圈时，有神枪手之称的刘黑仔便一声令下，两挺机枪和步枪以密集火力扫射敌船队，船上的鬼子顿时一片慌乱，愤怒的子弹雨点般地射向敌人，只见敌人一个个倒下去，跳入河里的也被密集的子

击毙。战斗持续时间不长，却把鬼子的船队全部摧毁。伏击部队撤出战斗后，驻守在对岸大樟口守护铁桥的日军才弄清其运输船队遭伏击，便用重机枪及小钢炮向伏击部队阵地猛烈攻击。然而，伏击部队已迅速撤出战斗，返回驻地。

南坑伏击战斗胜利的消息传遍了部队驻地及附近村庄。当年还印了一份题为“义勇军旗开得胜，日本鬼血染北江河”的战报，大大鼓舞军民斗志。（陈炳谋整理）

潭洛伏击日军

据吴陈、李郁才老人回忆，1944年夏，日军一个大队以松岗围为据点，经常派出四、五十人到十多里的车埕围等地进行掠夺，当时虽已实行了坚壁清野，群众把东西疏散到密林中去，但日寇依然到处搜索，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群众义愤填膺，恨之入骨。

为了打击敌人，群众推举了李郁才等人，从驻扎在20多里的北江东岸鸡坑国民党158师请来了一个排（约40多人）的兵力。

7月10日，天蒙蒙亮，158师张连长率领40多名战士，渡过北江，进入车埕围的潭洛。这里是一个娥眉月形的小山岗，前面是银瓶潭，形势险要，是日寇掠夺车埕围必经之地。布阵完毕，当地群众虽然在缺粮情况下，仍然尽力让官兵们吃饱一顿。

鉴于日寇的经常骚扰，为了及早发现敌人，保护生产和村民安全，群众在潭洛前面三华里的掏金窿坳，设了一个岗哨，以竹竿为标记。平时，竹竿竖起，当发现鬼子出动的时候，竹竿就放下来，让群众早作准备，及时疏散。

上午八点，当伏击的官兵刚吃完早饭，负责掏金窿坳的哨兵李承夫把竹竿放了下来。不久，40多个鬼子兵出现在离潭洛不远的地方，眼看敌人就要进入伏击圈了，由于所埋地雷出现了破绽，鬼子兵停止前进。就在这时，张连长一声令下：“打！”霎时，机枪声、步枪声向着目标一齐响了起来，一排排手榴弹掷向敌人。战斗仅仅进行了几分钟，就消灭了鬼子30多人，其余残敌则龟缩在潭洛路旁的一个防空洞里，负隅顽抗。

这次伏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斗志。战斗结束后，张连长便迅速撤返驻地。（苏鸿炯整理）

第七战区乐、仁、乳守备区抗战纪实

林 荟 材

1943年间，湖南长沙、衡阳先后失守，日寇企图打通粤汉铁路线，在武汉特别训练特种兵约两个师团，要士兵腿部装置爬山越岭徒涉工具和照明器，日伏夜行，向高山峻岭流窜。

1945年1月初，由湖南道县分别向粤北之连县、阳山、乳源、乐昌等县分窜入境，连县首先告急。1945年1月12日，我奉广东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李汉魂命，派赴连县指挥地方团队抗敌并收容省属一切武装及地方行政人员，取道乐昌坪石，正遭遇着一股流窜之敌，途中被阻，暂留坪石待机行止；19日，第七战区乐、仁、乳守备区司令林廷华到坪石，指挥陆军第160师莫福如部479团张宗岳、480团黄锡彤两个团堵击敌人，林司令邀我参战，我电准将收容的省保安第三团第三营李藩部、省独立保安第8中队陈炎坤部以及一些零散武装人员，编组成一个排，林司令再拨第七战区军官干训团（林兼该团教育长）学生第五中队何耀东部、学生迫击炮中队邓侠部和乐昌县詹宝光的一个自卫大队，合编为该守备区廊田指挥所，我负责指挥。

这些学生队，实际都是小伙子，原为广东儿童教养院院长吴菊芳所收容的一批被战祸、天灾而失去父母或亲人的孤儿，后编为学生队。他们积极要求参加抗日，为国家民族及亲人报仇雪恨。这些“小鬼”，当时年仅十四、十五岁，人仅有短筒七九步枪那样高，有些枪还比人高。但他们人小志

高，杀敌非常英勇。

战楼下 堵隘口

1945年1月22日，乐城沦陷。160师张、黄两团归还建制，廊田指挥所所属战斗部队，无形中居于守备区的主力部队。在乐昌城未陷的前一天，奉命占领富村至将军山一线，掩护了守备区司令部及战区军官干训团向仁化恩竹村安全转移。

占领乐城之敌，为了企图直窜仁化、南雄，截断韶关战区和省府各机关向三南、东江撤退的交通要道，1945年1月23日晨，以300余人向富村挺进，200多人向将军山沿公路挺进，均被我守军堵击。在富村方面，与保安第三营激战至当日下午三时，迫敌向楼下村方向移动；沿将军山西侧公路一股，与詹宝光自卫大队接触，詹部就溃不成军，这时投入预备队由孤儿院学生军组成的第五中队及迫击炮中队支援上去，才稳住阵地。迫击炮开始轰击敌阵。这些小伙子，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如生龙活虎，英勇无比。迫击炮命中富村和将军山西侧敌阵地，把敌人打得如鸡飞狗散。因敌人只有掷弹筒，很怕炮击，所以始终无法超越我雷池一步。至黄昏，全线之敌只得向楼下村靠拢。

我当时对敌情的判断：认为敌人马不停蹄地轻装（不附炮兵）挺进，是敌特种兵企图窜仁化、南雄截断我战区、省府的退路，或追踪乱窜，扰乱我后方的治安。今天被学生军和保安官兵堵击不前，夜幕又不归乐城，而今天全线集合楼下村，似有待援（炮兵或其他兵力）模样，明（24）日再行蠢动；楼下是通仁化的商旅道路，等待援兵一到，必向仁化逃窜。我的意图是以保安第三营与楼下之敌对峙备战，敌袭时极力抵抗，不得已时向白石岭隘口且战且退，确保隘

口。我率领学生第五中队、迫击炮中队、独保第八中队、指挥所特务排，于23日星夜潜移，向黄塘以东楼下西南之隘口前进，占领隘口两侧高地，堵击当面之敌向仁化逃窜。

1945年1月24日晨8时左右，楼下之敌得援后，约600余人，由楼下向仁化方向行动，首先用炮击，接着步兵沿商旅小道前进。我保安第三营迎头痛击，且战且退向白石岭背进，迷惑敌人。待枪声沉寂，敌军便放胆向隘口山坳小路窜进，如入无人之境。等至约300公尺距离，我学生军再忍不住了，迫击炮、轻机关枪（9挺）同时吐出火舌，战斗异常激烈。这一场战斗，学生军负伤5名，阵亡2名。后以我军迟滞敌人挺进仁化、南雄之目的已达，相机撤离隘口阵地，转移白石岭集结。

当我军于24日11时半撤出隘口阵地时，敌方才敢放胆向仁化城逃窜。此役，计敌人死伤约30多名。

围将军山

日寇虽然占据了乐昌县城，但城北背武江，江北是崇山峻岭，人村稀少，抢掠无物；东乡有第九战区部队活动控制；西南为我守备区据守，敌人有如困守孤城。我军在火车站一些地区的活动也威胁着敌人的安全以及南北铁路、公路的交通和运输。城内之敌，只有集结些力量，向廊田我方地区施加压力，以解其日夜的顾虑。

1945年3月3日晨7时左右，敌分为两路，一路约200余人，由乐城出富村，被我保安第三营堵击，无法前进一步。一路约300余人，沿将军山两侧公路向廊田指挥所地区突进，我独保第八中队且战且退，在田螺岭以东对峙至11时许，敌按惯例“早出、午餐、午后归”的规律，战斗无法进

展。我军利用这些有利间隙，派出学生第五中队（欠一排）由麻田右侧向敌左侧背迂回，同时在麻田圩北前沿我迫击炮中队观测所发现了富村敌人密集目标，四门炮集中连续向目标轰击，保安第三营乘机进击，遂将敌人压倒于将军山西侧山麓。这时迫击炮又转向炮击田螺岭东北正面之敌，共击毙敌指挥官多人（战后，据我军统计部门调查证实，其中击毙日寇大队长一名）。此时敌开始崩溃，狼狈回窜，我军由麻田圩追击穷敌一直至将军山，并连续炮击，激战至17时左右，敌乘夜幕来临之机，由山北偷偷摸摸地逃返乐城，我军占领了将军山。这次缴获137生的高射机关枪子弹6箱。敌人死伤30余人，我军阵亡士兵3名，学生1名，伤士兵4名，学生2名。受到战区和省府传令嘉奖。

截击滇江航运

1945年6月间，麻田指挥所因麻田无战事，原籍人马调仁化县夏富指挥所，向南雄、韶关方向之敌警戒。

日寇自占领韶关、南雄以后，即用湘江作为内河交通运输，日夜不停。

我军为了截击敌人航运，于19日开赴预定的地点埋伏。10时左右，约有敌船10余艘，由江顺流而下，距离设伏阵地上游1000余公尺河面上浩荡而来。待敌船离我阵地500公尺，我们重机关枪先打响了，接着迫击炮、轻机关枪、步枪，一齐开火，敌人措手不及，被我击沉了3艘，余者拼命疏开向南岸靠去。顺流飘至我阵地下游河湾，我以重、轻机关枪掩护，选出5名会泅水者持手枪、手榴弹向敌船接近，将其推至岸边。船中仅存两人，舵手已被击毙，余者已投水不知去向。俘虏两人均是敌军曹，其中一人是朝鲜人，懂些中

文，与其笔谈，始悉其厌战情绪，不愿抵抗，祈求保全生命回国去与家人团聚。

此役除俘虏敌军曹两人外，敌死伤约20余人，缴获步枪4支，手枪2支，木船1艘，击沉木船3艘。再次荣获战区和省府传令嘉奖，还发给奖金国币3万元。

援救盟军飞行员

1945年7月24日上午，我矮寨前哨警戒哨兵发现韶关市牛头潭上空飘流一个不明的东西，用望远镜观察，认定是空降人员。但不论是敌方、我方，争夺到手对自己都有利。于是，立即率领学生军第五中队轻装快步向空降方向挺进。13时许，先头尖兵发现河边广东有敌踪行动，我军急调独保第八中队、学生迫击炮中队支援。占据了高地，与来敌70多人展开战斗。敌因无援，纷纷夺路逃窜。时近黄昏，我组织5个搜索班向空降人员方向搜寻。后据当地农民说：空降者是一个“红毛人”，已由保长送交矮寨驻军。后由指挥所秘书罗荣坤任翻译，盟军飞行员始从其空恤夹缝中取出一张白丝布印有中、英文的证明文件出来，是美国志愿空军陈纳德飞虎队的战斗机飞行员（忘记名字）。据称：系当天（24日）早上自湖南芷江机场起航，掩护轰炸机编队出航东、南海域，轰炸敌海上交通运输船及城市，返航时因机件失灵，被迫跳伞空降。今天蒙得贵国军民竭力援救，深表感谢！

次（25）日护送上仁化守备司令部，司令林廷华传谕全城军、政、民等燃放炮竹迎接，盛况空前，并派员护送上江西三南战区。我部再次荣获战区、省府传令嘉奖，以后又荣获军委会的电奖，还荣获政府发给三等抗战勋章一枚。

（作者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回忆拦截日军运输船队的战斗

李世恩

1945年农历十二月中旬，进犯曲江周田的日军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的暴行，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恨。此时，当地开明人士何年荣（一名何老四，于1985年9月在香港得病回家，于11月医治无效病故）出于民族义愤，在群众的支持下，成立了曲江县大田乡抗日自卫大队。群众推举他为自卫大队长。人数有四、五十人（其中包括余阳生等二十多名原国民党未撤走的官兵），拥有步枪一批，轻机6挺。

1945年春节前夕，共产党领导的始兴抗日游击队一一风度大队获悉日军即将撤离南雄，有一批从国民党军队里掠夺来的军用物资，要用105只船装载由水路运往韶关。为了截获这批物资，风度大队派人到新庄水、周田两地联络当地的自卫大队，准备一起行动，截击运输船队。一支南撤的日军和由日军一个中队押送的运输船队（实为38只船），狡猾地提前在年初四，同时在南雄分水、陆两路向韶关方向出发。日军98只船在年初五天还未亮就已经过了新庄水。因发现船队为时已晚，加上天色漆黑追击困难，船队顺江而下。第二天拂晓，当船队进入丽水江口下侧时，我派在窑坪角警戒的岗哨观察了情况，马上将敌情通知自卫队和鹅公龙各村群众。自卫队员何智梅、何信松、谢德攸、何世桂、何世荣等已先后隐蔽河岸，注视敌情。从远望去，在建峰滩渡头有5条木船并列摆开行在前头。这5条船驶到麻坑口上首，便能

清晰地看到船桅上挂着的太阳旗，船头上坐着持枪的日军。第三号船还架着一挺轻机枪，随后两只船并行，跟着后面的便是载满物资的驳船。各船行驶都有一定的距离。这时，从雀沿寨脚至窑坪角河段，沿河约七、八里长，全是日军运输船队，缓缓沿江而下。

当船队前锋进入崩岗坑时，何智梅、谢德攸首先向船头日军开枪射击，一个鬼子应声栽入水中。接着，何家隆、何信松等一齐开火。这时，第三号船便急靠窑坪角，企图将机枪托上河岸顽抗，怎料拍的一声枪响，击伤了机枪手，紧接机枪副手抢回机枪躲入船仓，进行顽抗，随之下急了滩，往源鱼赞溜去了。枪声卜卜，弹雨纷飞，接着，邻近几乡赶来的数百群众，一片冲杀呐喊，纷纷拿着武器赶来助威参战。此时，大田乡抗日自卫大队长何年荣率领自卫队员，带着两挺轻机枪，迅速占领了建峰寺山顶。跟着李德福、李国章带着一个机枪组也登上了猪屎冲制高点，日军拼命在船内向河岸扫射。这时李国能、李世星、李世恩、李世金等，已从杉树坪经老鼠垄登上了风讯嘴制高点，迎击敌人。日军也匆忙在船头架起机枪进行抵抗，并疯狂地向沿岸群众扫射。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我方能有效地利用各种地形作物体掩护，射击主动，使敌人极难捕捉目标。特别是鬼子称为“网枪”的台枪，连续发射了几轮火，发挥威力，很快就有几个鬼子被击毙掉进河里，日军一机枪手也一命呜呼。紧接着大家又一轮排头火射击，打得鬼子晕头转向，呱呱乱叫；有一只船向杉皮寮方向驶去，企图登岸掩护其它船南下。此时，何老四调派一挺机枪从猪头皮经水浸灯向老鼠垄登上风讯嘴制高点，配合风讯嘴的李国能，李世星等猛烈向鬼子射击，运输船队便被打得阵脚大乱，七零八落。沿江上下岸边，到处都响

起群众的喊杀声，鬼子深知相持下去，必将吃亏。有十多个鬼子带上一挺机枪又跳下水中，拼命地往高坪尾登陆，企图占领制高点掩护船队突围。何老四识破鬼子的阴谋，指挥着自卫队员，机枪、步枪、粉枪、土炮一齐开火，冲上沙坝的14个鬼子被击毙，剩下的象乌龟一样缩进船仓，继续顽抗。

战斗进行了两三个小时。船只横七竖八地顺水漂流着。有一条在上渡坑口下首（建峰寺岭脚）河边搁浅的船，被我截获，拉到欧家洞渡头。缴获物资有：敌人军用地图、日军日记本各一件，机枪一挺和手榴弹、布匹、大米、竹纸、黄烟叶等一大批物资。

上午十点多钟，日军增援的骑兵赶到，很快登上岭头和火冲尾制高点，被毙在沙坝上的尸体被抢走了。接着，在周田福音堂门口架起钢炮向对河窑斗边和白冲岭群众炮击，有两棵象谷箩大的松树被炸断，李国均、李国家等也被炸伤。此时，船上的鬼子看见增援救兵来到，顿时嚣张起来。何老四为着减少伤亡，指派何礼兴扛着缴获的机枪和一些年纪较大的徒手群众撤往打锣寨；年青力壮的，留下来阻击敌人，并诱敌进山。接着日军援兵渡河追来，当入到芋仔冲，望到群山起伏，山沟越来越窄，才知道中计，只好狼狈地潜逃。在这场战斗中，我方何世荣等三人不幸牺牲。何家隆、何家其、李国均、李国家等近十人受伤。

截击日军船队获得胜利后，大田乡抗日自卫大队长何年荣指派李国章、叶××将战场活擒的一名日军押到仁化县某部挺进队司令林廷华汇报战果，当时曾受到林司令的表扬和赠送了几箱“七九”子弹，以资奖励。

（本文作者，原系曲江采茶剧团编剧，已退休。）

抗战时期韶关市征兵情况忆述

张镇蛟

广州沦陷，我省军政机关和学校、工商等行业，纷纷北迁，韶关人口骤增。由于形势的发展，在1943年之前，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便批准成立“韶关市政筹备处”；同年10月，正式成立了“韶关市政府”。朱瑞元、肖冠英先后出任筹备处主任和市长。1944年10月，日寇急于打通粤汉路，韶关成了日寇进攻的目标，被迫疏散人口，市况萧条，于是又裁撤该市，复归曲江县管辖。

现将当年韶关市国民兵团的组织及其征兵的概况，作一简略的忆述。

1940至1941这两年间，我省各县的征兵工作，是由各县政府的兵役科办理的，在领导系统上归省府民政厅和中央内政部。兵役科长的任用、俸酬俱属县政府。对未征入营当兵以前，名为“国民兵”的壮丁的管理、编组（地区及年次编组）和训练，则属县国民兵团部范围，其系统属省方面的师、军管区司令部和中央的军政部。征兵的对象，既然名为“国民兵”，所以县政府的兵役科长都兼任该县国民兵团部两个团附中的一个，以利征兵工作。到1943年前（准确日期忘记），兵役科改为军事科，科长改由县国民兵团部的副团长兼任，人事、俸酬也改归该部。

该市征兵年额约千名，征送入营时，首先办妥该年度应免（缓）征召的壮丁的申请手续，由壮丁本人连同有关证件

报缴乡、保队汇转该部初审，把认为合格的转呈南韶师管区再决定后，随将免（缓）役证明书发该部转壮丁本人具领，收回证费，用作优待征属，然后举行应征壮丁入营先后次序的抽签（由乡、保队到该部代抽，以利监督，防止舞弊。抽后出榜公布壮丁中签姓名和签号，准许检举隐瞒漏抽等弊端）；最后待到收兵部队前来接收新兵时，即由该部通知乡、保，把应征壮丁直接送往入营当兵；之后，发给每名入营壮丁家属的安家费500元，但违法强迫入营者不发。

其实征兵方面的弊端颇多，被认为是发国难财的门路。但韶关市国民兵团的主要负责人，对征兵工作有几点与当时省内各地比较独特的地方，这也是本文认为值得忆述的主要部份，以供作史料参考。

一、假藉违反“兵役法”，强迫无辜壮丁入营当兵——1940年国民党为了应付的需要，公布实行“国民兵身份证”和“违反国民兵身份证治罪条例”，规定年满16至50岁的“国民兵”的壮丁，一律都要领用该证并遵守一切有关规定，倘有违犯，便按该“治罪条例”的规定，一律判处“强迫入营充当兵役”。

首先说明一下有关身份证的问题。该证有正副各一份，俱载明壮丁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面貌、特征、身长、箕斗等项。正证由壮丁所住的乡、保队部保管，如迁徙、或远离外出，而又超过有关规定时，要申请领回正证，当抵达目的地后，又把它交由当地乡、保队部保管，副证要壮丁随身携带，以便兵役机关随时检查，防止逃避兵役等问题。如在使用该证上违反规定，或证上所载壮丁情况，核与本人实际不符，或证上所填涂改模糊，均属违反条例规定，都要强迫当兵。

从上看来，要做好身份证的工作，首先应在填发该证时，便认真谨慎地从事工作，同时要对壮丁广为宣传，加强守法观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地方实际未能做到。例如，具有关键作用的填发该证的工作人员，不少对于本职工作不够重视，敷衍塞责，草率从事。有的则限于工作能力较低，连计算壮丁“身长”用的公尺都未曾见过，更不知道用民间惯用的尺折算公尺去量了。另外，当时用钱请人冒名顶替当兵的“猪仔兵”到处司空见惯，谁也想象不到身份证的问题，竟致罚判当兵。

当时韶关市外来人口甚多，流动性大，壮丁中签后，往往潜移他徙，逃避兵役。另外又因战时省会所在，机关林立，该部以本身单位小，对于当时各地中签后，往往以钱请人“冒名顶替”应征入营当兵这件事，不敢效尤，故有时遇到紧急需要壮丁入营当兵时，便发动各乡、保队组织巡逻，设立哨所，到处检查壮丁的“国民兵身份证”，发觉有违法的，便即拘回该部，再次审问查明，确属违法之后，便即遵照该“治罪条例”的规定，判处该壮丁“强迫入营，充当兵役”，借以缴交应送征兵。总计此类人数，约占该部应交征兵总额不少，这对韶关立征壮丁相对地减少了。又因强迫入营当兵，按章不发安家费，这样，该部（科）不仅能够如期完成征兵任务，还可将节省不少的安家费用，拿到私人荷包里去而又逃避了贪赃枉法之罪名。

强迫当兵这件事说明，尽管国民党反动派标榜他们的兵役法规、政策和制度，都是根据所谓“三平原则”（平等、平均、平允）来制订，但事实上，“三平原则”是骗人的空话。流血牺牲，甚至弄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去抵抗日寇侵略，保卫国家民族安全、独立的，绝大多数是贫苦无告的

老百姓，他们才是真正保卫国家民族独立生存的力量。

二、筹发壮丁入营安家费——那时“优待出征军人及其家属”这类的口号喊得很响亮，但优待用的钱和物从何而来？却没有下文，结果只能成为“画饼充饥”空喊一阵。虽然壮丁申请免（缓）役及其后来核准领取证明时所收的费用，规定作为此类优待之用，但为数甚微，办不出什么来。该部副团长廖道德有鉴于此，曾设法解决，函请国民党市党部、商会、参议会等机关团体开会讨论，筹发壮丁入营安家费，结果决议：对每年壮丁申请免（缓）役及其后来批准后，都在其国民兵身份证上盖戳证明，收回手续费用，作为发给应征壮丁入营家属的安家费，每名500元，但对强迫入营当兵的则不予发给。议决通过后，呈上级备案，结果能够认真执行的，未有所闻。

三、徇情包庇，公然违反兵役法——现举下列两例：

1. 在中学念书的役龄学生，本无缓役规定，但当时社会上一般人几乎都错认为凡学生就毋须服役当兵。其实，即使是在读的大学生，按规定，也得要在距离毕业日期不足一（二）年（确数忘记）的，才准缓役。但该副团长对市内仲元等中学的役龄学生的缓役申请，却授意承办人员无须按章办事，并特意拖延。至该年度征兵差不多过尽，乃行转报上级（南韶师管区）复核，及至不准，发还申请时，该年度的征兵已过，缓役无形获准了。到了翌年，又如法泡制，结果，本来不该缓役的学生，也就实得缓役待遇，无须抽签应征当兵。
2. 违法释放应判强迫入营当兵的学生。该部先后查获设在坪石中山大学的“违反国民兵身份证治罪条例”，应判强迫入营，充当兵役的学生人数，假如他们被其他县市查获，不当兵就要破财。此事后被曾负责该校工作的韶关市长兼团长的肖冠英得知，亲自批准释放了。

抗战时期粤秀中学学校生活

单昌辉

1940年春，战时省府所在地的韶关曾一度失守，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及其附中，从乳源县侯公渡迁至连县的东陂镇。学院附中校址初设在该镇的塘头坪村，1941年秋，文理学院迁往乳源县桂头区后，附中迁至学院旧址江夏村，改名广东省立粤秀中学。

我是1940年秋考入粤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当时高一一级有三个班，我在甲班。所有课室和学生宿舍，全是竹篁围成，杉树皮盖顶。校本部设在黄氏宗祠，村前的大榕树下的地坪，便成了学校进行各种活动、集会的场所。许多老师和学生租住附近农民的房屋。

当时，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的两个儿子亦在粤秀中学读书。大的名叫李煥，和我同在一班，小的名叫李炳，读初中三年级。当时的李煥，看上去显得瘦削、斯文，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打扮，和大家一样穿着普普通通的蓝色中山装。兄弟俩同样在学校饭堂里开饭，与同学们一起吃小碟子菜、吃红米饭（磨去谷壳的粗米，叫九二米煮成的饭），没有“公子哥儿”的气味，生活简朴。

我们高一甲班的班主任是崔增达（法国留学生）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负责英语教学，平时总是穿着黑色的布衫，脚踏草鞋，须发很长，往往两三个月才修剪一次。他对课文背得很熟，上课极少看课本，而对课本的讲解却很透

彻。记得他给我们讲高一英语《最后一课》时，讲得很动感情，话语之间流露出他在忧心着危难中的祖国。1942年崔老师的儿子被征兵入伍，儿媳神经失常，发疯了，生活十分艰苦，崔老师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坚持教学。全校师生给他以热情的援助，纷纷捐钱捐物为他解决家中的困难。

教我们数学的是曾如阜老师（现任华师大数学系教授），对数学教学，深入浅出，讲解得很好。本来许多对数学不感兴趣的同学，都由于他循循善诱，条理分明的教学，大开心窍，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他上课时，经常不用尺规，在黑板上随手画出很准的直线、圆等各种几何图形。每天收回的数学作业，总是批改到深夜，赶在第二天发回给我们。平时，他还经常向同学们介绍一些课本外的数学知识。记得有一回，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给同学们讲演“逻辑数学”，听者十分多，把竹筴课室挤破了，课室外还站着许多人。还有一次，他给我们介绍德国的几何“扩大缩小法”。

教我们语文、历史的老师，如黄庆云、梁汉生、虞泽甫、易唯志等，都与同学们相处得十分亲切融洽，师生间的感情十分深厚。他们不仅教好课本上的知识，还利用大量时间和精力鼓励我们组织“读书会”，不定期的给予辅导，对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研究。读书会里常常是座无虚席，总是挤得满满的一屋人。

抗战期间的学生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除勤奋学习之外，课余活动也是很活跃的。我们组织有歌咏队、话剧团、球队等。此外，有不少同学喜欢到农村、瑶寨找农民交朋友，作调查研究。附近农村，每天晚上都有同学去给农民上夜课。有些同学，还利用节假日，到远离学校百里以外的连南瑶寨，了解瑶民的习俗和社会实况。

为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鼓励广大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支援前线，我们的歌咏队、话剧团，多次到连州镇演出。当时的条件很差，相当艰苦，所有的道具用品，全靠同学们用肩挑着去，徒步翻越界山，走八十多华里。演出队里有不少靠侨汇维持学习、生活的同学，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断绝，十分穷困，他们多数是脚穿木屐去连州的。那时物资缺乏，能穿上皮鞋的人是极少数。

我们在连州演出，都很吸引观众。无论是内容、演技，还是灯光、布景、道具、效果等都很讲究。一连几个晚上在东较场戏台演出，整个广场都挤满了人。我们除演出一些独幕话剧如《军用列车》等外，大多是大型的剧目，如《黄河大合唱》、《凤凰城》、《风雪夜归人》、《雷雨》等。观众们被我们认真的表演所感动。演到悲处时，泣声一片；演到欢快时，欢声不绝。

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同学们跟随着学校四处搬迁，正如校歌歌词那样：“走遍了险阻，历尽了艰辛，却淬砺了奋斗精神”。同学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培养了集体主义的精神和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良好作风。当时失去侨汇生活困难的学生，虽然省府拨有少量救济款，但仍不能维持生活，同学们便给予大力支援。如家在翁源县的陈志方、张肇周和广宁县的陈柏桐等同学，就常将家中要来的钱，买些米与穷困的同学一起煮粥吃。

我们的宿舍，全是竹篾扎成，一行行紧密排列着。宿舍的“门”，只有出入的作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已成风气，不存在安全与不安全的问题，宿舍根本不上锁，各自的行李搁在床位上就可以了。当时没有电灯，每个同学都备有一盏小油灯、一瓶火水油与一盒火柴。虽然房子是竹篾加杉

皮盖的，风高物燥，很容易造成火灾。但一千多位师生却很自觉遵守纪律，时时约束自己，因此，从没发生过一次火灾，全体同学都能平安地进行学习和生活。

粤秀中学的师生，在抗战的艰苦环境里，为“探求真理之光”、“广播文化食粮”、“那怕魔高十丈、恶战千场”。那种团结战斗、勤奋守纪的优良校风，很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去思慕的。

（作者是韶关市水泥制品厂离休干部）

回忆团结瑶胞共同战斗的往事

肖怀义

宣传抗日救国 听取瑶王“告状”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广东国民党省政府搬迁到连县三江镇（今连南瑶族自治县首府）。随后，国民党省长吴铁城也来到连州城，拨了一笔专款给连县县政府，作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经费。当时，中共地下党连阳特支组织委员兼连县中心支部书记杨克毅，通过国民党县长何春帆的亲信，城关区区长莫家励（他是杨克毅留日时期的同学，又是我在连州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的关系，组织了四个“连县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我被委派为东陂区队的队长。安排到该队工作的，还有中共连阳特支宣传委员兼阳山县党支部书记陈哲平（现名陈枫，是我国驻外大使）和地下党员罗鹭（即罗耘夫，现任广东省农科院副院长），以及青年小学教师潘贤修、胡宜波，连县中学的学生萧少麟、关照禧等十七、八名队员。

约十一月初，宣传队来到我的故乡湖江头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形式多样，如演出话剧、办夜校等。一天，我和陈枫带领萧少麟那个小组的十来个人到云雾洞（三水民族乡政府所在地。它是进入三水瑶山的三岔路口，是瑶胞下山来这里做小买卖的街市）。在云雾洞小学校召开民众抗日救国宣传大会，陈家岭“瑶王”赵土金，会同右里山的酋长郑进发、挂榜山的私塾秀才程贤才（瑶族人）等也参加了大会。

我们宣传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汉族和瑶族都是一家人，要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道理。大家听了，觉得亲切有理，一致鼓掌拥护。

会后，我们从云雾洞小学教师黄时升那里知道，有个做木屐的黄亚科师傅，原来是个红军战士。后来红军路过湖南某山区与白军作战时，他受了枪伤，上级就把他托付给一家瑶胞养伤。痊愈后，被招了亲（入赘）。前两年因岳父去世不久，其妻也不幸病逝，亚科便携老岳母回到这里以做木屐为生，不再续娶。大家都称赞亚科是个汉瑶一家的孝子。他对粤湘边境的瑶山很熟悉。当时，亚科会同瑶山的几个头人来求见。我和陈枫听了黄老师介绍，就将客人请进屋里。瑶王赵土金一开口就向我们诉苦：

我们这里的乡长实在霸道，不顾瑶族人口少、壮丁稀的苦处，每年硬要给瑶山摊派三、五名壮丁，要是无人去当兵，就得出钱出谷（稻谷）交给乡公所买人去顶替，逼得小伙子们纷纷逃到湖南那边的瑶山去了，害得独生女要招亲也找不到男人。

郑进发也气愤地说：“那个姓胡的乡长简直是个吃人肉、喝人血的恶魔。去年夏天，他带领三个爪牙来到我们右里山，吃了我们的酒肉还不领情，竟借口拉征兵，侮辱良家妇女，逼得我们的后生（青年瑶胞）拿起刀枪，才把这群‘野仔’赶下山去！”

他们越说越激愤，黄亚科和陈贤才先生异口同声，请求我们宣传队二位队长为山里人主持公道，为民做主。我们听了几位头人的“告状”后，就向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事后查明那个姓胡的乡长原是个恶棍出身的地痞。

月底，我们宣传队回到东陂镇总结工作时，我先向区长

关以忠汇报了那个胡乡长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民愤极大的情况。关以忠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下令把恶棍胡乡长撤职查办（事后据说他一听到风声就星夜逃跑了），瑶山人心大快！

接受派遣 回乡开辟新区

1938年底，抗日救亡宣传队宣布解散。我接受中共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去从事开辟新区的工作。

1939年初，邓炎汉（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国民党县政府保安区区长。我遵照杨克毅的布置，利用邓炎汉与关以忠同僚关系，乘我家乡的乡长空缺之机，由邓出面把我推荐料能成事，我们便邀关以忠在连州镇趣园酒家聚谈，关果然高兴地到县政府去活动，请准委任我为湖柯乡乡长，兼任湖柯乡乡立第一小学校长。与此同时，我的老朋友东陂西溪高等小学校长黄继忠，也接受我的介绍聘请罗鹭为该校教师。

春节后，我和罗鹭一起回到东陂地区从事秘密活动。经过几个月的考查和培养，发展了丰阳乡立小学校长潘贤修、湖柯乡公所助理员吴循行、湖柯乡公所冬防队长黄标和副队长萧传贤，连县巡回小学校长吴文湘等一批新党员。同年秋天，成立中共东陂区地下党支部，罗鹭任支书，萧怀义、潘贤修为支委。

为了团结山区人才，争取瑶族首领的合作，委任了云雾洞小学教师黄时升为我的副乡长，委派云雾洞的木屐师傅黄亚科为民众抗日自卫队中队长，委任陈家岭“瑶王”为第八保保长。右里山酋长郑进发为副保长。与此同时，对地霸分子控制的保公所人员，也予以撤换。

为瑶胞办好事 与“瑶王”结义

1939年7月，中共连阳工委成立后，工委书记徐沂挂上小学教师的职业做掩护，来到湖柯乡，和我研究如何开辟三水瑶山为抗日据点这个问题。确定先从为瑶民办好事入手，然后相机做好团结瑶族上层人物的工作。

经过一番筹划，我们利用国民党征兵法中有关边远少数民族可以缓征的条文，通过乡政会议决定，上报县政府批准，给予三水瑶族缓征（实际上是免征）。从此，解除了压在瑶胞身上的受征兵盘剥之苦。

国民党县政府对乡公所的经费来源，规定从户口自治捐征收的。过去那些恶棍乡长，不管贫富都以户口为单位来征收，平民百姓叫它为“人头税”。为了减免穷苦人家的“人头税”，我们改为按各户占有田地多少来划分征收等级。规定一亩以下的免收，有二亩地以上的收五分，五亩地以上的收一角，十亩地以上的收二角，照此类推。

由于采取上述措施，贫苦农民得到了实惠。特别是瑶胞解除了抽壮丁的痛苦，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对我们更信任了。

大年初二上午，酋长郑进发一早就来到我家拜年，递上请春客的帖子，原来是挂榜山老瑶王程蕪保请我上山做客。我想：这是我团结瑶族上层人物开辟瑶山新区的机会，于是，我就欣然应邀赴会了。席间，老瑶王在祝酒时说：“萧乡长看得起瑶族，是帮助我们留下人种（指免除瑶胞征兵一事）的恩人，他和我们瑶族兄弟是一条心的。”接着，陈家岭瑶王赵土金说了不少感恩戴德的话，最后他提议道：“我们各个山寨的头人，都说要报答恩人，趁新春大吉日，就同

萧乡长结为拜把兄弟，作为我们瑶族的首领来敬重。”

赵土金的提议得到在座的热烈响应，在我回敬喜酒时，应诺了三位瑶王的盛情厚意，当晚我就和程燕保、赵土金、郑进发、程贤才五人按照当地汉瑶民间习俗，饮过鸡公血酒，盟誓为拜把兄弟。从此，我和他们都以结义兄弟之礼相待了。

秘密组织武装斗争 瑶王大力支持

1940年4月，中共连阳工委改为连阳中心县委，我被委任为东陂区委书记。我曾经下到连州镇向中心县委书记张江明（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汇报工作，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周锦照（现任广州市侨委、政协委员）向我讲述了中共党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随后周锦照就乔装卖洋杂的小商贩，巧妙地收藏一批秘密文件和书刊，诸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斯诺的《西行漫记》等等。这时，恰好大龙山（粤桂边境的一座有名的大山）土匪头子陈志松带领一帮人马向东陂小龙山进逼，震动了全县。国民党县政府责令东陂区长关以忠克日组织区乡自卫队伍，配合国民党军警剿匪。关某要我乡建立一支30多人的自卫小队，参加打土匪。所有经费都由区公所支付。我和周锦照认为这是好机会，可以打着国民党自卫队的招牌，建立我们秘密的农民武装。于是我们就指派中共地下党员（军事干部）黄标任自卫队小队长，萧传贤为副队长，负责组织 and 领导这支农民武装。当时，三水瑶王选送青年瑶胞盘长福、盘福生、程长发等人，以及原云雾洞民众抗日自卫队

长黄亚科也选送放排工人黄蓝盛、贫民吴玉住、范亚钦等人参加，经过几个月的实战锻炼和培养，还发展了瑶胞盘长福和贫农吴玉住等新党员。同年初秋，陈志松这帮土匪退回大龙山那边去，人们就公开说是“剿匪胜利了”。东陂区的自卫大队就分散回各自家乡驻守。我们就以维护粤湘边境人民贸易来往的交通要道的治安为理由，把自卫小队缩编为乡公所常备自卫班，派到云雾洞、沙坪街驻守，利用护送商旅的机会，熟悉连（县）蓝（山）边境瑶山地理，并同瑶族人民做些好事，交上朋友。

与此同时，派盘长福回三水瑶山会同程长发、盘福生等组织一个不脱产的民众抗日自卫小队作为农民秘密武装的一部分。

为了在山区发展组织，黄亚科、盘长福、范亚钦组成一个地下党小组，由黄亚科为组长。一天，黄亚科到黄洞山做争取土匪的工作时，不幸被瑶族山霸赵福生的爪牙杀害了。

1942年冬，我按照特派员钟远扬（即钟达明，现任广东省交通厅公路局局长，已离休）撤退前夕对我的叮嘱：“你的面目已经红了。要时刻防止敌特的跟踪和陷害，随时准备好撤离……”此后，我就转回老家，组织武装自卫力量，布置撤退后的工作。

同年12月底的一个夜晚，中共区委在我的家乡开会，不料遭到国民党军警的突然袭击。我带领地下党员萧传贤、吴文华、吴年等八人，突破敌人的围捕上山打游击了（突围战斗中我额上受了轻伤）。我便住在宋合乡大风洞郭石荣大哥家养伤，瑶王赵土金经常派盘长福给我送来刀伤草药和报告敌情。1943年初春，我接到中共党组织要我转移出去的通

知，随即开始行动。当我和萧传贤路过右里山住夜时，酋长郑进发说是沙坪街有敌人关卡的盘查，未能通过。翌晨他自告奋勇做向导，领我们从蓝山大麻营直线坪瑶山绕道去长铺萧禄才家里，使我们安全撤离家乡，转到英德。……在萧禄才的帮助下，开辟了一条从湖南蓝山到长沙、广州的秘密通路。

汉瑶一家 血肉相连

蒋介石撕毁1946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后，中共粤桂边区工委为加速边区武装斗争的步伐，1947年7月派遣肖少麟、黄孟沾回到连县组织武装起义，配合主力部队挺进连阳。肖少麟回到家乡后，就以三水瑶山为根据地，进行秘密活动。同年旧历12月初五，东陂武装起义了，当晚攻打夏滢乡公所和粮库后，转移到云雾洞、黄洞山休整，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扫荡”。接着国民党政府对起义军领导人亲属采取野蛮的报复行动，诸如拘捕肖少麟的父亲及肖的二个堂兄弟予以杀害，把连中校长肖怀德作为“投靠共匪作乱”的“要犯”给以“悬红通缉”，并拘捕肖校长的妻子胡宜波（连中教师）投入黑牢，勒令瑶王赵土金下山“自首”，遭到拒绝后，则悬红500担稻谷予以通缉。

肖怀德校长为了避开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通缉，转移到右里山隐蔽。一天，又遇到国民党军警搜山抄家，一名国民党军官强行闯进郑进发酋长家门，手持短剑，凶相毕露迫向郑酋长面前，喝问“你这个瑶佬，知道共匪到何处去了？”郑酋长只回答一句：“不晓得。”这个国民党军官立即转过身来，把短剑插回剑鞘，然后一把揪住郑酋长的女儿，杀猪般地问：“共匪来你家吃过饭吗？”这位年仅18岁的瑶家少

女，怒目圆睁，不答半句话，敌人气急败坏，凶性大发，竟当场将这位倔强的瑶族好女儿枪杀了。

其实，从1934年红五军团进入连（县）蓝（山）江（华）一带瑶区活动以来，汉、瑶人民的血就流淌在一起！

为了说明“汉瑶一家，血肉相连”，这里我随手再摘下几点汉、瑶共同战斗的事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935年，红五军在连、蓝、江瑶区活动时，由于战斗频繁，一些失散了的伤病员和战士，都得到了瑶区兄弟的治疗和收养，有些后来在瑶山落户了。上文提到的黄亚科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8年8月下旬，由周明、冯光率领的中共连江支队主力回到三水瑶山活动时，冯光和我就应邀与瑶族首领赵理王、郑进发、程贤才插血为盟，结为拜把兄弟。

瑶区限于自然条件关系，粮食历来都是不富裕的，但是当部队缺乏粮食时，瑶胞总是把仅有的一些大米自动捐献给部队，自己只靠食番薯、芋头等杂粮度日。连支政委周明在总结战斗胜利原因时，首先就肯定“部队在这里作战最大的困难是粮食供给。可是贫困的瑶胞宁愿自己吃番薯、芋头、杂粮、野菜，却毫不吝惜地把家中仅有的大米捐献给部队，保证了部队吃得饱，吃得好，瑶族人民上下帮助部队打胜仗是立下很大功劳的。”

瑶王赵土金，把瑶山的十多支步枪拿出来，组织了一支三水瑶民武工队。

国民党“剿匪”指挥所以封山并村来“困死”我们时，瑶王赵土金镇定地作出对策，他说：“我们瑶山这么大，是封不死的！我已经派人去连、蓝边境的深山密林里搭盖了新寨，如果‘牛骨’（当时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的贬称）上来

搜山，既找不见人影，也找不到粮食，这时我们就把它当作野猪来打，定会得胜。”后来事实证明，瑶王赵土金的话是对的。

附注：“瑶王”是当地汉人对瑶族首领的尊称，相当于汉人的“族长”。“三水瑶山”即现在连县三水瑶族乡。包括云雾洞、沙坪街和黄洞山。总人口有4300人。

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八种表现

爱国主义属于历史的范畴。各个时期的爱国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历史上，爱国主义要有以下八种表现：一、忠于祖国，不惜身殉；二、忧国忧民，锐意改革；三、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四、抗击外来侵略，保卫民族利益；五、反对民族压迫，奋起武装斗争；六、救国沦亡，念念不忘恢复；七、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八、热爱祖国山河，为改造自然进行探索。

——摘自1986年1月9日《南方日报》

金造保卫战

陈 泗

1948年7月，粤桂湘边纵主力飞雷队从广宁绕道清远，经英德黎洞、九龙金造、大湾，胜利挺进连阳。准备继续北挺的火箭队和北风团组成的第二梯队也整装待发。斗争形势在发展，为了将连江两岸的活动连成一片，迫切需要在九龙地区建立起一支自己的武装。

几年来，中共英西地下党组织在九龙地区对九龙乡长罗佛金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全国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下，1948年12月13日，罗佛金交出所有武器装备，率领全体武装人员在九龙举行起义（详见本辑《罗佛金与九龙起义》一文）。

九龙起义胜利后，部队以起义人员为主力改编为英清阳边区人民解放大队（代号叫太阳队）。由原九龙乡乡长罗佛金的儿子罗发任大队长。部队以金造为大本营，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

消息传来，国民党英德县长周文浩大为恐慌，他一方面频频向上告急，一方面亲自出马纠集地方反动武装，先后三次向金造村进行疯狂围剿。起义部队配合东风团，与当地民兵一道给敌人有力的反击，为保卫家乡金造立下了汗马功劳。

首战告捷

1949年2月13日，天刚蒙蒙亮，县长周文浩亲自出马督

战，由英德县保警大队长张隆率领保警 300 余人，加上黄花的梁猛熊以及英德自卫总队头子陈成英所率部队约 700 多人直奔金造而来。

他们先从牛岗栋登上直达枫木营前面的制高点——狮头顶，向金造村正面的庙岗岭进攻。当时岭上只有郭贤率领的八名民兵，他们利用山上的大石作掩护，与狮头顶的敌人对峙。其间，敌人发动的几次冲锋均被民兵击退。下午，驻守在连塘下村的太阳队，派小队长廖火率一机枪班上庙角岭增援。他们与民兵坚守阵地，利用熟悉的地形声东击西，袭扰敌人的阵地，与敌人周旋。战斗中，他们打死打伤敌人 20 余人，使敌人始终不能进村。

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各守阵地，不分胜负。午夜，局面有了转机，东风团从龙潭坑由牛岗栋侧面返回，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飞鹰队长周锡率队从右翼突击，力强队长陈三珠率队从左翼进攻。增援部队犹如天兵天将左右夹击，以密集的火力袭击敌人。一阵猛冲猛打，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招架，只得连滚带爬撤出阵地，逃回了县城。途中，他们洗劫了九龙墟。几十间商店和房屋被烧，真是一群惨无人道的亡命之徒。

这次战斗，击溃了敌军一个连，消灭了一个排；俘虏敌兵 5 名；缴获轻机一挺，步枪十余支，子弹装备一批。战斗以敌人失败而告终。

铁壁铜墙

第一次金造保卫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起义部队士气高涨。然而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果然不出所料，有情报说：火车运来了一千多名士兵，同时在英德火车

站卸下了一大批枪枝弹药。一场恶战迫在眉睫。

金造群众闻讯纷纷要求部队给敌人以狠狠打击，还派出代表向部队领导请战，表示“打不赢，打半仗也好”，“要死大家死在一起”。还说：“如果打的话，我们负责粮食。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猪杀猪，给部队吃了好过给敌人吃”。群众要求打的情绪十分强烈，战士们也磨拳擦掌。当上级迎战的决定传来，全民的备战行动便以金造为中心在各村寨开展起来了。

他们挖战壕、筑堡垒、削竹钉，仅两个晚上就削了十几万支竹钉，五天时间就在庙角岭挖了齐胸深的环村战壕和交通壕，并在战壕外布满了浸上毒液的竹钉。他们还利用有利地形在岭上用大松木外加草皮修了一个大碉堡，堡外是纵横交错的壕沟，壕沟外是木栅，木栅下面也布满了毒竹钉，使敌人无法接近。这样，庙角岭便筑成能攻能守，进退自如的防卸工事了。

其余的地方如苏坑、竹园子、独石寨、桐油坪、营下、新寨等村庄的阵地都分别筑有不同程度的防卸工事。各村寨民兵日夜巡逻，严阵以待。

2月18日拂晓，敌人果然以保四师七团、混以梁猛熊等地方武装一千余人的兵力再次向金造进行武装围剿。周文浩把指挥所设在西牛墟，由七团团长和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陈成英亲自督战指挥，他们从牛角栋沿山西进，直奔狮头顶阵地向金造正面的庙角岭阵地进攻。当时庙角岭只有两个班的兵力防守，他们利用坚固的防卸工事沉着应战。

战斗打响后，起义部队和东风团的部分兵力陆续前往庙角岭主阵地增援。惯用远炮射击的敌人一开始就连续向庙角岭发射了12枚炮弹，只有两发命中碉堡，但碉堡是大松树加

泥筑成，所以，只见尘土飞扬，碉堡安然完好。随后便是轻重机枪密集的火力扫射。一时间枪声大作，守卫部队避开敌人的火力优势，始终不发一枪，待敌人开始组织进攻，进入射程区时，便以密集的火力阻击，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

由于漫山遍野的竹钉给敌人的进攻造成一定程度的困难，无可奈何之下，敌人只得派人前来铲竹钉。小队长李火抓住有利时机，端起机枪狠狠地向敌人扫射，当场击毙敌人17名，伤10余名。顿时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

金造村的群众也积极参战，他们不顾危险到阵地抢救伤员，冒着炮火为庙角岭前沿阵地的子弟兵送弹药、送饭菜、送茶水。总之，缺什么就送什么。他们对部队寄予很大的期望。边纵政委梁嘉和东风团团团长欧新也亲自登上庙角岭视察战场。群众的支持，领导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起义部队战士们的斗志。在后方指挥部工作的战士也积极要求上前线参加战斗。当时除了金造主战场外，九龙附近各个村庄、各个独立山头到处都有枪声，各村民兵主动与庙角岭主阵地配合战斗，遥相呼应，形成人民战争。

由于多次交锋，敌人伤亡很大，在阵地前尸横遍野。于是，他们便打着白旗要求我方准予收尸。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上级同意敌人的要求，同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敌军展开攻心战。

部队派出会讲普通话的梁仁到前沿阵地向敌人表示同意他们的要求。开始他们打着白旗，三五人前来试探。在此情况下，战士们向敌人喊道：“我们讲人道主义，你们来收尸我们不开枪。”后来，敌人看我方真的不开枪，便放心地派人前来收尸。于是我方又借着机会向敌人宣传我军政策。梁仁用普通话对敌人喊道：“你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放下

武器受优待……”。敌人见我方说话算数，也认为我部队是解放军而不是土匪。双方停火近一小时。当敌人收尸完又向我方阵地进行密集射击时，这回的子弹很多是朝天上打的了。

当天下午，部队开始向狮头顶敌阵地发起反攻。那位曾经嘲笑敌炮弹是“盲佬炮”的炮手潘木，仅用两发炮弹就将敌人的重机枪打成了哑巴。这时，周锡带飞鹰队沿大芒窝方向经文笔山向敌阵地迂回包抄，威胁其退路。守卫在阵地的部队组织突击队前后夹击，向敌阵地发起反冲锋。起义部队的战士罗亚炳打得非常勇敢，当子弹打完后，仍捡起石头打敌人，直到牺牲。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防守在狮头顶的敌人基本被歼灭，周文浩、陈成英见大势已去，不敢恋战。他们甚至连做好的饭也未曾吃，杀好了的猪也来不及带，便慌忙率部狼狈而逃。

三 面 拒 敌

第二次围剿的惨重失败更加剧了敌人的疯狂反扑。他们调来了在淮海战场撤下的135师的一个配有美式装备的加强团（1947团），其下属的一个炮兵连就有八二炮和六〇炮数门。在135师师长的亲自率领下，配合英德、清远两县地方武装共3千多人气势汹汹地向金造扑来。

1949年3月5日早晨，敌人的人马尚未全部到齐，就迫不及待地向起义部队阵地发起全面进攻。他们以一个营的兵力攻打苏坑，以两个营的兵力向独石寨阵地进攻，以便从背后威胁金造。除了135师的加强团负责攻打金造的庙角岭阵地外，其余的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向金造形成包围之势。

庙角岭阵地是敌人的主攻点。它是金造的天然屏障，其

最高峰为海拔150多米，整座山往西延伸至敌驻地枫木营对面。135师加强团的主力也集结在这一带，他们以枫木营为大本营，在其后背山设炮兵阵地，利用炮火优势发起猛烈的进攻。

上午8时，战斗全面打响，震耳欲聋的炮声隆隆作响，长时间不断，数百发炮弹向我阵地飞来，硝烟笼罩着整个金造地区。光是庙角岭的周围就落下了100多发炮弹。

炮声过后，敌人即以轻重机枪密集的火力为掩护，组织兵力向我阵地进攻。守卫在庙角岭的战士仍以战壕为掩体，避开敌人的强火力点，待敌人靠近时，便集中兵力大量杀伤敌人。敌人的数次冲锋都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

守卫在苏坑阵地的民兵也打得很勇敢，他们利用石山、石洞等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阻击敌人，使其无法前进一步，只得以“盲炮”、乱枪胡乱放一通，但仍然无济于事。进攻独石寨之敌也同样遭到民兵有力阻击。

战斗到下午，部队组织突击队向敌军阵地制高点偷袭。突击队的行动由于过早被敌指挥所发觉而被迫撤回。敌人一面迅速以火力轰击庙角岭，企图截断突击队的退路。一面加强防御，并同时增加进攻庙角岭阵地的兵力。

晚上，敌人从太平头山摸上庙角岭北侧，企图袭击起义部队阵地，幸而被及时发觉并将偷袭之敌击退。为了加强后方的防御，防止敌人从背后进行袭击，部队领导便派兵从大芒窝抢占制高点。战斗直至深夜，腹背之敌已被击退。

战略转移

鉴于当时双方力量悬殊，估计敌人翌日会继续增兵，而起义部队兵力不足，弹药减少，不宜与敌人决战。部队领导

连夜召开会议，决定立即主动撤出战斗，作战略转移。

当晚，金造民兵群众在坚壁清野之后，便扶老携幼跟随部队撤离金造村，向黄基塘、亚婆髻方向转移。当时跟随部队转移的群众有近千人，然而撤退却很有秩序，甚至连孩子也不哭闹，群众认为这是天意，我们部队这样撤退“真是仁义之师”。

撤退在按计划进行，起义部队杨钜率领的机枪班作掩护，于下半夜方从庙角岭阵地最后撤出，并悄悄赶到撑高脚与大部队会合。天亮前，部队群众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突出了重围。

第二天上午九点，被打怕了的敌人仍不敢进村，经过一番炮火轰击试探之后，才战战兢兢地搜索着摸进金造村。敌人进村后，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前后三次的金造保卫战，不仅一直把大量的敌人吸引牵制在这一地区，并给予大量杀伤，掩护了大部队北上，而且在当地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罗发领导的九龙起义部队也在起义后的一系列战斗中，锻炼成长为一支坚强的、可以独立作战的部队。

（刘萍整理）

王国华起义前后情况的回忆

丘寿科、余学成、王月中

1949年5月，翁源县茶园乡自卫大队副大队长王国华率部起义，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震惊及其内部的分化瓦解，也有利于翁源人民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丘寿科同志和我们三人当时曾参与联系和组织这次起义，现仅将记忆所及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一、起义之前

王国华是翁源茶园河溪上镇村人，1935年考入上海宪兵学校，毕业后在南京宪兵部队服役，历任宪兵班长、排长。1939年退役回家，其时仍然是国共联合抗日之际，因此回乡后曾参加当地抗日组织，积极宣传抗日，在农村青少年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枪口对外》和《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后因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和腐败无能，因而情绪低沉、闲居在家，也曾一度以服务乡梓为宗旨，发动地方父老在家乡创办村小。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特别是1946—1947年间，亲闻亲见在共产党领导下，翁源人民的革命浪潮逐步高涨。在自己家乡茶园、松塘、岩庄等广大农村和山区已逐步变成了人民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势力，普遍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拥护。对此，王国华在思想上开始了新的震动并寄予很大的同情。但由于一时对共产党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政治上一度还

是采取保持沉默和不闻不问的态度。1948年初，国民党越是在临近末日的前夕，反动派越加进行垂死的挣扎。正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翁源县茶园乡长、代表地方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之一的包绍羲（此人临解放前也被迫投靠了人民），掌握了本乡自己大队的反动武装（实际仅共有50多人、枪），自任大队长，进行疯狂的反共活动，但以自己缺乏军事常识的原因，不得不拉拢、邀请王国华作为自己的副手（自卫大队副），藉以作为自己反共的打手。

这个打手究竟当还是不当？在接到包绍羲的邀聘之后，王国华内心矛盾很大。当嘛，害怕共产党说自己为反动派卖命，不当，又担心国民党给自己扣红帽子而掉脑袋。经过一段的反复的考虑和斗争，最终他还是决定找当地山区活动的共产党游击队商量。于是，他设法找到当时已参加北江一支队的弟弟王月中，要他向游击队转达自己的想法。经过联系，了解了王国华的意图后，部队领导（北一支三团第四大队）即派武工队长丘寿科（是王的熟人、好友）应约来到王国华家进行了具体磋商。

二、接受任务

根据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加强反蒋爱国统一战线的精神，1948年3月（日期已忘记）一天晚上，丘寿科按照上级指示，如约在王国华家与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这次长谈的内容主要是三点：（一）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具体帮助王国华认清当时的形势，认清国民党反动派已面临最后的末日；（二）鼓励王国华在不做有损人民、有损革命等坏事的条件下，应聘充当包绍羲的副手，但要尽快把这支队伍争取、掌握到自己的手上；（三）尽力协助游击队开

展活动。

王国华于谈话后，打消了疑虑，并愉快地接受了丘寿科代表游击队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并在他此后一年多的行动中（即在他正式起义之前），表现很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1）掩护营救了丘保祥、刘亚英、许崢等一批北一支游击队员，保证了游击队地下交通和武工队在辖区内的安全活动；（2）通过规定的联系人丘寿科，不断递送敌方的情报；（3）秘密为游击队输送了一批长短枪子弹。

三、光荣起义

根据游击队有关领导的布置，王国华接任这个副大队长以后，他在广泛交结朋友，积极争取团结部属的同时，还于1948年七、八月间，协助北一支游击队攻打了曾屋楼、钟屋楼和坝仔圩等国民党茶园乡公所及其自卫队的主要据点，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当时还很嚣张的气焰。

但是，王国华这一系列的行动，已逐步引起了地方反动势力的警觉。为此，是年冬，茶园乡长包绍羲以保障副大队长的安全为名，安插亲信担任王国华的卫士，藉以监视王的行动。

由于引起了敌人的逐步警觉和怀疑，因而一段期间，敌我双方气氛也逐步有点紧张起来，而王国华也曾一度有些慌乱。在此情况下，为了给敌人以一次更大的打击，北一支有关领导根据丘寿科汇报的情况进行分析之后，决定布置王国华部准备起义。

1949年3月（具体日期已忘记），北一支队委派三团第四大队队长许先觉在茶园乡竹园子村王光先家，主持召开一次组织王国华部准备起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一支三

团第四大队武工队长丘寿科、队员郑德人、丘志勇、陈兆永、冯培华、王月中，北一支地下工作人员包自典、余学成和茶园乡自卫队的王国华。这次会议由许先觉传达北一支有关领导同志的指示，布置和讨论了有关起义前应如何注意安全、保密等有关具体事宜，最后还决定两件事：（1）布置王国华回部积极准备起义，特别布置他回去后要立即认真细致做好该部各分队长和其他骨干的思想工作；（2）决定派武工队员王月中随王国华回部协助做好起义前的准备。

其后，到1949年5月上旬，根据王国华、王月中有关准备情况的汇报，北一支有关领导经研究分析后，认为起义条件已基本成熟，即派丘寿科为代表，于1949年5月8日在何溪镇再召开一次准备起义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包自典、余学成、钟石声、王月中、王国华等。会上决定了起义的日期、时间为1949年5月11日晚12时正，集结地点为径门口郑屋村（北一支三团第四大队活动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周密细致，一切十分顺利地按原计划进行。即于5月11日晚12时正，由王国华发布命令，全队立即起义，并携带全部武器弹药，由王国华率队，按指定地点顺利地到达郑屋村集结，起义人员受到北一支有关领导同志的欢迎。

王国华这次率领全队50多人全部起义，携带轻机枪一挺、短枪8支、步枪40多支和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进入游击区，他由此投向了人民，光荣地走上了革命的行列。

王国华率部起义引起了反动派内部极大的震惊，也加速了地方反动势力的分化瓦解。茶园乡长包绍羲处此穷途末日的时刻，由于翁源进步人士包三易（翁源原翁北中学校长）等人晓以大义，指明出路，最后包绍羲也选择跟随包三易等

人投向人民，投奔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翁源庙墩、荷坪等乡、镇自卫队，在王国华起义影响下，不久也先后纷纷倒戈起义，光荣参加人民革命的行列，从而推动翁源人民走向一个新的高潮。

王国华率部起义后，经过学习整编，被分配在北一支三团担任副营长，由于在部队作战勇敢，表现积极，因此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郑宣整理）

解放前夕韶关“护行”工作片断

成 剑 萍

自百万雄师过江之后，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为追随国民党政府逃跑过海，广东省银行韶州支行（简称省行）。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4月20日召开全体会议，由经理梁欣生主持，根据什么“戡乱建国”的需要，提出大部份工作人员要按“停薪留资”规定进行遣散，并即宣布遣散人员名单。

原韶行中共地下党员容秉乾及员工30人，于5月离开省行。容返“北支”继续在本市外围进行保卫韶关市的游击活动。此时省行经理梁欣生藉口护送家眷，疏散离韶赴港。

5月4日，韶关银行同业，根据当时新任的北江区专员薛汉光在5月1日全市各界欢迎大会上的“特别宣示”，以时局动荡，为未雨绸缪，应付事变起见，召集银行同业秘密座谈会，共商一切，各行局主管一律参加。会议在邮政储金汇业局会议厅举行，由交通银行经理许崇鏗主持，省行经理沈建邦、副理陆建勋参加，决议：“各行局预先请拨专款，预备银元，并先将公物清理装箱打包；若逃跑不及，应由各行局主管预先权宜处理一切。指定员工留守看管公物，并经决议，一致行动”。

为此，省行于5月9日用“代电”报告广州总行，拟将该行自光复以后已列表封存帐册文书和出纳管契约证券债票（包括仁化、始兴、翁源等办事处结束后移交公物）等共

150箱，请示“应否及早疏散运穗，或应如何处理”。

9月初，南下大军已进军赣州，韶关解放指日可待。在韶各行局已陆续撤走，省行也结束业务，由襄理余秀文率领其他人员回广州总行。省行房屋以及留下一部美造“士刁必架”牌五座黑色轿车（当时是全市独一无二的一部小车）。派文书组长黄天相留韶看守。

韶关解放前夕，蒋政权仍作垂死挣扎，加倍疯狂搜杀破坏。为保护好银行留下房屋，尽量避免发生事故，在此白色恐怖笼罩全市期间，容秉乾穿梭于国民党军队哨兵关卡之间，冒着生命危险，进出市区了解情况；同时做好省行“停薪留资”而尚住本市人员如陈伯强、麦洪等人的思想工作。我也是留韶人员。9月23日，容秉乾突然来访，展示形势，情意交融，话虽不多，却沁人肺腑，令我受到启迪，心扉洞开，看见光明，找到归宿。他还勉励所有留韶同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搞好护行工作，注意安全，等候人民政府接收。

各行局留下房屋甚多，如民权路（现东堤中路）有中、中、交、农、邮政储金汇业局等的行址。省行所有房屋以及五里亭风门坳（现韶关市牛奶场附近）中农新村宿舍等地方。如何保护好这批分散房屋，容秉乾提出：

一是重点保护市区各行局营业用楼房。郊区宿舍，因地处帽子峰下，处于兵家必争之地，无保护价值；行局地处闹市，邻毗商店住户，与邻里息息相关，蒋军退兵，若要破坏，亦难得逞，要求采取灵活措施，密切注视事态发展。

二是轿车一部，放在九成路（至黄田坝浮桥头）省行车库（现西堤中路市搬运公司车房），因地处河边，比较隐蔽，可能安全一些。情况发展，果如所料，一切正常。

1949年10月7日韶关解放。军管会派出以叶克行长为代表的工作队接管银行。容秉乾同时通知尚留本市原省行工作人员即回曲江人民银行报到上班。

（上接200页）

5. 借贷问题。纸农每年均要向当地纸商借款，月息三分，有一月计一月，待新纸出时扣除，是一种高利贷剥削……说泰康路的竹业行向北江纸农贷款种竹，到斩竹时以实物归还，这也不确。因种竹非三两年就可成材成林，远在广州的竹业行如何能联系得上？至于老竹，林太密就要砍去一些；砍下后扎成竹排直放广州、佛山贩卖，非广州纸行到北江上游收实物。

6. 做纸方面。作者所说，也欠翔实，这属技术问题，这里只好从略了。

7. 另说到解放前县税务机关，每逢圩日派员就地收税，任其估税，竹农受尽剥削。查土纸历来均没有出产税，有之则是在这三省边界活动的土匪头子周文山受招安后，将人马设在长江，他就以保护行旅为名，在长江交通路口设卡收取每把纸一角作经费，县当局只图安定，不加禁止；至南雄及城口等有没有收，不得而知。纸农以所耗不大，如数照交。作者又说广州竹业及联兴路的纸业带大量盐到山区高价售与竹农，此说也不合理。在当时，产区还未通汽车，大量的盐自不能运去，可能是运到韶关卖了，联兴路纸业再买回一些土纸回去。迨至韶关沦陷，土纸没有出路，纸农有纸也卖不出去，无钱买盐，只得以一把纸换取六斤盐。这种威胁时间不长，日本就无条件投降，土纸又复趋活跃。

志锐中学护校及其他

黄兴亚

薪 若 “湿 柴”

解放前，在学校生活中流行一句口头禅：“学生走公，教师走私”。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解放前的公立学校收费较轻，送一个子弟到公立学校读书，家长还勉强负担得起。而私立学校收费较重，且以实物计算，不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初中生一个学期收白米一、二百斤以上，或折收港币。为使自己能进入学校读书，青年学生拚命地要考上公立学校；与此相反，教师想方设法到私立学校任教。私立学校教师的工资以实物计算，初中教师月工资发白米三百至五百斤不等，或发港币壹百伍拾元左右，高中教师还要略高一些。公立学校的教师月工资约相当于私立学校的一半左右，而且极不稳定。“法币”贬值，物价直线上升，维持半饥半饱的最低生活也没有保证。上述这句口头禅，正好反映了解放前教师生活的辛酸和苦涩。

1948年春，我来到志锐中学任教。上半年每月工资收入还勉强可以养活一家三、两口人，到了下半年，物价象脱缰的野马，早晚时价不同，教师为生活忧心惶惶不可终日。领到一个月的工资，就象抱回一大堆“湿柴”（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银元券”，使货币贬值，银元券被老百姓喻为作燃料的价值也没有的“湿柴”），立即又急脚快步跑到兑换店换回几十元港币或一、二十个银元。到了1949

年，更是每况愈下了。这一年的五月份，工资发下来了，有三位青年教师抱着一大包“湿柴”，跑到街上什么也买不上，只好进理发店理了一次发，剩下的钱刚好够买一包火柴。这些青年教师没有家庭负担，每月伙食费由学校在职务项内预收或垫支包了，一天三餐不愁。一个月的工资只够理一次发和买一包火柴，说起来有点象天方夜谭，令人不可思议，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件事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深刻，虽事隔将近四十年，当年教师的寒酸生活，尤历历在目。

集体索薪

志锐中学是省立学校，经费是由省教育厅按月定期电汇广东省银行韶关分行支付。正常情况下，省教厅发出电汇通知后，第二天或至迟第三天，学校便可收到银行领款的通知。韶关的省立学校除志锐中学外，还有省立韶州师范学校，其经费来源及支付办法是一样的。两间学校常常是同一天发放工资的。

那么，集体索薪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5月份的经常费，志锐中学收到教育厅电汇通知已三、四天，但是当地银行领款通知却迟迟不见送来，全校教工无不心急如焚。学校会计亲自到银行查询，得到的答复很干脆，他们没有收到省行电汇的通知。第一次答复是这样，第二次、第三次仍是这样，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就这样拖了一个星期，这个月的工资还是一个不能充饥的“画饼”。这明明是欺负教师无权无势，置教师于饿死的境地。在全校教工忍无可忍、愤怒万分的怒潮中，有几个青年教师倡议全校罢课，集体到银行索薪。倡议立即得到全校教工的响应，并推举以教务主任梁伟勋、老教师黄开光为首组成索薪代表团。

这一天上午九时左右，志锐中学教工约三、四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到银行要求立即发还被扣的经常费。当我们抵达银行申明来意，要求行长当面答复时，发生争执，围观的群众有一、二百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群情汹涌的场面，他们一时慌了手脚，只好请我们进入办公室坐下来解决问题。但是行长却又躲避不见面，只派几个行政人员和负责财会的股长应付我们。一方面仍诡称没有收到省行的电汇通知；一方面打电话通知韶关专员公署派人来解决。不久，专员公署一名秘书来了，身后带来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武装和一群便衣特务，如临大敌地把守银行大门，并驱散围观的群众，便衣特务则凶相毕露地在办公室周围进进出出，制造恐怖气氛。但是四十几位教工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据理力争，并表示不得到具体确切的答复决不罢休。尽管银行施用软硬兼施手段，但终以理屈词穷而无法狡辩，最后由那位秘书扮演花脸角色，答应明天解决问题，事情才平息下来。但是，第二天当教师领到一大包“湿柴”后，这个月的工资却只够理一次发和买一包火柴了。

护校斗争

1949年四、五月间，南京、上海先后解放了。广东全省中、小学校提前放假，高、初中毕业班考试于五月中旬结束，六月上旬，其他一、二年级学生亦草草考试结束放暑假了。原校长林为栋提请辞职，张发奎另派黄宗潮接任校长。黄宗潮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他的妻舅卢某（忘记名）任总务主任，跟着就安排亲妹妹任会计，侄女任出纳（后二人韶关解放后，仍在志锐中学继续任职，直至学期结束放寒假回广州后，没有再回来）。

九月间，学生陆续回校缴费注册上课。学生每人收学杂费白米伍拾斤（折价收银元或港币），伙食费则以收港币为主，缴费注册学生约有三、四百人。九月下旬某一天（忘记确切日期），我正在一个班上第一节课，突然发现梁伟勋老师站在课室门口，并暗示有重要事情商量。梁老师告诉我，总务主任卢某今早挟款私逃，去了火车站，准备乘车赴广州，问我怎么办。我立即转告学生并宣布下课。消息很快传遍全校，师生们都纷纷聚集在教务处门前，群情激愤，要立即把卢某抓回来，交出全部公款。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我组织了四、五十位年龄较大的同学，并亲自带领他们到火车站去抓卢某。当时车站内人来人往，非常混乱。我们了解今天还没有发过一次南下列车，断定卢某还没有离开韶关。但是眼前有十几列车，每一列车都塞满了人，究竟卢某上了那一列车，这是一个不易解的谜。我们决定以四、五个人为一组负责一列车，一卡一卡的检查。大概用了一小时左右，终于找到了卢某。据同学们说，卢某当时躲在车厢角落里，双手捂着头伏在桌面假装睡觉，若不是认真仔细地查找，是不容易发觉的。把卢某抓回来后，全校师生员工在图书馆阅览室开了一个大会，卢某在大会上只交出三百个光洋，全校师生指出学校所收的学杂费及学生膳费远不止这个数字，警告他不交出全部公款不准离开学校，并由学生把他看管起来。这一着打中了要害，他开始害怕了。卢某原是国民党职业军官，东北锦州解放战役中被俘释放的，他害怕第二次被俘。在师生的压力下，以后陆续共交出五百个光洋、黄金约四、五两。

就在抓回卢某当天召开的师生员工大会上，成立了护校委员会。大家选举出梁伟勋、黄开光、熊明星、黄兴亚、饶

纪寰（以上教师代表）、黄泰寿、周其江、朱玉征、何汝伟、邓自强（以上学生代表）、龙一之（工人代表）等组成护校委员会，并互推梁伟勋、黄兴亚为正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纠察组由黄兴亚负责，总务组由熊明星负责，联络组由梁伟勋负责。总务组接管卢某交出的全部现金后，立即到市场购备可维持全校师生一个月伙食的油盐柴米，由学生自己安排管理伙食。纠察组挑选了年龄较大、身强力壮的同学做骨干，将留校的大部分学生（女同学除外）编入各个组，日夜值岗巡逻，负责全校保卫工作。

即将解放的前三四天，也就是所谓“真空”时期，市上的店铺大多数关门，马路上没有几个行人，黄昏以后，更是行人绝迹。大街小巷都用杉木造起一道道栏栅，雇人看守，早晚定时开闭。志锐中学地处南门曲江桥畔北侧，居民稀少，四面空旷，歹徒随时可以闯进学校，盗窃固然是防不胜防，万一发生抢劫也是呼救无门。为确保安全起见，我们将家属和女同学迁往城内广育中学，纠察组的同学和单身年青教工则留驻校内。10月6日半夜，曾发生过一场虚惊。先是曲江桥上升起一股熊熊火光，跟着桥对面传来一阵机枪声，随后一群人猛撞学校大门，不久又有十几人爬墙进入学校。纠察组同学人人手执棍棒，严阵以待，准备对付抢劫歹徒。再细一看，原来是一群夺路逃命的国民党残兵，穿过操场，一溜烟跑了。

1949年10月7日，韶关解放了。天刚亮，马路上挤满了迎接光明的人群。志锐中学师生员工的护校斗争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结束了。

（作者是韶关教育学院退休教师）

解放前夕韶关电信员工保卫物资情况

廖崇信

1949年秋，南下解放大军已逼近粤北重镇韶关。国民党政府感到末日已到，纷纷开始撤退，整个韶关笼罩着战争即将降临的气氛。社会上人心惶惶，物价飞涨，一片混乱。

为了保护韶关电信设备和物资完好无损，待韶关解放后交给人民政权手中使用，8月下旬，设于韶关的由广东省六区电信管理局管理的电信局、机务站、线务站三个单位，以及电信工会的负责人联合召开会议，研究保卫电信物资的有关事宜。会上决定成立一个战时保护企业安全和留守职工的组织。负责保卫企业安全，使电信器材免遭破坏，同时，安排好留守职工的生活。会议还作了具体分工，选举出负责人。还决定拨出一定的经费和部分福利费作购买柴米油盐、咸鱼干菜等备用物品的开支。会议还订出各部门轮流值守人员的具体名单。

机务站方面，早于1949年夏就注意机件材料的储备问题。我们曾向省局领取汽油多桶，以储藏备用（当时油料仍有四五桶剩余，而我们虚报已用完）。解放军抵达江西吉安的消息传来后，我便与站内的粟、龙、李等同仁多次商量埋藏机件和汽油的计划。考虑到一旦战斗打响，即将部分贵重机件和材料拆卸埋藏好，以防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破坏机件设备，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又考虑到局内有一股反动势力，故不敢特别露骨行动。当时的经济相当困难，毫无应急费用，

站内部分同仁曾提出卖掉数桶汽油（每桶值120元光洋），将所得款项分给站内人员，以解决战时紧急生活费用之需。我考虑再三，反复以利害得失关系说服同仁。使站内所存9桶汽油没有变卖而保存下来。结果，韶关解放以后，这些汽油派上了用场。2桶借给由北京派出的南下工作团（由江西方面开来，负责接收广东电信工作的）的汽车使用。其余7桶作解放后日夜开机持续3个多月的长途通讯载波机电源使用。

对于机件设备，除笨重的载波机无法处置之外，诸如电台等贵重设备，都可以收藏。10月6日中秋之夜，我和机务站内五个同事一起，在机务站宿舍（现风采路曲江县招待所内）后的空地聚餐赏月至深夜。待夜深人静之时，撬开宿舍地板，挖一个大坑，将站存SCR——499无线电台（美式）等主要设备材料用铁桶装好，再用油纸封好，放入坑中，掩上泥土，盖回木板，这一行动，没被人发觉。不久，远处便传来稀疏的枪声，已知解放大军开始入城。解放后，韶关战报曾以“机务站夜里暗藏机件和迅速恢复通讯”为题作了报道。

在省长途电讯方面，原日由广东省政府建设厅属下的省长途电讯通信机构组成。北江区有管理段，为北江长途电话管理所，与北江地区各县可互相通讯。所用的都是10门小总机，用铁线连结。在韶关解放前两天，由国民党北江专员公署撤退连阳时和当时的所长陈宏智下令报话通讯工人拆下10门小总机3部一同带走。在电话所内，有四个通讯工人（当时称作报差、传达）温乃秋、何天衡、李元雄、李旦昌，不愿随同溃败的国民党机关撤退，乃各自隐藏起来。解放后数天，军代表程琦找到曾是他的学生的温乃秋，要他设法尽快恢复通讯。但由于小总机已被撤走，一时又无通讯设

备，这四位通讯工人只好将残存的总机零件组装成临时的简单通讯用具，由何天衡任分所所长，终于恢复简单的长途通讯业务。后来在剿匪反霸战斗中，缴获了原3部小总机，交回电话分所，才恢复正常的长途电话通讯。

韶关市内私营的广达电话公司总机室的接线生邓汉生等人，在韶关即将解放的前夕，也接到国民党留韶部队通讯兵的通知，说他们也开始随机关向西撤退，意思要他们也跟着走。接线生们权衡利弊，仍继续留下来，坚守岗位，直到解放大军派军事代表前来接管。由于机在人员在，韶关市内的电话通讯，解放不久，即恢复正常业务。

（文蔚整理）

我所知道的南韶连会馆

李三余（香港）

1945年9月8日，日军宣布投降后，几位粤北同乡前辈何春帆（连县）、陈见田（阳山）、陈文甫（仁化）、官祎（始兴）知道第二方面军接收广州前进指挥所已先到穗，特来（省府）前进指挥所办公处查询是否有粤北熟悉同乡，目的是商谈接收南韶连会馆事宜。我是粤北人，当然很愿意为桑梓出点力。于是，由他们带路乘吉普专车前往中华路（四牌楼——即现在的广州解放中路）视察会馆。当时会馆内住的都是日本侨民及日本军人家属。我立即返办公室加派宪兵多名，命令所有日本侨民搬出会馆。后来，由陈文甫派人接收。听说，当时有很多物资日本侨民都不敢带走，只带随身行李衣物离开会馆。后来据官祎师长表示，全部由陈文甫先生处理。当时我已开始投身做接收工作，没有时间关注。后来会馆第一届筹备委员会通知我列席会议，作特别嘉宾。本来我不想参加，因委员们都是粤北知名长辈，我是小伙子作嘉宾列席，实愧不敢当。无奈何春帆、陈文甫等几位长辈亲自前来行辕总务处办公室力邀，不能不去。当时选出官其慎（师亮）为第一届理事长（行辕军法处长）。第二届理事长为张嘉斌先生（张发奎将军三弟）。两届理事长都是始兴人，总干事是肖湘南先生（省社会局科长）。我是两届理事会的实际干事。根据何春帆先生当年的叙述，南韶连创立的经过是这样的：



图为广州南韶连
会馆的正门

民国初年，几位长辈何克孚（连县）、张超芹（乐昌）、官其彬（始兴）及其他各县长辈，认为我粤北山区，如要造就人材，非在广州成立会馆不可。如果有会馆，可使各县来读书的学生方便得多。因粤北山区多数以务农为业，想送子弟读书，并不容易，想来广州读书及去外国留学，更加困难。在大家努力之下，先租赁现会馆之一小部分为临时会所。初时地方很小。陈济棠主粤时，负责会馆工作的同乡感到各县来广州读书的学子渐多，特召集各县值理会议，通过向各县筹款扩大会址。当时仁化县的陈文甫先生任职于广东禁烟局副局长（霍芝庭任局长），经济条件很好，而且很热心为桑梓造福，捐了白银四万余两，各县同乡长辈亦尽全力捐助，共捐了约五万余两。除买了现址地皮之外，还建了两层楼多座；一座作大礼堂，二楼为办公室，另几座为学生宿舍及食堂。在抗战前，很多韶关市所辖各县学生，大部分住进会馆，至毕业后才离开。

第一届理事会任内，官其慎理事长与陈文甫先生等，意想筹集更多经费，曾在馆内经营夜总会（即舞厅），后来被张发奎将军知道，召见官其慎理事长及陈文甫先生，当面拍台大骂，认为将会馆开舞厅，影响声誉，更影响住会馆的学生，并命令立即停业，恢复会馆本来面目。官、陈两先生看见张将军不高兴，便立即停业。至第二届改选（好像是二年一届），才由张嘉斌先生当选为理事长。在张理事长任内，增建学生宿舍多座，大兴改革。各县代表对选举正副会长都

很重视，踊跃参加投票。当时选出正副会长为张发奎、华振中等（薛岳亦为副会长，较少到馆）。他们与各县乡亲畅谈，甚为亲热，选举后全体摄影留念。会馆理事组织，以南雄、曲江、连县三县各占理事三席，其余各县一席或两席。这是根据各县在广州居住的乡亲多少而定。记得每届选举，翁源县很少同乡参加。抗战胜利后，理事会组织，参加的有张发奎、华振中、官祎、官其慎、张嘉斌、李大光、沈秉强、薛汉光、卢崇善、欧美、何克孚、何春帆、陈见田、刘平、李及兰、陈文甫、张超芹、龚楚、莫雄等。

本刊第10辑勘误表

页	行	错	正
95	5	1931	1937
214	12	双十	（应删去）
157	7	回乡	四乡
121	10	旅长钟芳竣	（应删去）
39	7	1943	1945
181	3	轻	辘
24	最后	杨宣番、杨宣衙	杨宜蕃、杨宜衍
另：第8辑第4页	18	6月13日	6月6日

解放前后韶关市性病概况

谢华恩

1949至1951年这段时期，韶关的性病（主要是梅毒和淋病）是相当严重的。当时虽没有普查记录，但从婴儿出生与妓女改造情况来看，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49年元月，我到曲江中心卫生院（即今东堤路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妇产科工作。当时的产妇一般不来产前检查，少数先来“挂个号”，极个别的才肯抽血检验，因而在生产时，胎位不正，难产者不少，尤其是梅毒胎实在惊人。患梅毒病的孕妇怀孕多不足月，产下的新生儿全身皮肤一块块红损溃烂，甚至脱落，脸皮绉缩如老人，手脚柔细，腹部涨大如排球，样子十分难看。这种梅毒儿绝大多数是死胎，产时羊水多而混浊，恶臭薰天，令人作呕。有些病情较轻的新生儿幸而不死，但皮肤也有红损或绉缩，面色枯黄，哭声微弱，生活力也很低。当时梅毒产妇，经我手接生的估计约占六分之一。

至于淋病的就更普遍了。当时新生儿出世，我们把他咀里的羊水抹净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孩子眼睛滴上硝酸银，以杀死污染眼睛的淋菌，如果稍慢一点，过不了一天，新生儿的眼睛就会不停地流出许多脓样眼屎来，眼睛红肿得挣不开，这就是“淋病性结膜炎”了。

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积极开展妇幼保健和卫生宣传，提倡孕妇要做产前检查和抽血做康氏反应，许多孕妇懂得道

理后，在产前检查时主动告诉我们丈夫有“冶游史”或自己的各种症状。争取治疗，这对消灭性病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孕期中夫妇能认真治疗，效果是显著的。曾经猖獗一时的梅毒和淋病，在解放后一两年中就速迅减少了。

性病能得到控制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对妓女的改造。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明令禁赌禁娼。那时韶关南门桥至东堤沿河一带都有“花艇”，一些艇妹名为按摩或供夜宵，而实为娼者却不少。1952年，省、市民政部门检查出约200多名妓女，她们没有文化、没有劳动技能，却患有性病。人民政府把她们集中在五里亭（后迁到上后街），一方面由卫生部门为她们查治疾病，一方面教她们学习文化知识及提高思想觉悟。当时由李德兴、黄天予医生负责治疗，为妓女们注射九一四、铋剂、青霉素等。她们为生活所迫，一些是未成年的少女，最小的一名年仅12岁。妇联和民政部门给她们上政治文化课，教她们学习劳动技能，我也去为她们讲述卫生课。通过学习，这批妓女都逐步提高思想觉悟，并学会一些生产技能，也治好了性病。政府安排他们就业、结婚，较小的进专业学校读书，于1953年8月全部处理完毕。此后，韶关就极少再发现性病了。

现在，每当我看见那些脸色红润、健康可爱的新生儿时，想起当年接生的那许多梅毒死胎，真是不寒而栗，更为今天的新一代感到幸福！过去的梅毒死胎，不但今天的年青人没见过，就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医务人员也可能没见过，因为政府贯彻婚姻法，执行一夫一妻制，并禁止卖淫，使性病在六十年代宣告消灭。可是，最近由于各种原因，梅毒淋病等性病又有所发现，这应该引起人们高度警惕与重视。

（作者系韶关市卫生防疫站干部）

有关曲江矿业问题的商榷

国伟老师：

因工作关系，有幸拜读你发表在《韶关文史资料》上的几篇大作，受益不浅。但其中有些说法，想与你推敲一下。

《文史》第二辑《抗战时期的韶关工业》用1934年省民政厅编印《广东省地方纪要》中：“矿业则有锑砂、煤矿，然近年以来锑已脱销，只余煤矿一项，土煤运销广州者仅有五千余斤。”这句话从本人所收集到的许多资料，说明不一定反映了当时现实，更不能作为抗战前的矿业状况。

(1) 中大张伯楫、刘乃隆所著《广东曲江县锑矿》中述：“廿年后政局渐定，本区锑矿逐渐恢复开采，廿年三起重要矿区如贼老顶、观音坐莲、天子岭、皇岗等处则收归军垦处经营，廿五年陈济棠去粤，军垦处取消，复归商营，至廿七年秋，广州退守后，以出口困难，逐渐停办。”

(2) 《广东省有色金属工业》大事年表中：“1933年，国际市场锡、锑需求量增大，价格上涨，……曲江一带锑矿逐步恢复生产。”

(3) 《大笄矿志》大事年表中：“1930年3月洪贵公司成立，在枫湾墟设钨收购站，1938年7月取得政府规定矿区，并绘制矿图许可。”

(4) 市有色总公司档案《小坑大笄矿工情况》：“抗日战争前曾有矿工百余人，每月产量2吨多，抗日战争时间

矿工都下山了。”

(5)《广东省建设厅矿业专号》，全国矿场调查表，填报日期1930年9月，振兴公司，有工人104人，每日产量2百斤，矿区所在地：芹村细园墩（现一六矿区）。

(6)据查建设厅档案，1934年~1937年，呈请矿权的公司有：锑——永明公司、广成公司、越北公司、怡兴公司、德兴公司、三才公司、广利公司、德发公司、另外还有矿主姚复、龚穗石等。

钨——合兴公司、振兴公司、利民公司、源源公司、恒和公司。

铅——华丰公司。

另外，还有两个石矿场。

(7)市有色公司档案《曲江大赦钨矿初步调查》：“1933年初，军垦、振兴、利民、合兴等公司先后于该地设站收购，最盛时期工人达二千余人，1933年、1934年振兴公司收得钨砂将近40万司斤（约240吨），1935年、1936年收得钨砂将近10万司斤（约60吨），1937年、1940年均产5万司斤（约30吨），1941年、1942年共计仅25000司斤（约15吨）。日敌进占后各公司均先后停业。

(8)瑶岭钨矿，由鸿发公司自民国十九年三月呈请矿权后一直在开采中。

以上事实足以反映当时韶关市（曲江县）矿产开发之状况，仅供参考。

《文史》第二辑《北宋间期的韶州铜冶》引用《韶州府志》卷二十七，“徐谿传”中的话来说明宋初有“银户”三百余家，似有不妥，因为徐谿乃南北朝时之宋人，他是不可能知到其后500~600年的事情的。《韶州府志》记述徐谿是

这样说的“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二曰，郡领银民三百余户……”另可见《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67页引清郝懿行《补宋书，食货志》亦有载，说明其所言是元嘉初（424—426年）的情况。此说不知是否对，请赐教（注：北宋时岑水场有冶户八、九千家，南宋不满百户）。“……把它称为“宝山”（今大宝山），岑水场就座落在这宝山之中。早在唐朝，这里已是一个著名的银矿”这句话可有史实为据？查《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韶州曲江县银山在县西二十二里，出银”；《隋书、地理志》“南海郡曲江有玉山、银”地点应该相当于今日的宝岭矿区。《中国历史地图册》隋唐时期均标有曲江县“银山”及“玉山”，位置亦相当于今日之宝岭矿区；据市博物馆同志介绍，在宝岭古代炼渣处出土有不少宋代文物，证实是个宋代冶炼场。解放后此地做过地质工作，已查明为银、锡、铅、锌、铋、砷等多金属小型矿区，其中银金属储量为17.87吨。

本人孤闻寡见，不知道这个时期是否有其它史料能证明大宝山在唐朝开采过银？敬请指教。

以上几个问题，烦请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抽时给予答复，非常感谢！

汪伟斌

1987.9.3.

汪伟斌同志：

……（略）对来信指出的几个问题，我的意见如下，尚盼指正！

（1）关于抗战前曲江矿业发展问题。此文写作时，由

于收集资料有限，对1934年至1937年间曲江矿业状况一无所知，所以文中只好引用省民政厅1934年《广东省地方纪要》一段文字。为避免误解，在文中特意点出的是1934年的材料，实际回避了1934年至1937年这几年的状况。看了来信，我同意你对1934—1937年间曲江矿业的分析，所列材料是有依据的。对《地方纪要》记载是否可信，我认为还是准确的，它确实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三十年代初曲江矿业的衰落情况。有色金属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大战期间需求量很大，粤北的有色金属铋、钨、锡等矿业一时兴起，战后则销量大减；到了三十年代初世界出现新的军备竞赛，酝酿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3年起，国际市场锡、铋需求量增大，价格上涨，因此引起粤北矿业复兴。你所引用的8件史料中的第二、五、六、七件，均明确表明了这一点。其余几件材料，第一条中铋矿是由军方经营，自采自用，与民营矿业性质不同，带有特殊性。第三条提及1930年设收购站，收购数量，来源不详。第四条没有具体时间。第八条，瑶岭钨矿从1930年呈请矿权，具体投产那一年未提。根据你提供的以上材料，曲江矿业的重新兴起，应是1933—1934年的事情。《地方纪要》是1934年出版，收集材料的最后截止期恐怕只能到1933年上半年，所以无法反映此间发生的重大变化。但它对1933年以前的评价，我认为还是有意义的。

(2)关于“银户”。我引用这段话，本来意图说明古代采矿业的艰辛，并非特指北宋，但撰稿过程中疏漏，以后又未重新校对原文出处，把本应注明是南宋时的材料这一点忽略了，以至从上下文看，变成了北宋时的材料，而且自己并未发觉。得到你的指正，十分感谢。

(3)大宝山与唐朝“银山”问题，我撰文时，依据的材料不够充足，但银山是否就是今宝岭矿区？来信史料虽有一定价值，但尚未能定论，希望能再进一步考证。

李国伟

1987年9月20日

对北江纸产销地问题的一些意见

砚 农

读《韶关文史资料》第九辑童漱石、曾耘峰合写的《抗战期间北江纸产销地杂记》一文，其中好些史实，是值得商榷的。

1. 土纸市场。作者认为抗战前广州经营土纸生意的，均在联兴路一带，约有十余家……据我所知，联兴路的纸店是广州零拆家而已，完全不是自己向产区进货，而是向广州一德路、天成路、新基西等大纸行进货。照那时估计，广州大约有十多二十家大纸行。广州沦陷后，韶关民族、民权、民生三路，也有自营及代客行二十多家，极为鼎盛。

2. 童文称北江纸产销地只仁化三圩镇是不能包括整个北江的，南雄、始兴、乐昌、曲江等出产的土纸也属于北江，而且数量不少，首推南雄，其次才是长江。

3. 关于人口问题。作者说长江有人口六百余，左隆有四百余，扶溪有三百余，合共一千三百多人口，这个数字不知指什么人？单这三圩镇的纸商及家属也不止此数，纸农则超出十倍有多，如包括居民及农民何止几万。

4. 山多田少是事实，认为有斜田二百亩，左隆有百余

亩、扶溪有六十余亩，这个数字也不符事实，仅扶溪一乡，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又称当地纸农甚少耕种，雇请江西及湖南人代耕，这也不确。当地山多田少，每年收获粮食不足半年，所以除耕种外，均以做纸为副业，不论有无竹山，男人均懂做纸，自己做或受雇于人；至于代耕是在立夏前后季节，并非雇长工全年代耕。（下转191页）

韶关市第五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成员名单

主任：李子德

副主任：殷石海 王镛非 刘 星

（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

委员：王斯德 王镛非 石 蕃 刘 星

 李子德 殷石海 韩春华 杨震越

 熊肇勤

《韶关文史资料》编辑：

 刘 平 饶纳钧 谢君豪

封面设计：黄安仁

封面题字：柳 倩



韶关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韶关市粤北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出版物印刷许可证第 111 号

工本费 1.20 元